

甘肃史志

GANSU SHIZHI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办

GANSU DIFANGZHI

2018·2

甘肃史志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任：张军利

副主任：郝宗维 李振宇 张正龙 石为怀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生 牛述林 毛存显 米琳

孙占鳌 李宽余 杨生宝 何成才

汪举红 张占社 张伦 张全生

陈谦 罗卫东 郑天水 贺红梅

高中 梁兴明 彭晓峰 谭得胜

主编：张正龙

副主编：张占社

编辑：牛建文 李佳潞

甘肃史志

2010年3月创刊 季刊 总第34期

2018·2

·特 载·

在全省地方综合年鉴业务培训班上的讲话(摘编)

石为怀·4·

·史地考述·

明代驻甘藩王述略

华 丹 陈 谦·8·

成纪县治之两迁三个阶段

朱克雄·18·

·方志人物·

张澍方志学特色论略

张晓彭·29·

·年鉴编修·

转型升级中的年鉴事业发展思考

刘传仁·39·

GANSU SHIZHI

· 史志研讨 ·

- 明代徽郡郭从道与《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相关问题考略 袁兴荣 崔珍康 ·46·
西和县马集村古代墓葬研究
——兼与张一驰张士伟二先生商榷 魏泽民 ·51·

· 人物春秋 ·

- 明代秦州理学家周蕙生平丛考 郭延坡 ·58·
吴之珽所著《襄武人物志》对陇西文化的贡献 王长华 ·64·

· 文化传承 ·

- 古道新知:考古新发现所见甘肃丝绸之路文明交流 张 东 ·70·
甘肃境内古丝绸之路贸易掠影 张益明 ·73·

· 志鉴快讯 ·

- 《甘肃史地考述》出版发行 ·17·
甘肃省3部年鉴在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比中获奖 ·45·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举办全省地方综合年鉴业务培训班 ·63·
《甘肃历史地理新证》出版发行 ·80·

编者按

2018年4月11日，全省地方综合年鉴业务培训班在兰州举办。开班式上，甘肃省地方志志办公室副巡视员石为怀就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精神，加快全省地方综合年鉴发展步伐，如期实现年鉴全覆盖目标，提高年鉴编辑质量，增强年鉴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作了动员讲话，现予摘刊，以供学习研究。

在全省地方综合年鉴业务培训班上的讲话

（摘 编）

□ 石为怀

这次培训班的举办，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精神，加快全省地方综合年鉴发展步伐，如期实现年鉴全覆盖目标，提高年鉴编辑质量，增强年鉴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增强工作紧迫感

2017年8月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召开全国年鉴工作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出版和年鉴全覆盖情况。从通报的情况看，至2017年8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省级地方综合年鉴均实现了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全国353个市（州）级地方综合年

鉴全部启动，没有实现一年一鉴的有16个，没有实现公开出版的有45个。全国2844个县（市、区）级地方综合年鉴，已经启动编辑工作的有2543个，其中北京、上海、安徽、福建、河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宁夏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启动了县级年鉴；北京、上海、福建、河南、广东、重庆、宁夏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县级年鉴实现了一年一鉴；上海、福建、河南3个省（直辖市）县级年鉴实现了全部公开出版。

全省年鉴工作在全国的情况是，省级年鉴中《甘肃年鉴》自2009年编辑以来，连续9年实现了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在全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启动编辑覆盖率排名中，我省排第18位（倒数后5位依次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辽宁、内

蒙古、西藏、陕西)；全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公开出版覆盖率排名中，我省排倒数第3位(倒数后5位依次是内蒙古、黑龙江、甘肃、江西、青海)；全国市(州)级综合年鉴公开出版率排名中，我省排倒数第5位(倒数后5位依次是江西、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甘肃)；全国县(市、区)级综合年鉴公开出版率排名中，我省排倒数第3位(倒数后5位依次是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

从2017年底全省史志工作考核情况看，至2017年底全省14个市(州)全部开展了年鉴编辑工作，其中兰州、嘉峪关、金昌、白银、天水、平凉、庆阳、定西、甘南9个市(州)为公开出版；武威、张掖、酒泉、陇南4个市为内部出版，临夏州启动了编辑工作，但尚未出版。全省86个县(市、区)中，有79个开展了年鉴编辑工作，公开出版的有13个，内部出版的有66个。其中西固、榆中、静宁、临夏市、广河、东乡、积石山、合作市8个县(市、区)为多年合编本。红古、环县、靖远3个县(区)编辑进度较为缓慢(实际上是没有印刷出版)；张家川、渭源、安定、成县、徽县、临潭、玛曲7个县(区)尚未开展年鉴编辑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我省地方综合年鉴工作硬性指标的差距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年鉴省、市、县三级全覆盖率低；二是公开出版率低，尤其是市、县两级；三是发展不平衡，陇南、甘南、定西、临夏等市(州)年鉴工作整体滞后。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必须到2020年实现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目标。为此今后三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实现连

续编辑、一年一鉴；实现当年编辑、当年公开出版。2018年全省地方综合年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甘肃年鉴》巩固成绩、提高质量、当年编辑当年公开出版；市(州)综合年鉴加快编辑进度，优化编辑程序，全部实现当年编辑当年公开出版；县(市、区)综合年鉴实现全覆盖，公开出版数达到三分之一以上。最近，中指办印发了《关于实行“两全目标”工作进度季度通报制度的通知》，决定从2018年第一季度开始对各地推进“两全目标”工作进度进行排名，并以中指组文件形式向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和地方志工作机构进行季度通报。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

二、依法履职，勇于担当，切实做好各项工作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紧紧抓住地方史志两全目标任务，戮力同心，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强化责任担当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深刻认识和充分理解新时代地方志工作者的新使命和责任担当，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落到实处。“两全目标”是法定任务，刚性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模糊和松懈。要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奋发有为的斗志，锲而不舍的精神，抓铁有痕的毅力，科学施策，全力推进，真正使地方综合年鉴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去年省委、省政府开展了“转作风抓落实年”活动，省纪委在全省也开展了“三纠三促”活动，今年4月8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大会，专

门部署了在全省开展“转变工作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重点解决政治上不过硬、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压力传导层层递减，能力不足、视野不宽、办法不多等六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地方史志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彻底扭转过去存在的“懒、散、慢、低、拖、误”现象，发扬勤奋、敬业、务实、高效的优良作风，干出一片地方史志事业的新天地，为如期实现“两全目标”作出贡献。

2、坚持依法治鉴

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省政府实施的《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明确规定开展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出版工作是地方史志部门的法定任务之一，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到2020年必须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目标。《条例》《规定》《纲要》《规划》是政府规章性文件，具有行政强制性。所以，开展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出版工作不是我们想不想做、可干可不干的事情，而是必须做并且要做好的工作。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和各级领导同志要以法治思想、法治思维，依法履行工作职责，把综合年鉴工作抓到手上，落实到行动中。

3、突出工作重点

2018年重点做好以下两个层面的工作：第一个层面对市（州）来讲，市（州）综合年鉴要确保当年编辑当年公开出版；没有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的市（州），要把推动开展年鉴编辑工作作为重点，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今年市、县全部开展年鉴编辑工作，实现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已经实现全覆盖的市（州）要提高编辑质量，加快

编辑出版进度，确保实现三分之一县（市、区）公开出版的目标。第二个层面对县（市、区）来讲，重点是三个：一是所有县（市、区）今年必须开展年鉴编辑工作，实现年鉴工作全覆盖；二是今年要实现公开出版的县（市、区）必须加快工作进程，确保公开出版。对还在补课编多年年鉴的县（市、区），请立即开展当年年鉴的编辑工作；三是所有县（市、区）的年鉴必须出版，凡未印刷出版的县（市、区）在年底考核时一律以未开展工作打分。市、县要按照以上部署，认真分析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找准薄弱环节，补短板、强弱项，科学谋划，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促进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出版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4、健全工作机制

开展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工作，不是临时性的任务，而是一项长期的、持续不断的重要工作。就目前情况来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对地方史志工作部门来讲是其他任何一项工作都无法替代和超越的重要工作任务。原因有四：一是随着二轮修志任务的完成，年鉴编辑工作已成为唯一的法定任务；二是年鉴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资政作用，尤其是在即期服务方面是志书无法比拟的；三是在存史、积累资料方面有着不间断性，长期坚持下来就是一座丰富的资料宝库；四是在保持修志机构稳定和修志人才延绵不断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使这项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市、县要依据《条例》《规定》和《发展规划》，结合中指办印发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精神，结合各地实际，研究制定科学合规、操作性强的措施和办法，使年鉴编辑出版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长期有效的工作发展机制。

三、坚持质量标准，规范编辑行为，提高年鉴水平

质量是年鉴编辑的生命，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质量的追求。提高年鉴编辑质量，当前应重点从四个方面入手。

1、在框架结构上多研究

年鉴的框架结构是立鉴之基、成鉴之本。制订科学合理的框架结构是年鉴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下功夫认真研究，务必做到科学合理、结构严谨、横不缺项、排列有序。从全省的综合年鉴来看，主要的问题表现在框架结构上。在这个问题上多下功夫，多研究、多琢磨。注意解决好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始终坚持在同一标准下进行分类。不论采取大编体还是中编体，都必须是同一标准，尤其是在经济部类中，更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二是不能缺要项。全面反映一地之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是年鉴的基本属性。所以，在拟制篇目框架时必须做到全面，不要遗漏大项要项。三是排列要有序。类目要按照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次序依次排序，分目要按照先生产经营后管理，条目先综合后单一，先重要后次要等顺序排列，做到有章法，科学合理、规范有序。

2、在敏感问题上把好关

中指组办公室决定从今年开始，地方综合年鉴每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评奖活动，对2018年的评奖工作已经进行了安排部署。从去年评奖情况看，有几项是一票否决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对敏感问题的把关，政治问题、保密问题、外事问题方面只要发现一处问题就取消评奖资格，一票否决。在这个事情上一定要把好关，不要出

现错误。

3、在编辑深度上下功夫

提高年鉴编辑质量关键要在“编”上下功夫，切忌简单照搬照录。要对各供稿单位报送的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整合，不仅要精炼文字，而且要进行精深加工，把大事、要事、新事、特事反映出来。对能够充分反映地方特色、年度特点的内容尽可能的反应充分、反映全面，必要时可进行延伸挖掘。从而增强年鉴的年度性、资料性、资政性、服务性，真正做到全面、权威、真实、可信。

4、在提高时效性上多努力

年鉴姓“年”。这不仅要求年鉴反映上一年度的各方面情况，而且要求一年一鉴、连续编辑、公开出版。这也就是说要注重年鉴的时效性。一部年鉴编了两三年才出版，把几年的资料编在一部书里就不是规范的年鉴。必须做到当年编辑当年出版。要在编辑实践中不断摸索经验和规律，优化各环节的衔接，优化编辑力量的搭配与组合，提高编辑的时效性和工作效率。要早安排、早部署、早动手，明确目标，靠实责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的抓进度，确保年鉴高质量按时出版。

2018年是全省地方史志事业攻坚克难、实现两全目标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工作重点，狠抓任务落实，加快工作进度，提高工作效率，以转变作风为抓手，以完成目标任务为目的，真抓实干，勤奋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成绩，努力开创地方史志事业的新局面。

明代驻甘藩王述略

□ 华 丹 陈 谦

摘 要：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年）第一次分封诸子到崇祯末年庄烈帝最后分封其子的270多年中，先后受封建藩就国的皇子有51个，在今甘肃境内，明朝实有肃王、韩王、安王三王建府就国，本文仅就以上三王的族系沿革、在当地的活
动、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等做以概述。

关键词：明代 宗藩制度 驻甘藩王 述略

宗藩制度是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在封建社会的结合，是君主利用血缘关系设立的行政机构。该制度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较为普遍，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质是封建统治者消除宗室、功臣等实力集团与皇权矛盾而设置的权利分配制度。

中国分封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大禹取得天下后，“以唐封尧之子，以虞封舜之子”。商朝时分封子孙，以国为姓。周武王灭商后，先后分封许多同姓，以及功臣和古帝王之后为诸侯，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分封体系。秦始皇总结西周以来诸侯混战的教训，废分封而实行郡县制，但秦王朝仅存15年即亡。汉朝建立后，高祖刘邦鉴于秦朝速亡，而周朝行分封享国八百多年的历史经验，“惩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镇

抚天下”再次恢复分封制，最终酿成七国之乱。西晋继续沿袭汉初分封，造成八王之乱。杨坚建立隋朝后，同样延续分封制度，大封诸子为王，使得宗室内部争斗加剧。唐代吸取之前历代分封诸王权力过大的教训，不再轻易分封诸王，只有功勋卓越的才能受封，余者视亲疏而定，即使宗室子弟封王，权力也大大削减，成为只享有衣食租税和王国之名并无实际权力的阶层。宋朝基本沿袭唐制，但稍有不同的是，宗室子弟均可以入学应试、出仕为官，与寻常百姓无异。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在承蒙古家产制传统的前提下，借鉴汉族政治文化中加强皇权的思想，培养诸子势力，让其出镇地方，担任地方军事长官，以此拱卫皇室，从而建立了宗王出镇这一新型的分封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天下后，为使自己历经艰辛得来的江山永固，在总结历朝历代之得失后，选择了屡屡酿成内乱且逐渐被抛弃的分封建藩制度作为巩固政权的法宝。之所以做出这样选择有着多种原因，首先是现实的政治环境，明初定都南京，此时明王朝面临最大军事威胁是北逃塞外以元顺帝为首的北元势力，顺帝虽然退回蒙古草原，可依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也”，时刻都企图恢复原有统治。其次借鉴历史经验，朱元璋出身草莽，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打下江山，实属不易，在“小农政治意识”的支配下，他最为关注的就是如何巩固统治，长久地维持朱家天下。在这方面，封土列爵，把朱家子弟分封各地，让他们共同拱卫中央皇权，利用家族力量维护朱姓政权，无疑是较好的选择。其次，当时天下初定，明朝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很不稳定，面对已经开始骄奢的功臣元勋，为了稳定政局，朱元璋只有依靠宗室子弟镇边抚民。所以，朱元璋效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子巡边”的古制，将宗亲分封到全国各个军事战略要地，坐镇一方。这样做既可使朱家天下得到保障，又不失封建孝道中的“亲亲之义”。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年）第一次分封诸子到崇祯末年庄烈帝最后分封其子的270多年中，先后有62名皇子被封为亲王。其中太祖时分封二十四王；建文帝时分封三王（另有死后追封一王）；成祖时分封二王；仁宗时分封八王（另有死后追封一王）；英宗时分封七王；宪宗时分封十王；世宗时分封一王（另有死后追封三王）；穆宗时分封一王（另有死后追封一王）；神宗时分封四王（另有死后追封三王）；庄烈帝时分封二王（另有死后追封三王）。其中受封建藩就国的有51个。

在今甘肃境内，明朝共有5位藩王建府，即肃王、韩王、安王、岷王和庆王。其中岷王朱榘为

朱元璋第十八子，建藩岷州，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岷王朱榘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永乐元年（1403年）复国云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再迁湖北武冈，藩国不存。庆王朱栴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开国宁夏，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庆王朱栴就国宁夏，以粮饷未备，驻庆阳北古韦州城，洪武三十年（1397年）始建府邸。庆王忠孝，很得成祖朱棣喜欢，命他每年可以到庆阳度夏一次。宣德时，庆王每年到庆阳韦州度夏成为定制。因此，真正在甘肃建藩且延续更替的仅有肃王、韩王和安王。

一、肃王

（一）肃王建藩及肃王府内迁兰州缘由

肃王朱模是明太祖朱元璋十四子，出生于洪武九年（1376年）九月，母亲郜氏，没有名号，大概在朱元璋的后宫中地位比较低下。朱模自幼聪慧，深得太祖喜爱。洪武十一年（1378年），年仅3岁的朱模被封为汉王，食邑安陆（今湖北钟祥）。由于诸王年幼，他们仍留在京城接受教育。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模与卫、谷、庆、宁、岷诸王一起被派往山东临清练兵。经过一年的实际锻炼，朱模的才干展现出来，以“善骑射，能诗文，谋勇兼资”受到朱元章的赏识，改封为地位更为重要的肃王，食邑西北军事重镇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肃王准备赴甘州就国，但“以陕西各卫兵未集，驻平凉”，同时开始营建肃王府。翌年，陕西行都司由庄浪卫徙置甘州，朱元璋同时命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为平羌将军，镇守甘州，为朱模顺利就国铺平了道路。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甘州添设右、中二护卫。六月，朱模“始就藩”甘州。是年八月，朱元璋委以重任，“陕西行都司甘州五卫及肃州、山丹、永昌、西宁、凉州诸卫从肃王理之”，此时，肃王统领军队人数达56000

人左右。肃王初到甘州就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明朝羁縻的安定卫马上派人到甘州晋见肃王，以示诚心归附。朱模依制上疏朝廷，奏授安定卫土酋哈咎为指挥使。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又下诏给朱模，命其屯田养军。朱元璋告诫朱模：“古者兵出于农，人无寒馁。有寇则操戈以战，无事则荷耒以耕，此良法也。今春气和，宜及时督军屯种。”他还要求朱模“凡征伐，以长兴侯耿炳文从”。

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府迁至兰州。此后，历代肃王皆坐镇兰州，直至明朝灭亡。关于肃王府内迁兰州的原因，有记载认为是肃王以甘州风沙大、江南士兵不服水土为由请求内徙兰县。实际上，肃王府内迁还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若以“边地苦寒”而论肃王府内迁，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明初兰州经过历次兵燹，已经残破凋敝，被降为兰县，其生存环境和军事地位与重镇甘州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肃王府内迁并不是朱模的主动要求，而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做出的无奈选择。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将皇位传给皇太孙朱允炆，即建文帝。建文帝感到诸王觊觎皇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开始大行削藩。先后废周、齐、代、岷王为庶人，迫使湘王自焚，又派人监视包括燕王在内的诸王行动，坐镇军事要地的肃王当然不能幸免。建文帝初即位时，曹国公李景隆“以肺腑见亲任”，得到皇帝信赖，积极帮助建文帝推行削藩。李景隆曾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春正月任平羌将军，镇守甘州。他在甘肃练过兵，操办过茶马事务，后又任征虏大将军，练兵河南。因此，他对甘肃肃王、河南周王的实力和情况非常熟悉。而建文帝削藩的第一步就是从周王开刀，李景隆则具体实施了突袭逮捕周王的行动。不难想见，建文帝和李景隆君臣肯定对处置肃王也进行

了谋划。肃王拥有重兵，甘州地位重要，加之关山阻隔朝廷不宜控制。所以，李景隆建言朝廷应防备燕王与肃王暗中串联，宜将肃王府内迁兰州，以便于朝廷驾驭。这样，建文元年（1399年），“以曹国公李景隆奏复，移国于兰州，并以右、中二护卫内徙扈从”。待燕王朱棣篡夺皇位后，为了安抚政局，对诸王大加封赏，以示区别于建文帝。不仅周、齐、代、岷诸王恢复王爵，还赐周、谷、齐等诸王大量财物，并命诸王入京朝贺。在这些封赏对象中，肃王是非常重要的。从中可以窥测，肃王与燕王或有某种联系，个中细节因朱棣销毁大量档案，已不可考。明成祖朱棣由藩王起家，深知藩王势大之害，所以一旦政局稳定马上又恢复削藩政策，厉行藩禁。从移塞王于内地、禁止诸王节制武臣、严禁藩王干预地方事务三个方面入手，加强对诸藩的控制。建文帝时，辽王府由广宁移往荆州，肃王府由甘州移往兰州，开迁塞于内的先河。朱棣继续这一政策，将谷王府由宣府移往长沙，宁王府由大宁改封南昌。他虽然表面上恢复了诸王旧爵，但却以调虎离山的办法，禁止移驻内地的藩王再回到原册封地。这样，肃王府直至明末就一直就驻兰州。此后二百多年，肃藩在兰州休养生息、悉心经营农牧，为明以后兰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明以后兰州逐渐发展成为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创造了条件。

（二）肃王谱系及在甘肃的活动

明太祖朱元璋在决定采取分封建藩制度巩固政权后，于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乙亥，“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制定了一整套的相关制度，使其子孙后代世享优厚俸禄和崇高地位。

传承等级：“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

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为了维持世系传承的有序进行，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并对无嫡长子的继承做出相应规定“凡王世子必以长，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子止为郡王。待王与正妃年五十无嫡子，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袭封。朝廷遣人行册命之礼。”此外，藩王之女封为县君，县君之夫曰仪宾。

宗室俸禄及品级制度：俸禄以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为准“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递减。公主及附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递减。自后为永制。”品级：洪武年间规定，亲王为一品，郡王为二品，镇国将军为三品，辅国将军四品，奉国将军五品，镇国中尉六品，辅国中尉七品，奉国中尉八品。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之后为笼络宗室，“遂加镇国将军从一品，辅国将军从二品，奉国将军从三品，镇国中尉从四品，辅国中尉从五品，奉国中尉从六品”。其他的如宗室成员冠服、依仗、王府邸规格及王府机构组成等都有相应的制度。“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

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第一代肃庄王樸受封，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末代肃王被李自成起义军所杀，明肃王共传袭九世十一王，延历252年之久。自肃王朱樸而下计有：康王瞻焰、简王禄埤、恭王贡录、定王弼桃、怀王绅堵、懿王

缙愤、宪王绅尧、末代肃王识铨，另有追封的靖王真淤、昭王缙炯。明太祖朱元璋行事规矩缜密，家法甚严，对后世子孙的姓名取字皆有明文规定。据《明会典》载，肃王这一宗支的子孙，名字第一字依辈序次为“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富运，凯谏处恒隆”，名字第二字的偏旁按“木、火、土、金、水”顺序排列取字。朱元璋这样做的本来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后世子孙能传袭万世延绵不绝。

第一代肃王朱樸就藩后，建文帝怀疑他与燕王勾连，将肃府迁至兰州。后永乐帝对他打拉结合，并最终削其护卫，不允许其再至甘州。然而政治打击并没有就此结束，朱棣登基后掀起的削藩风潮，比之建文朝更为猛烈。永乐帝先后将齐、岷、谷三王废为庶人，对周、宁二王进行问责，并削夺代王的护卫，仅留下王号空名。他对肃王也不掉以轻心，派人秘密监视，暗中搜罗罪名。永乐六年（1408年），有人揭发肃王朱樸动用私刑捶杀卫卒，还私受哈密进贡马匹等事。朱棣耍起明保暗谴的手法，将罪责归于肃王的下属，“朱典构谗杀人，长史不能辅导规正”，并责令“悉械送京师”。表面上是替肃王回护，实际上是杀鸡儆猴，对朱樸进行敲打。同年四月，又有人告发朱樸听信百户刘成谗言，罪罚平凉卫军卒不当。永乐帝重施故技，批复道：“此下人所为，未必尽出王意。”肃王僚属再次成为替罪羊，然而，“未必”二字已经从语气上表露出对肃王的不满。由此二事，朱樸也体察到皇帝对自己的猜疑和提防，政治上更是俯首帖耳，不敢有所妄图，行事上收敛了许多。永乐十六年（1418年），在政治风浪中几经沉浮的朱樸郁郁而终，谥为庄王。

朱樸的正妻为指挥孙继达之女孙氏，受封为肃王妃，他还有一侧室张氏。永乐四年（1406年），张氏生一庶子，这就是第二代肃王朱瞻焰。

朱瞻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袭封王爵，时值永乐帝晏驾，仁宗朱高炽继嗣。9月后仁宗驾崩，宣宗朱瞻基即位。这时，早已对皇位垂涎已久的仁宗之弟藩王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遂发动叛乱，想要效法其父二次“靖难”，没想到朱瞻基镇定自若，轻松平定“高煦之乱”。平叛后，明宣宗加紧削除藩王的军事力量，相继剪除了楚、蜀、赵等王府的护卫，以减轻他们对中央的威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拥有右、中二护卫的肃府也感受到朝廷的压力。于是，在宣德七年（1432年），肃王朱瞻焰迫于朝廷威慑，将两支护卫军的一支上归中央，以表示肃王府绝无政治企图。肃王府虽交出军事力量，但想借机在经济上扩展，于是朱瞻焰上疏朝廷，请求给肃王府增加岁禄。宣宗回复：“洪武、永乐间，岁禄不过五百石，庄王不言者，以朝廷念远地转输难故也。仁考即位，加五百石矣。朕守祖制不敢违”。明宣宗借不敢违祖制的幌子，驳回肃王的请求，目的还是为了限制肃王府的发展。这一时期，肃王府繁育了大量马匹，朱瞻焰于正统、天顺间，先后5次向朝廷进献马匹，受到朝廷回赐。并捐助黄金，维修凉州卫白塔寺。白塔寺为元朝时阔端与萨班举行“凉州会谈”的旧址，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重要历史见证。朱瞻焰对白塔寺进行重修保护，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朱瞻焰历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于天顺八年（1464年）去世，谥康王。庶长子朱禄埤于成化四年（1468年）袭封，为第三代肃王。朱禄埤在成化十五年去世，谥简王，王位传给庶长子朱贡鏊，是为第四代肃王。

第四代肃王朱贡鏊在父王死后8年，直到成化二十二年（1466年）才袭封，中间隔了较长时间，原因是他曾经犯过罪，被罚俸一半。他在位50年，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于嘉靖

十五年（1536年）去世谥恭王。早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他就以“年老有病”为由，请朝廷恩准世子朱真淤代行肃王职权。此后的25年间，朱真淤广修德政，布济施惠，造福桑梓，受到兰州百姓的爱戴。他“博学能文”，留有大量诗文学作品。然而不幸的是，他在嘉靖五年先于父王辞世，没能正式继承王位，直其子朱弼桃承爵后，明廷才追封他为肃靖王。

第五代肃王朱弼桃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袭爵，他是第四代肃王的嫡孙。他在位24年，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去世，谥为定王。王位本应由其嫡长子朱缙炯继承，然而朱缙炯也是先其父王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辞世，故而第六代肃王就由朱缙炯之子朱绅堵继承。朱缙炯被追封为肃昭王。第六代肃王朱绅堵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袭封。他自幼体弱多病，在嗣位时就已经病入膏肓，继位没多久就于6个月后病逝，年仅17岁，谥为怀王。他的短命而无子嗣，引发了肃府王位继承的危机。

肃王爵位传至第六代就绝嗣，只有从近属旁支中选择继承人。时，肃靖王朱真淤第四子朱弼柿之子朱缙饴请求袭爵。朝廷以他为怀王从叔父，不合辈分为由，不予册封，只命他暂理肃王府事务，并收回肃王册宝撤销官属，大有借机革除肃藩之意。肃藩宗室停止纷争，联合起来反复上疏奏请，以保全肃王府。隆庆皇帝最终让步，于隆庆四年（1570年）同意朱缙饴袭封，但岁禄按缙饴原职辅国将军禄额支取，肃藩势力渐趋衰落。

第七代肃王朱缙饴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去世，王位由他的儿子朱绅尧继承。第八代肃王朱绅尧为人孝贤，“孝母尊师，礼士爱民”有较好的社会声望。他有较强的家国观念，对明朝江河日下的国势非常忧心，几次捐出银两和田地，犒

赏边兵，赞助边饷，受到朝廷表彰。朱绅尧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播，主持了《淳化阁帖》的摹刻工作。《淳化阁帖》成于北宋太宗淳化年间，为皇宫大内所藏历代书法珍宝，弥足珍贵。肃王府藏有明太祖朱元璋赐给庄王朱楨的《淳化阁帖》副本一部，民间难于觅见。朱绅尧不惜重金，延请南京著名金石刻手温如玉，将秘藏《淳化阁帖》副本摹刻成石版，公诸天下，传诸后世，为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摹刻《淳化阁帖》共历时7年，耗用富平石144块每块石版长27—34厘米、宽36—40厘米、厚5—8厘米，至今保存完好，1996年被定为国家级文物。朱绅尧没能等到摹刻工作全部完成，就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去世，谥为宪王。这一工程由其子末代肃王朱识鋮最终完成。

末代肃王朱识鋮于天启元年（1621年）被册封为肃王。他受过良好教育，能诗文，精书画，把摹刻《淳化阁帖》的工作圆满完成。朱识鋮在位时，明王朝统治大厦将倾，时局纷乱，社会动荡不安，他以偏处西北一隅之力，鼎力完成此浩大文化工程，是值得后世崇仰的。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李自成起义军贺锦部攻陷兰州，末代肃王朱识鋮陷于乱军之中，被执身死。王府宫人大多自尽，末代王妃颜氏头触王府后花园肃宪王诗碑殉节而死。

明初，肃王府的岁禄只有500石，较之诸藩要少，原因是甘肃地处西北边塞，经济落后，民力不支，物资转难。明仁宗时，为了笼络宗藩，给肃王府增加岁禄500石，达到1000石。然而，仅凭岁禄还不足以满足肃王府奢华的物质生活需求。王府还通过扩充田庄、经营畜牧、工商市利、奏讨受赏等形式，广积钱财，从而富甲一方。关于肃王府庄田的确切数字，今天已经很难查证，但仅在甘州，肃王就占有庄田350余顷；在

兰州有庄田2000余顷。房店铺面共311间，大门3座，水磨34轮，船磨3只，煤洞6眼，琉璃瓷窖8座。肃王府还在榆中马啣山、官滩、兰州焦家湾、定西杏园等地圈占了大量优良草场，用于繁育马、牛、羊牲畜。明代藩王还可以通过向朝廷奏讨，来满足需要。历代肃王曾经多次向中央政权奏乞庄田、宅舍、墓茔、药材、书籍等实物，皇帝一般都依制赐予。另外，每逢新君即位、诸王来朝、亲王成婚、藩王丧葬等时机皇帝都要赏赐宗藩大量物品，主要是金银币钞、丝织品、药材、田地等，由于明朝宗室在政治上受到严厉管束，所以他们逐渐远离政治，把精神的寄托放到了文化艺术修养方面。优厚的生活待遇为他们的文化艺术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在吟诗填词、琴棋书画、戏曲音乐、校订群籍等方面展露才华。历代肃王都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肃靖王朱真淤，他的诗格调高古，颇有盛唐遗风。历代肃王笃信宗教，并积极营建与修缮寺庙道观，比如兰州的金天观、玄妙观、普照寺、华林寺、白衣寺、崇庆寺等寺观都有肃藩出资修造的事例。肃王府还兴建邸学，修桥架渠，为甘肃特别是兰州的经济、文化、城市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二、韩王

（一）韩王谱系

韩王朱松，朱元璋第20子，周妃所生。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于辽东的开元，因开元近边防，不安全，未去，永乐五年（1407年）死于南京，是为韩宪王，葬南京安德门外；永乐八年（1410年）其子冲域嗣封，二十二年（1424年）接替安王改封平凉，宣德五年（1430年）就藩。韩王共传十一世，历213年。除宪王外，其余十世均在平凉，即恭王、怀王、靖王、惠王、悼王、康王、昭王、定王、端王，末代韩王因明亡无谥号。根

据《明史·诸王列传》，参照《古今图书集成》其世袭如下：

宪王名松，太祖第20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永乐五年（1407年）薨。

恭王冲域，宪王子，永乐八年（1410年）封，正统五年（1440年）薨，在位30年。

怀王名范圯，恭王子，正统七年（1442年）由开城王袭封，九年薨，在位2年，无子。

靖王名范柳，怀王弟，正统十一年（1446年）由西乡王袭封，景泰元年（1450年）薨，在位5年。

惠王名微钊，靖王子，景泰元年（1450年）由高陵王袭封，成化五年（1469年）薨，在位19年。

悼王名偕流，惠王子，成化五年（1469年）由广安王袭封，成化十年（1474年）薨，在位5年，无子。

康王名偕僭，悼王弟，成化十二年（1476年）由彰化王袭封，弘治十四年（1501年）薨，在位25年。

昭王名旭挺，康王子，弘治十七年（1505年）由渭源王袭封，嘉靖十三年（1534年）薨，在位29年。

定王名融燧，昭王子，嘉靖十五年（1536年）封，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薨，在位29年。

端王名朗铤，定王孙，隆庆三年（1569年）封，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薨，在位38年。

亶堦，端王曾孙，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袭封，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李自成农民军俘虏，在位33年。明已亡，故无谥号。

按照明制：亲王嫡长子，年及10岁，则授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10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亲王谥号皆为一字，郡王的封号与谥号都是两个字，韩藩系统所封诸郡王世系如下：

宪王四子：

恭王冲域。

临汾王冲恂，早卒，无子，封除。

襄陵王：庄穆王冲焮、恭惠王范址、安穆王微钤、清顺王融焚、恭毅王谟墀、温恪王朗鏞、璟洗（明亡无谥）。

乐平王：定肃王冲姝、恭安王微钺、温定王偕源、昭顺王融熨、庄简王谟期、朗鏞（明亡、无谥）。

恭王五子：

怀王范圯（初封开城王）。

靖王范柳（初封西乡王）。

褒城王：昭裕王范、宣惠王微钜、安僖王偕泐、康顺王旭澜、温靖王融雯、僖和王谟垣，无子，万历年间封除。

通渭王：庄简王范墅、荣靖王微倅、安定王旭、端顺王融姚、惠穆王谟墻、朗（明亡，无谥）。

平利王：怀简王范壑，无子，封除。

靖王二子：

惠王微钊（初封高陵王）。

汉阴王：恭惠王微提，无子，封除。

惠王四子：

悼王偕流（初封广安王）。

康王偕僭（初封彰化王）。

高平王：崇和王偕乐、昭简王旭樽、融姁（明亡，无谥）。

西德王：昭信王偕潺、康惠王融、端靖王谟埴、朗铤、璟展（明亡，无谥）。

康王六子：

昭王旭挺（初封渭源王）。

陇西王：安懿王旭林，无子，封除。

宁远王：宣和王旭栓、恭靖王融焕谟堦、朗谟、璟稟（明亡，无谥）。

长泰王：荣和王旭横、恭简王融焯、谟垣（明亡，无谥）。

永福王：端僖王旭樨、恭靖王融樊（因越关革爵）。

建宁王：恭安王旭桶、谟堂、朗镇（明亡，无谥）。

昭王四子：

定王融燧。

长洲王：定恭王融焮、简靖王谟焮、朗锭、璟菱（明亡，无谥）。

崑山王：莹康王融姣、恭顺王谟琬、庄简王朗锦，无子，封除。

长乐王：康懿王融焯、荣安王谟蚪、璟溥（明亡，无谥）。

定王五子：

世子谟典早卒，后追封安王。世孙端王朗铨。

高淳王：庄懿王谟墟、朗谿、璟浑、逵朴（三世都未见谥号）。

休宁王：安靖王谟恭、端惠王朗铤，无子，封除。

庆阳王：庄懿王谟塾、恭恪王朗鐙，无子，封除。

通安王：端裕王谟滂、朗镡、璟准（明亡，无谥）。

端王九子：

世子璟宏、世孙逵杞、世曾孙宣塔。

崇明王：怀庄王璟清。

长吉王：庄靖王璟润逵植（明亡，无谥）。

保德王：璟滂。

绥平王：安穆王璟洛

咸阳王：璟漫，无子，封除。

商丘王：璟萍，无子，封除

固原王：渭，无子，封除

汶阳王：璟余，无子，封除。

以上见于文献记载者共计35个郡王，其中除袭封、革爵、死绝者，到明末尚存襄陵王、乐平王、

西德王、宁远王、逵宁王、长洲王、长乐王、高淳王、长吉王九王。此九王很可能与亶塔同时被农民军俘获而下落不明。

除以上亲王、郡王外，韩王一系所受封的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县君、仪宾等数量也极为庞大。据明代赵时春《平凉府志》记载：嘉靖时，平凉计有：亲王1人，郡王19人，镇国将军40人，辅国将军79人，奉国将军212人，镇国中尉259人，辅国中尉77人，奉国中尉3人，县君557人，全俸仪宾394人，半俸仪宾163人。如此庞大的皇室家族，岁支禄粮4071144石，银11139636两，相当于嘉靖时平凉县夏秋两季田赋收入的19倍。

（二）韩王在平凉的活动

宪王朱松，性英敏，通古今，恭谨无过，因此靖难之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恭王冲域于宣德五年（1430年）到平凉就藩，仁宗即位后曾召冲域与其弟襄陵王、乐平王入朝，各献诗颂，仁宗非常高兴，各赐以金银不等。宣宗初，恭王请求迁徙江南，因平凉接近边塞，间谍充斥，冲域熟悉周边情况，应在平凉戍边卫国。未得到批准，韩昭王雅嗜诗书，为韩藩子弟建立崇文书院。善真草，有《冰壶遗稿》《千字文法帖》等行世。遗著早已佚失，现仅存崆峒诗三首。韩定王怨宗室之横，颇绳之以法，遂结怨于宗室，嘉靖三十二年（1533年），以襄陵王融焚为首、联合宗室二百余人上告朝廷，经派员勘查、情况不实，革融焚等禄。前数代的韩王好佛，静宁进士王源瀚《平凉竹枝词》：“东观浮图起七层，禅房罗列夜传灯，韩藩好佛人多化，处处经声处处僧。”今东关的宝塔为昭王妃纪念昭王所建，《赵时春集》有《东塔寺记》，建塔始于嘉靖十四年，止于二十五年，历时十年半才竣工，崆峒山的凌云塔与延福寺塔形制相似，都为明代所建，或也与韩王有关。可知道的在平凉城内外建有：崇福

寺、南庄寺、韩二府寺、韩六府寺、褒四府寺；天水著名的仙人崖，有韩碑一座，也曾为韩王所有，并要在岷州建广福寺，被陕西守臣所阻未能建成。后数代韩王信奉道教，崆峒山盛时八台九宫十二院，大部为韩王所建。城内除柳湖园囿之外，有山庄别墅（今之山庄坑），因势为林壑，匾曰“城市山林”。城外有南庄别墅，亦极林泉之胜。《平凉府志》说：“东西临泾，别墅台榭、池沼相望，亘二十里，自仲夏至九月游人相属。”《明史·韩宪王传》记：“诸贫宗往往凌劫有司，平凉知府吴世良、邝衍、任守德王松，先后被窘辱。”《泾州志》载右参政昌时撰《分守关西道重建泾州记》内云：“……韩藩宗室繁衍，中多骄横恣睢负逋，奸民或投愿，坏法禁，郡守以下被凌践，无论凡庶……”。明代凤翔平凉二府属关西道，弘治末因宗室凌侮守臣、侵扰军民，日益严重，随将关西道由凤翔移至平凉，这个关西道因韩王势大威重，处境困难，在平凉仅住了八年，换了三任，后迁至陇州。

在韩王统治平凉的212年中，由于受到朝廷的严加管束和防范，韩王在平凉未敢有大的越轨行为，但仗势欺人、占夺民田、凌辱有司的事件时有发生。明代的平凉城就是现在的城垣，《府志》记：环城九里，从西门到东门，“夹街阴阳、无不朱垣户而筒瓦者。”都是王爷与将军的府第。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攀龙诗云：“春风萧条白日斜，平凉西北见天涯。唯有青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平凉府志》称：“仪卫典仗，什百群牧，不下万人。”郡王府以下的服务人员《平凉府志》说：“王而郡者二十，有典仗户各百者四，仗有户五十者二，其余亦不啻三十户，私人不与，盖不啻万也。”又记：“将军以下至乡君、殆千矣，役多者数百人少者亦十数人，又不啻万也。”这就是说，韩王府的服务人员有一万多人，二十个郡王府也有一万多人，将军以下各府也有一万多人，仅此粗略估计已

超过三万以上。这批服务人员包括左右长史等高级官员和一部分官吏由国家供给。其中低层服务人员占最大比例的典仗户、仗有户，都是以户为单位，应该是世袭的。韩王就藩时已无兵权可言，但仍有护卫军1080人，群牧旗军466人，以后数次裁撤，至嘉靖时，东中护卫有前、后、左、右四所，食粮步兵300人；安东群牧千户所有食粮旗军210人。韩王的东中护卫有屯地7699顷，遍布于平凉全境。《灵台县志》记：“右护卫军屯，韩府地也，其盈歉每持势侵夺，或投献作敬地也。赋税仍由民纳。”明初规定不准宗室营私产，但韩王府却经营着大量的工商业。明代平凉府东关有六个厢，其中五个厢“多王府邸店，间有民居”，仅最东边的厢多为民居“王府邸店始寡矣”。可见王府邸店布满了平凉东关，垄断了平凉工商业。《明世宗实录》卷369记：在陕西，韩王兼并山田市肆，虐杀无辜，夺占平凉府属大半土地。《平凉府志》亦载：“环郭膏壤悉归宗室，六厢之民莫得而有之。”

第一代韩宪王死于南京，葬南京牛头山，末代韩王国亡被执，葬于平凉者应有九个韩王。除末代郡王下落不明者，应有69个郡王葬于平凉。加之先韩王来平凉的安惠王，平凉应有亲王、郡王的坟墓70座。近年来在泾川县王村乡完颜村发现韩恭王墓碑，在大岔河发现韩怀王妃墓志，在南塬发现韩康王墓志，还有数处墓葬未见文字，不知墓主是谁。

三、安王

安王朱楹，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二子，生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藩平凉，至永乐六年（1409年）就藩，永乐十五年（1417年），安王朱楹逝，谥安惠王，葬于今平凉市安国镇泾河北油坊庄，由于无嗣，封国被朝廷撤销。安王就藩前后，朝廷按定制即派员修建王府，待安王就藩平凉时，王府的中心部分已

具规模。据《平凉府志》记：王府在平凉城内定北门之西，东起北门，西至府学，外有萧墙，内有砖城，周围五里，前有棂星门、端立门、承运门。内有承运殿、存信殿、东府宫、秉忠堂、慎德堂、惠迪堂、玉渊堂、揽秀楼、看花楼、金香亭、体良亭、永春园、聚春园等，已初步形成建筑宏伟，雕梁画栋，巍峨壮观的王室宫殿群落。明初时，亲王的待遇非常高，不仅有官属，而且有朝廷专门划拨给亲王们的护卫甲士，少则三千人，多则一万九千人。按照朱元璋“分制海内”的战略思想，亲王们或屯兵于腹地、或驻防边塞要津，他们与中枢太子遥相呼应，以“立太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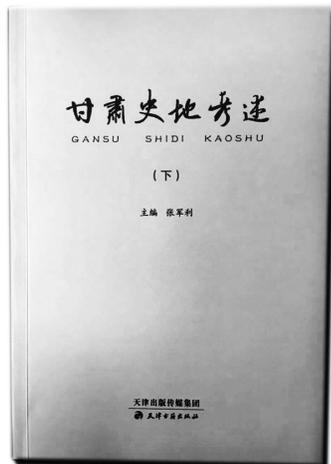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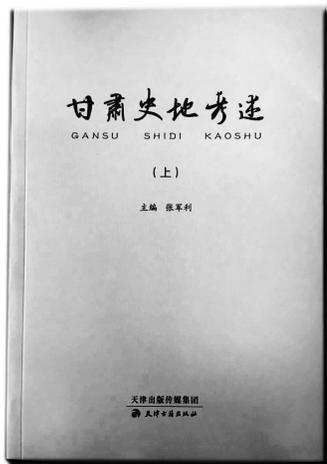
天下本”“用宗室以为天子屏藩”，从而永保朱氏天下平安。而朱元璋的四子朱棣从其孙子手里夺得天下后，从自身篡权经历中总结经验，对封藩各地的兄弟们提防有加，不仅收回了王子王孙们的兵权，而且对藩王的其它权利及自由都做出了严格限制，不准藩王干预地方政务事务，严禁各王私下相见，就连出城扫墓也要获得批准后才能前往。安王驻藩时，基本也已处于享有俸禄而无实权的状况，加之实际驻藩平凉时间较短，王位上少有作为。

(作者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地考述》出版发行

2018年3月,《甘肃史地考述》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分古代文献选和当代论文选上下两册,共83.6万字。《甘肃史地考述》选编《二十五史》及历史地理著作中有关甘肃的部分资料;同时收录有关甘肃史地的理论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论述公允,观点新颖,是对甘肃重大历史地理问题的深入阐述,为甘肃史地学术领域提供了更为完整的研究史料。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李佳潞供稿)

成纪县治之两迁三个阶段

□ 朱克雄

摘要：西汉建立的成纪在旧治小坑川，即今天的静宁县治平乡，为历史上的“治平成纪”，经历两汉、三国、西晋、十六国，至北魏时废。北周宇文氏复置成纪县，在唐开元年间，因陇右大地震，成纪亦由旧治小坑川移至显亲川，即“显亲成纪”，此为成纪县治之一迁两个阶段；后秦州州治、成纪县治一并南迁至秦州，即“秦州成纪”此为成纪县治之两迁三个阶段。

关键词：县治成纪 “治平成纪” “显亲成纪” “秦州成纪” 两迁三个阶段

上古成纪是伏羲所生时代的成纪，在今渭水支流葫芦河中、下游流域。即今甘肃省秦安县全境，天水市区北部，静宁、庄浪县南部和甘谷县东北部之地。伏羲、女娲的传说源于古成纪，伏羲、女娲生活的时代，尚无文字，有关的古代文献资料，是后人根据传说写成，难免记载不一，出现矛盾，况且作为“人文初祖”的伏羲、女娲，其影响远远超过原来的居地。各地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反映了上古中华各民族或部族之间迁徙交融的史实。随着氏族或部族人口的繁衍，必然向外迁徙。其迁徙路线主要有向东和向南两支：向东的一支，经陕西关中、河南，到达山东西部，与当地东夷族融合，并将其文化传播到黄河中下游流域。向南的一支到达四川、湖北、湖南，与当地巴人苗族结合，并将其文化传播到长江流域。

陇西成纪自秦汉建县以来数度迁徙，最终南迁到秦州，并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止。对于成纪南迁之史实，学界是公认的。现争议不休的是南迁的一些细节问题，如汉成纪何时一度撤销，治平川与小坑川是同一个地方，还是两个地方？如果是一个地方，就不存在迁徙之说，如果是两个地方，何时由治平川迁到小坑川，何时又由小坑川迁到显亲川，何时再由显亲川迁到秦州藉河川等，还有一个连带问题——秦州徙治和成纪的关系及南迁实情如何？目前在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中主要形成了“成纪三迁”之说和“成纪四迁”之说，其实，如果“成纪三迁”之说中的“治平成纪”和“小坑川成纪”不是一个地方，那么除一些细节记述略有不同之外，“成纪三迁”之说就和“成纪四迁”之说基本是一致的；反之如

果“成纪四迁”之说中的“治平成纪”和“小坑川成纪”是一个地方，那也就统一为“成纪三迁”之说了。笔者以为“成纪三迁”之说实际上是“两迁三个阶段”，同理，“成纪四迁”之说实际上是“三迁四个阶段”。从成纪具体地理位置间的距离和相继发现的一些文物来看，“成纪三迁”之说即“两迁三个阶段”更符合历史之本来面目。

关于成纪两迁三个阶段之说，其主要内容是：西汉建立的成纪在旧治小坑川，即今天的静宁县治平乡，这就是历史上的“治平成纪”，在经历了两汉、三国、西晋、十六国，至北魏时废。北周宇文氏复置成纪县，但在唐开元年间，因陇右大地震，成纪亦由旧治小坑川移至显亲川，此为“显亲成纪”，这是成纪县治之一迁两个阶段；再后来，秦州州治、成纪县治一并南迁至秦州，即“秦州成纪”这就是成纪县治之两迁三个阶段。

第一个成纪县治——治平成纪

汉初成纪县属陇西郡，后属天水郡。最早记述成纪地理位置的是酈道元所著《水经注·渭水》，其文曰：“瓦亭水又南，经成纪县东，历长离川，谓长离水。右与成纪水合，（成纪）水导源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经成纪县，故帝太皞庖羲所生之处，汉以为天水郡县，王莽之阿阳郡治也。”这段文字明确告诉我们，北魏以前成纪城的地理位置在成纪水流域。成纪水即今治平河（又名南河），发源于通渭县，全长约100公里，流经义岗、寺至、陇川三乡后进入静宁县界，在静宁流经长约55公里，经新店、治平、李店三乡，于仁大河会入瓦亭水（今

葫芦河）。因此，最早之成纪在今静宁县治平川的古成纪水旁。刘德熙主纂的《秦安县志·建置》附考有：“成纪县治，初在静宁州西北八十里之治平川，继在今秦安县北三十里之显亲川，最后乃入今秦州。成纪以庖牺氏孕十二岁而生得名，汉即其地建县。”《后汉书·隗嚣传》注云“成纪在今陇城县西北是也。”此治平之成纪也。后汉分为显亲侯国，魏晋为县川，由是有显亲之名。元魏时成纪废，显亲亦并安夷。显亲暂复，终废周宇文氏，遂即其故治西北重建成纪。唐开元中，秦州地震，徙治于此，《唐书·地理志》所云“秦州徙治成纪显亲川是也。”此显亲成纪也。“继郡县悉废于陷吐蕃八十年中，大中收复，乃即旧雄武城建今秦州治，并成纪徙而倚焉。后天水郡废，兼以成纪名郡，此秦州之成纪也……夫开元之徙，徙州以寓县；大中之徙，徙县以倚州，州所寓者，周所迁之成纪也，与州治无涉也；县所倚者，唐所建之秦州，时上邦改镇，故徙成纪附州治，非成纪本治也。”甘肃省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目录学家临洮张维反对这一段考证说：“志于沿革，古迹考证颇详，然谓汉成纪县在今静宁



全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西北之治平川，后周始迁于显亲川，殊为无据，成纪之县自汉迄周末未闻迁移”。虽然，成纪迁徙在《隋书》以前的正史《地理志》中“未闻迁移”，即没有明确记述，但迁徙之事实在一些相关之史料中暗含，并非是刘德熙妄下结论；且汉成纪之治所在治平川即《水经注》所言之“成纪水”河谷，城址至今犹存，“治平成纪”之说是成立的。当然，刘德熙的考证不是完美无缺，他注汉成纪：“在静宁川西北八十里之治平川”即是大误，因为治平川在今静宁（原静宁州治地）之西南治平乡一带，而非西北。对此，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24《附考》详加辨析：“《秦安县志》据《后汉书》注成纪在陇城县西北，《水经注》‘陇水流经瓦亭南’之文，谓成纪初在静宁西北八十里之治平川，继在秦安北三十里之显亲川，最后乃入今秦州，其言甚辨析，然谓汉至后魏之成纪在静宁西北，实臆说也……”。这一辨驳是有道理的。由黄廷钰、魏柏树点校，由兰州大学1996年出版的《（康熙）静宁州志·形胜》有言：“（州）又南十里至靳家寺，十里至营屯寨地，又二十里至威戎镇……自威戎而西，迤南四十里至治平川，接通渭界。”“十里”加“十里”加“二十里”再加“四十里”正好就是“八十里”。又，乾隆《静宁州志·堡寨》“治平故城”条言：“在州南八十里之治平川”，都可证“八十里”是对的。所以，“西八北十里”实“西南八十里”之误。颇疑失误源自刻者，而校者不审，使“成纪县治初在静宁州西北八十里”成为“臆说”。刘德熙“成纪三迁说”在大方向、大环节上是正确的，其首倡开拓之功不可磨灭。后代学者论及成纪问题，或在细节上有所创见，而谁也不可能无视“三迁说”。当然，“成纪三迁说”在三迁的具体时间确定，地点定位上不周详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附考》对成纪迁

徙有补考，而不周详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汉成纪县废止之时间及相关问题《隋书·地理志》中有：成纪，旧废，后周置，有龙马城，仙人峡。“成纪”指的是汉成纪。“旧废”是说以前撤销了。这都是追述之言，基点是“后周置”，言明“成纪”在后（北）周之前废。北周（557-581年）存在区区26年，如在本朝就用不着“旧”和“新”之称，“旧”只能是指北周之前的某朝。那么，到底成纪“旧废”于那一朝呢？成纪在东晋十六国时是存在的，史籍中屡见不鲜。《晋书·乞伏乾归载记》有云：“（吕）光又伐之，咸劝其东奔成纪，乾归不从”，事在东晋太元二十年（396年），乞伏乾归的根据地在苑川即今甘肃榆中境，吕光在河西，吕光东侵，故乾归部属有“东奔成纪”的提议，可见成纪位置还是相当重要的。东晋十六国而下，便是统一黄河流域的北魏了。由于《魏书·地形志》中不列成纪县，于是古今绝大多数学者认定成纪废于北魏。刘德熙考证有“元魏时成纪废”等语，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附考》亦有“自西汉至唐天宝之成纪县，在此中间虽暂废于后魏，重修于后周……”等语。对类似的主流观点，杨守敬《水经注疏》提出不同看法，在纂疏《水经注·渭水》“瓦亭水又南，经成纪县东”一语时加按语：《地形志》不载成纪县，而孝昌中，吕伯度败杜粲于成纪，是孝昌以前，成纪未废，故不称故城。此下成纪故城，明是两城，而《地形志》脱之，所以张瀛暹有《延昌地形志》之作是也。杨守敬之后，其孝昌之前“成纪未废”的观点并未得到认同，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分册即不标成纪县；再如迄今历史地名类词典中规模最大的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成纪条”亦记“北魏废”。相关的地方志及论文也是众口一词，均言汉成纪“北魏废”。但紧扼史事，不

得不佩服杨守敬先生明察秋毫，其据《魏书·萧宝夤传》吕伯度败杜粲于成纪的史实，断定“孝昌以前，成纪未废”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他一并指出，《水经注》所记“成纪”和“成纪故城”“明是两城”。不过杨守敬先生并未将成纪到底废于何时等问题说透，还需要对吕伯度败杜粲于成纪的史事再行料理一番。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6年），以匈奴人莫折大提、莫折念生父子为首的秦州起义爆发，莫折念生自称天子，置官建号，势力一时席卷关陇。随后，北魏以萧宝夤为大都督入关镇压，和起义军相持于陇山一线。正当战局吃紧之时，起义军内讧，莫折念生部将吕伯度倒戈，在胡琛的支持下，攻击莫折念生，于是就有了一条杨守敬提及的，为众所忽视的，于判定汉成纪位置及其废于何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量级资料：胡琛以伯度为大都督，秦王资其士马，还征秦州，大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遂至显亲。念生率众，身自拒战，又大奔败。事在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距北魏分裂仅8年。文中的胡琛，乃拥兵割据称王高平的敕勒族酋长。初，吕伯度据显亲反莫折念生，实力不济，便投奔身在高平（今宁夏固原）的胡琛，在其支持下，攻击莫折念生。由所引资料可以看出，其进军线路大致是：由高平西向越陇，再自北而南至先成纪至次水洛城至显亲。通过资料记述的进军线路和次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信息：其一，北魏朝，汉成纪是存在的。而据《隋书·地理志》“旧废，后周置”的记载可判定，废成纪者肯定是北魏之下，北（后）周之上的过渡王朝西魏了。其二，由进军线路成纪至水洛城至显亲的次第，结合《水注经》可判定此三古城的大致方位，也可判定北魏时的汉成纪依旧在水洛城西北的成纪水（今甘肃静宁李店乡的治平河，又称南河）流域，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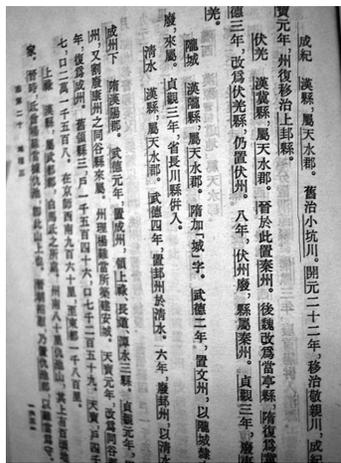
洛城之西南则进入今甘肃省秦安县境，显亲无疑在今秦安县显亲河谷。再以水洛城为中心对成纪的位置做进一步的论证，水洛城治所在今甘肃省庄浪县县城（水洛镇），北魏水洛城（亭）原址上，北宋刘沪所筑水洛城址轮廓至今依旧可见，对照《水经注》，城北即是水洛水（今名水洛河），南则是犍奴水（今名南河），二水在今庄浪县县城西南会合，流经石门峡（此段《水经注》称石门水）后汇入今葫芦河。水洛城当上陇孔道、番须道要冲，北魏以降，一直是军事重镇。其名称《魏书》凡五见，《周书》凡三见，除吕伯度攻莫折念生经此地之外，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魏骠骑将军，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征讨王庆云，万俟道洛，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魏夏州刺史宇文泰征讨侯莫陈悦，关键性的战役都发生在水洛城，陷水洛而陇右平。宇文泰的进军路线为从平凉上陇，首陷水洛城，次陷略阳，最后围侯莫陈悦于上邦，悦逼迫自杀，这和吕伯度的进军路线基本相同，都是沿葫芦河（瓦亭水）南下。宋代水洛城依然是陇右最重要城堡之一，《宋史》凡十七见，《金史》凡六见。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至四年三月，北宋名将刘沪在原址上增筑，补葺，成新水洛城，达到了“以通秦（州），渭（州）之路”的效果，从而形成了东连渭州（今甘肃平凉），南通秦州，北以陇干为屏障的陇右防御体系。这说明，经关中上陇，凡历瓦亭、鸡头、番须道而南下秦州者，都必须经水洛城，而成纪由水洛城西北治平川南迁显亲川，最后迁至秦州之方向线路正与此同。水洛城位置确定后，再回过头审视吕伯度还征秦州之时“大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遂至显亲”之史实，则成纪位置必然在水洛城之上或平行，由此可论定《水经注》将汉成纪定位在成纪水流域无可置疑。理清



汉成纪铭灰陶壶和陶壶肩部刻有2列小篆体的“成纪容三升”5字铭文

水洛城和成纪相对位置之后，再讨论一个新问题：成纪水流域的成纪故城和成纪的具体位置。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瓦亭水又南经成纪县东，历长离川，谓之长离水。右与成纪水合，水导源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经成纪县故城东（杨守敬按：此是汉以来成纪县故城，当称故城，而“县”下却只有一“故”字，盖传抄者落“城东”二字。酈氏每叙沿革在故城之下，故知此有“城东”二字，赵以“故”字下属，非也。）帝太，嗥庖羲所生之处也。首言“成纪县”，次言“成纪县故城”，这中间大有文章。正应了杨守敬分析：“是孝昌以前，成纪未废，故不称故城。此与下成纪故城，明是两城……”。说白了，北魏之前汉置的成纪县有过迁徙。至于“成纪故城”也就是刘德熙所言“治平成纪”，今人以《水经注》相关记载结合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静宁治平古城之考古成果。历年出土之板瓦、瓦当等秦汉文物，确认古城即是汉成纪故址，具体地点在“今静宁县城南50公里处的治平乡刘河村南的川河台地上。治平河、深沟河在城东约300米处交汇，两河交汇后，古称成纪水（今称李店河），在仁大毛家坡附近注入葫芦河（古为瓦亭水）”。这里应把重点放到寻找北魏尚存的成纪县址上，既然《水经注疏》《刘沪筑水洛

城及相关事迹考》《宋史论略》《成纪故城》《根在成纪》以“故城”称成纪，则此成纪魏之前或迁或废，或降级不为县治，那么北魏的“今”成纪县治又在何处呢？依然从吕伯度的进军线路说起，吕投奔高平胡琛，再上陇攻击莫折念生，其上陇走的必然是距高平最近的瓦亭道（或称木峡关道）。“此道是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由关中通向陇右，仅次于陇关道的重要陇山通道，从古高平（今固原）城起西南行，经木峡关陇山隘口，至西瓦亭，然后沿瓦亭川（今葫芦河）南下秦州。这一古道通过陇山时紧靠战国秦长城，在长城内侧，最迟在战国时已形成”。吕伯度上陇“还征秦州”的目的是最终夺取秦州，所走当然是南下秦州最便捷的路即沿瓦亭水一路南下，在此过程中首先“大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按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遂至显亲。”则此“成纪”必然距瓦亭水不远。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就在接近瓦亭水的成纪水流域寻找迁徙后的成纪，成纪水（李店河）入瓦亭水（葫芦河）处，今甘肃静宁仁大乡之陈家南门村，其上游宋以来有治平川之称的川地即汉成纪治地所在，下游则是明清称仁当川今称仁大川的川地。虽然就现有资料无法准确定位迁徙后的成纪县址，但可模糊断定迁徙后的成纪就在今静宁县仁大乡所在的仁大乡川地。汉成纪县为什么要迁徙，想必和陇右政治中心迁移有关。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从陇西郡析置天水郡，其郡治即在平襄（今甘肃省通渭县城西），由关中进入陇右之后，



《旧唐书·地理志》

沿成纪水西上，通平襄的道路当然就显得十分重要，那么按近平襄的成纪显然就是要冲所在。东汉以后天水郡治移到冀县（今甘肃甘谷县城西），晋初移到上邦（今甘肃天水市区），接近平襄的成纪的位置便没有那重要了。魏晋以下，秦州成了陇右的政治中心，不论是陇关道，还是鸡头道、瓦亭道，其指向都在秦州。东晋隆安四年（400年）魏常山王遵袭没奕干高平，干弃其众，率数千骑奔秦州，魏师追至瓦亭，不及而还。远离南北向葫芦河（瓦亭水）干流的治平成纪（治平、仁大之间距离约为45公里）其地位下降是必然的，迁徙至成纪下游仁大川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古来南下秦州之路就是沿葫芦河谷南行的。北周成纪置于何地？《旧唐书·地理志》“成纪”条说：“成纪，汉县，属天水郡。旧治小坑川，开元二十二年，移治敬亲川，成纪亦徙新城，天宝元年，州复移治上邦县。”对“旧治小坑川”学术界基本认定就是汉成纪的治地治平。

第二个成纪县治——显亲成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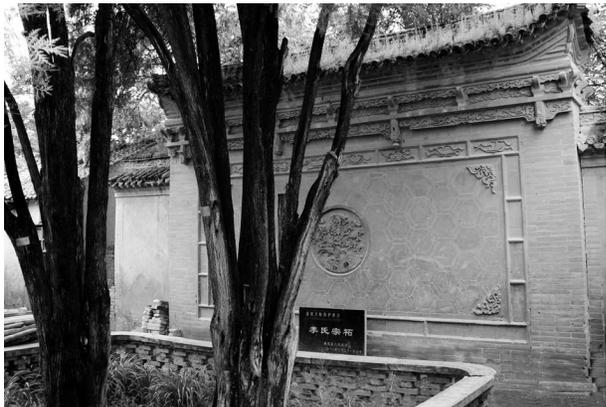
“开元二十二年，移治敬亲川”，这指的是秦州州治因地震由藉河河谷的天水市区迁到了敬亲川，省略的主语是秦州而非成纪。祝世林《陇山重要古道综述》《平凉古代史考述》：“成纪亦迁新城。”其一，这里的“成纪”无疑就是汉成纪西魏废后，北周复置的成纪；其二，“亦迁新城”表明，不但秦州迁到敬亲川的新城，而且成纪县也迁到新城。那么，州城、县城一并迁治的新城在何处呢？道光《秦安县志·建置》：“显亲川亦云阳兀川（即显新川异名）何氏地掘得石刻，有‘成纪’字，是皆足征也。”是说显亲川何氏地掘得有“成纪”字样的石刻。1965年，秦安叶堡乡杨家沟唐墓发现刻字砖一块，可辨认部分有“口（秦）州成纪县安乐乡安乐里”字样，两者结合足证唐成纪就在今秦安的显亲川。魏晋之显亲川，



秦安显亲成纪

唐之敬亲川（因避唐中宗李显讳而改），明清之阳兀川，今之显亲川，名异而地同。秦安叶堡乡至今有一名“金城”的行政村（属显亲川），当正是“新城”所在地。地震大灾过后，人们最希望安居乐业，将“新城”所在地命名为金城，取“固若金汤”之意，自在情理之中。在将迁到“新城”的成纪定位之后，我们再来找未迁之前的成纪身处何地。贺次君《括地志辑校》有言：成纪，汉县，在秦州成纪县北二里。就是说在迁至新城的成纪县北有“成纪汉县”或者说新旧成纪县相隔二里。《括地志》：唐太宗子魏王李泰领衔撰，贞观十六年（642年）表上，南宋时亡佚。这里所引则是今人之辑佚本，考证的是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地震之后新城和故城位置，何而能引93年前的著作？其实，这里所引所谓《括地志辑校》之言实为《史记正义》作者张守节之言，为《括地志》辑佚者误人者，张守节“正义”以详释地理取胜，而其释地理又多依《括地志》，《括地志》则得“正义”而部分保存，而张守节语和《括地志》语多混同而后人不辨也是常事。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成纪凡六见，两条说李广，李蔡乃“陇西成纪人”，四条说汉文帝十五年（165年）“黄龙见成纪”相关事，其中《封禅书》事关“成纪”一语下引《史记正义》注：“成纪，今秦州县也。”《李将军列传》事关“成纪”一语下引

注“成纪，秦州县。”《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事关“成纪”一语下引注“秦州县也。”四库全书本《史记正义》则于《封禅书》事关“成纪”一语下注“成纪云，秦州县也”，《李将军列传》事关成纪一语下注：“成纪，秦州县”。今人张衍田之《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为“正义”辑本集大成者，本书于《孝文本纪》事关“成纪”一语下引“正义”注云：“……成纪，在秦州县，本汉县至今，在州北二里。”又对第一个“在”字加按语云：“在《封禅书》黄龙见成纪句，《正义》云‘成纪，今秦州县也。’当以‘今’是。现在，再对照《括地志辑校》‘成纪，汉县，在今成纪县北二里’语，即可辨其所谓《括地志》文则完全是张守节注文，而《史记正义佚文辑校》所辑之张守节文则在辗转流传过程中将文字间顺序完全颠乱，几不可读。《括地志辑校》所谓《括地志》文则正是张守节《史记正义》文之正装版，将它们抄在一起就很好甄别。《括地志辑校》：成纪，汉县，在秦州成纪县北二里。《史记正义佚文辑校》：成纪，在秦州县，本汉县至今，在州北二里。两项比较，第二条比第一条多出“本”“州”“今”三字，而“本”“今”两字外，“州”在第一条中有包含，“本”“今”两字放到第一条中相关位置，可使语义更妥贴。可见分列两书中的佚文



秦安显亲成纪李氏宗祠

都是张守节的自注文，第二条只是词序错乱而已，两厢合并，拨乱反正，可以得到这样一条关于《史记正义》“成纪”注的佚文：成纪，本汉县，在今秦州成纪县北二里。这就是说在迁至“新城”的今成纪县北二里处有“成纪，本汉县”。按吕伯度的进军路线，汉成纪县只能在今甘肃静宁境内古瓦亭水支流成纪水河谷，和今秦安县无涉，秦安虽和静宁相连，而“新城”即金城里成纪之北二里决不会到成纪水（今李店河）河谷。反过来说“在今秦州成纪县北二里”的“成纪”绝不会是汉成纪县。张守节《史记正义》成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即《旧唐书·地理志》所谓“成纪亦迁新城”两年之后，对他那个时代的“今”成纪县治所理应是清楚的。所以，“在今成纪县北二里”的所谓“成纪，本汉县”当正是北周所置的成纪了。北周至于开元，过去近200年，又成纪本汉置，中经废立，误北周成纪为汉成纪也情有可原。对这个成纪的位置，甘肃联合大学马志荣，秦安县志办王文杰有详考，认定在秦安县安伏乡安伏川。并言有残留城址和“安伏家的一座城，叶家堡的半个盆”等民谣。这里取马志荣、王文杰考定“在今成纪县北二里”的地望“小坑川”即安伏川，而不取其汉成纪在小坑川即安伏川的观点，这是误北周成纪为汉成纪也。安伏川与显亲川相连，为山间盆地，“西靠阳极山，东依锦带山，南接玉钟峡，北带锦带峡，因此，今称安伏盆地。盆地由葫芦河一级阶梯构成，阶面海拔1270米左右，葫芦河东岸保留有较完整的二级台地。”盆地伏家洼堡子梁之阳坡古有女娲宫，正是《水经注》注瓦亭水支流石岩水时“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之女娲祠所在。盆地之南的玉钟峡，古称显亲峡，有伏羲女娲成婚和伏羲演画八卦的传说。这些事实又和《隋书·地理志》“成纪，旧废，后周置。有龙马城，仙人

峡”隐义相对，仙人峡盖显亲峡，而龙马城则显然是因龙马负图，伏羲则之而画卦之传说而得名。以此可论定，《旧唐书·地理志》言成纪“旧治小坑川”之小坑川正是安伏川亦即安伏盆地，也就是北周成纪之治所。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附考三》指出：《旧唐书·地理志》成纪旧治小坑川，开元移治敬亲川，敬亲即显亲也。小坑川即后周重立成纪之治所。本志的主纂者伏羌王权、秦州任其昌为名扬陇右的硕彦鸿儒，精于考证史事，世人以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为良志。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的大地震，震中在秦州之藉河川，秦州破坏严重，惊动朝廷，《资治通鉴》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二月壬寅，秦州地连震，坏公私屋殆尽，吏民压死者四千余人，命左丞相萧嵩赈恤。”秦州于是移治于成纪敬亲川。由《旧唐书·地理志》“成纪亦徙新城”一语知，秦州移治之地和北周成纪所徙之地俱是新城，即今秦安县叶堡乡的金城村。秦州地震，“坏公私屋殆尽”，百里之外的安伏川北周成纪也当波及，“亦徙新城”说明“坏公私屋殆尽”，大震过后，余震不断，作为抗震救灾措施，秦州之北迁原本需要，但属临时安置措施，因此，数年之后的天宝元年又迁回了原治地上邦。而北周所置成



天水伏羲庙

纪就在新城“定居”了。显然所谓“新城”是地震之后所建，并不是原有的。至“新城”为何要选择《旧唐书·地理志》所言的敬亲川，这是由卜者占祸福，阴阳看风水等因素即现代人所说的“迷信”决定，现在无从知其详。但是，当时秦州治地在震，成纪之敬亲川必然也在震，破坏程度亦相近。

第三个成纪县治——秦州成纪

秦州之北迁又南移及成纪之南移明确见于史册，秦州始置于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时州治在冀县（今甘肃天水市甘谷县西），中暂废，惠帝太康七年（286年）再立秦州，秦州州治，天水郡郡治一并迁移上邦，即今天水市城区。南北朝社会动荡，而秦州治所始终未变，到了唐代因地震而州治临时北迁。《旧唐书·地理志》“秦州中都督府”条说：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缘地震，移治于成纪之敬亲川。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天水郡，依《秦安县志》部督府，督天水、陇西、同谷三郡。其年，复还治上邦。乾元元年（758年），复为秦州。《新唐书·地理志》“秦州天水郡条”说：中都督府，本治上邦，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以地震徙治成纪之敬亲川。天宝元年（742年）还治上邦。大中三年（849年）复徙治成纪。需要说明的是入隋州郡县三级制变为州县或郡县二级制，有州的时候设郡，有郡的时候设州，州郡名称时有转换，有时称秦州，有时称天水郡，秦州和天水郡并没有统辖关系。上引《新唐书》秦州和天水郡是并列关系，并非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是秦州领天水郡，在秦州和天水郡之间加一顿号就明确了。中华书局标点本在二者之间不加标点，作“秦州天水郡”状，容易使人犯糊涂。两唐书上有一点说得很明了，秦州之北迁又南移，全是因地震而致，是年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旧唐书·玄宗纪上》说：

“（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庐舍崩坏殆尽，压死官吏以下四十（千）余人。殷殷有声，仍连震不止。”又，《旧唐书·五行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又，《新唐书·玄宗纪》：“二月壬寅，秦州地震，给复压死者一年，三人者三年。”又，《新唐书·五行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秦州地震，西北隐隐有声，坼而复合，经时不止，坏庐舍殆尽，压死四千余人。”四条资料说的都是一件事即秦州大地震。据估算震级达7级，烈度9度。地震破坏力很强，廨宇即官员办公室、居人庐舍、民房“崩坏殆尽”，压死官民4000余人。州署官员没有了办公室，于是迁往“成纪之敬亲川”寄治“新城”。寄治是权宜之计，因此，天宝元年（742年）即在“成纪之敬亲川”寄治9年之后又还治原地上邦，想必是上邦之城垣已修复，官舍已建成，故还治。就是说秦州治北迁又南移了。《新唐书·地理志》在说完“天宝元年还治上邦”之后，又添一句：“大中三年复徙治成纪”，而不提此次“复徙治成纪”之后何时迁回上邦，《宋史》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就来了。秦州于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二月陷落吐蕃，而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沦陷吐蕃的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萧关等七关守将归顺唐朝。同年七月，唐凤翔节度使李砮接收秦州。唐升秦州防御使为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等待了87年之久，陇右重镇秦州光复，而为何要在收复的当年将州治从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的藉河谷地迁到相对次要的敬亲川呢？要知道，由唐代，长安西去，经陇坻（又称坂），取道秦州、渭州、临州、兰州、凉州而通西域之道是东西交通的主干道，唐玄奘西行取经，高适游幕河西，岑参赴安西，杜甫之流寓秦州均经此道。《中国通史·隋

唐五代卷》七十九记载秦州等陇右诸州收复后，宣宗颁《收复河湟制》有云：“秦州至陇州以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委李玘与刘皋即便度计闻奏。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其官健父兄子弟通传家信，关司并亦不得邀诘阻滞。”严耕望对此的评论是：“置堡栅与秦州接应亦委凤翔节度，并明述官商交通情形，亦正见凤翔至秦州为大道也。”宣宗的诏令是对新复沦陷区人民的惠政，特地强调收复秦州的凤翔节度使李砮等人便易行事，在要害之处置堡栅以保证秦州至陇州即陇坻道的畅通，政府没有任何必要将丝绸之路重镇秦州的治所迁往他所。否则，如何保证途经秦州的关陇大道畅通，《新唐书》“大中三年复徙成纪”的说法是有必要怀疑的。此一颇显唐突之语，疑其上下均有脱文。然而，正是有了《新唐书》的这一说法，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时期”分册统统将唐开元之后，北宋之前的秦州标在“成纪之敬亲川”。而学术界也是众口一词，认定北宋之前包括五代十国在内，秦州治所一直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成纪亦迁新城的“成纪之敬亲川”的金城里，即秦安县叶堡乡金城村。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资料证明，秦州在宋之前治在今秦安县境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这些资料就是晚唐诗人许棠的诗作。许棠（822年—？），字文化，宣州泾县（今安徽泾县）人，咸通十二年（871年）进士，历泾县尉，虔州从事，江宁丞等，有诗名为“咸通十哲”之一。今《全唐诗》卷收其诗两卷计154首。由诗可得知许棠曾于中进士之后的某年奉命来秦州，一路上都有诗作，如《陇州旅中书事寄李中丞》《过分水岭》《陇上书事》《塞下二首》《题秦州城》《隗嚣宫晚望》《成纪书事二道》《边城晚望》等。从诗题即可看出许棠是由陇州过分水岭（即陇坂）到达秦州的，走的就是唐

代直至宋繁盛不衰的陇坻道。《过分水岭》：陇山高与鸟行齐，瞰险盘空甚蹶梯。云势崩腾时向背，水声呜咽若东西。风兼雨气吹人面，石带冰凌碍马蹄。此去秦州别无路，隔岸穷谷却难迷。《题秦州城》：圣泽滋遐徼，大荒收虏帐，乱烧迷归路。此时怀感切，河陡四向通，遗土复秦风。遥山似梦中，极目思无穷。《成纪书事·二首》：东吴远别客西秦，满野多成无主冢，山河再阔千余里，闲与将军议戎事，蹉跎远入犬羊中，三楚田园归未得，天垂大野雕盘草，难问开元向前事，怀旧伤时暗洒巾，防边半是异乡人，城市曾经一百春，伊兰犹未绝胡尘，荏苒将成白首翁，五原歧路去无穷，月落孤城角啸风，依稀犹认隗嚣宫。《隗嚣宫晚望》：西顾伊兰近，水随空谷转。磧鸟多依地，秋风动衰草，方惊滞极边，山向夕阳偏，胡云不满天，只觉犬羊膻。当文抄公的目的有五：其一，想说明许棠来秦州的路线就是陇州、分水岭、秦州；其二，想说明此线路就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南路，其至晚唐依旧繁盛，而此路是沿渭水而上的，必经渭河南岸支流藉水谷地秦州；其三，想说明《成纪书事·二首》的“伊兰犹未绝胡尘”，《隗嚣宫晚望》的“西顾伊兰近”之“伊兰”即伊州（今新疆哈密）兰州（今甘肃兰州）正是秦州西向直通西域之丝路重镇，也可证秦州的位置原地未动；其四，让大家感受一下杜甫《秦州杂诗》“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的秦州城在“山河再阔千余里，城市曾经一百春”即吐蕃统治八十余年光复之后的边塞氛围；其五，最终想说明，诗中的秦州、成纪、隗嚣宫本在一地，根本不存在《新唐书》秦州“大中三年复徙治成纪”之事。现在再看《成纪书事·二首》之二的最后两句：难问开元向前事，依稀犹认隗嚣宫。隗嚣宫乃西汉末年成纪人隗嚣所建之宫室，遗址在今甘肃天水市区的北山，北

山至今有皇城堡、皇城村，隗嚣败后，宫室所在改建为崇宁寺，杜甫《秦州杂诗》“秦州城北寺，传是隗嚣宫”正是其地。隗嚣宫位置是定死的，不在秦安敬亲川之成纪，而在秦州之成纪。许棠在成纪“依稀犹认隗嚣宫”只能说明晚唐之时，不但秦州治所在“天宝元年还治上邦”之后原地未动，而且敬亲川之成纪也于某时迁到了秦州治所。那么，成纪是何时由葫芦河（古瓦亭水）水流域的今秦安叶堡乡金城里南迁的呢？《元和郡县志》秦州之“成纪县”条说：成纪县中、东南至州一百里，本汉旧县，属天水，伏羲氏母日华胥，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周成纪县，属略阳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秦州，皇朝因之，瓦亭川水，东去县一十五里。似可证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1年）成纪在瓦亭水流域东南至州一百里的今秦安境敬亲川。其实，此时的秦州或成纪都是吐蕃辖区，元和志是在追述皇朝之盛，并不是在写元和时的实情，元和后的长庆二年（822年）大理寺卿刘元鼎出使吐蕃，归来后，成《使吐蕃经见纪略》，有言：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观、至龙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倾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广武梁即今兰州市西固区之河口，武川历来没有确论，注者多谓“不详”。其实，此武川即《水经注》渭水段之“武城川”或“武阳川”之简称，如“街泉亭”简称“街亭”，“秦州城”简称“秦城”之类。武阳川是今甘肃省武山县洛门镇和武山县县城之间的川道，自古是古驿道所在，是由秦州经渭州，去临州，兰州的必经之道。武城川即今武山县的山丹川，经此可通岷州等地。相较而言，武阳川是正道，而武城川是岔道，故刘元鼎所历之武川当

正是武阳川、武川，广武梁，兰州位置确定，则可断定刘元鼎出使吐蕃之路必是陇坻道，所经之成纪和秦州为同一治地。依此，在长庆二年（822年）之前成纪治所就在今天水市城区，所谓秦州成纪。至于什么时候南迁的，资料缺乏，不好判断。这里可以设想，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河西，陇右完全沦陷吐蕃，其后的某一年吐蕃废秦州治所上邦为镇，于是迁成纪入郭作为秦州的首县。《太平寰宇记》“秦州条”有言：“元（原）领县五，今六，并四寨、成纪、陇城……上邦废为镇，伏羌为寨。”或据此将上邦废为镇的时间定在宪宗大中三年（849年）收复秦州之时，这是缺少依据的。本书“秦州条”还有“成纪原在旧州南一百里”，估计“南”乃“北”之讹，应是“成纪原在旧州北一百里”才符合实情。做了上述论证之后，再补充几条五代十国时候的资料以为旁证。五代王仁裕关陇著名文人，先后在前蜀、后唐等朝廷任职，任前蜀秦州节度判官9年，后唐秦州节度判官3年，入仕之前长期在秦州生活，对秦陇掌故非常熟悉。其笔记体著作《王氏见闻录》《玉堂闲话》多记秦州故事，从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来五代时的秦州就在魏晋时的原址即今天水市城区，而非秦安“成纪之敬亲川”。

2006年从西距成纪古城遗址不到1公里的静宁县李店乡五方河村鱼池一带出土了刻有“成纪”铭文的汉代文物，不仅使静宁治平川的“成纪古城遗址”得到印证，而且为羲皇故里“治平成纪说”增添了文物佐证。冯绳武在《甘肃地名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说：“作为县治的成纪，从汉以来至少迁移过三次。最早的成纪县治在静宁县治平乡的刘家河村东南约一华里处，即‘治平成纪’。唐开元中因地震将秦州由今天水市虢州治迁到显

亲川，成纪亦由旧治小坑川由治平徙移至显亲川，此为‘显亲成纪’。大中后秦州州治、成纪县治一并南迁，依雄武由天水隳建秦州，州与县倚，此为‘秦州成纪’。”现在的天水成纪，是唐宣宗大中年间（846—850年）由秦安城北迁移过来的，因此，天水的成纪不是汉时的成纪，汉成纪在今平凉市辖区内。但无论现今平凉的治平成纪，还是天水的显亲成纪和秦州成纪，汉武帝时都是天水郡辖地。

参考文献：

- [1]刘雁翔：《成纪县治迁徙讨论》《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
- [2]马志荣：《成纪县·古成纪·伏羲小考》《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 [3]王文杰：《汉成纪县治考》《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 [4]张志宏：《汉代成纪故城考》《鸡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
- [5]薛方昱：《唐宋成纪故址及秦安县名考》《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
- [6]高世祥：《成纪城与成纪水》《丝绸之路》1998年第1期。
- [7]张丽兰闫晓霞：《治平成纪考》《档案》1998年第1期。
- [8]薛方昱：《成纪考释-伏羲生地成纪地望考》《甘肃史志》2013年第1期。
- [9]魏柏树：《根在成纪》，2004年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作者：甘肃省平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张澍方志学特色论略

□ 张晓彭

摘要：清代西北学人张澍是著名的方志学家，一生编纂整理20余种方志，为多部志书撰写序言，既是方志编纂的中坚力量，又是杰出的方志理论家。张澍把修志工作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一改当时因循相袭之风，根据时代发展和内容需要，科学编排志书体例。他兼容并蓄，既注重材料的收集和文献的考订，又不轻视地理考据，构建了以志存史、史地并重、考证科学这一独特的方志理论体系。他所修志书，考古征今并重，文献征实丰富，讲究经世致用，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张澍 修书编纂 修志理论 学术文化价值

乾嘉盛世是清代方志发展的鼎盛期，大家辈出，编纂了大批志书，形成了地理学派和历史学派两大主流派。西北学人张澍，既是方志编纂的中坚力量，又是杰出的方志理论学家。他以开阔广博的学术视野，采纳众长，兼容并蓄，根据时代发展和内容需求，科学编排方志体例，既重视资料的收集和文献的考订，又不轻视地理考据，构建了以志存史、史地并重、考证科学这一独特的修志理论体系。张澍在方志学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编纂整理20余种方志，为多部志书撰写序言，撰写大量论述方志的文章。张澍将史实、地理、人物、艺文四部分结合，把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艺文志综合进行考察研究，他所修志书，考古征今并重，文献征实丰富，讲究经世致用，具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价值。

一、采纳众长，考古征今并重

有清一代，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清人编纂的方志有6000多种，是宋、元、明三朝流传下来方志总数的5倍。至乾嘉时期，形成了地理学派和历史学派。地理学派以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为代表，该派所修志书内容以自然现象之疆域、建置、山川、物产为主，属于人文政治、经济、文化为辅，最注重考证地理沿革，亦称考据派、考古派。历史学派视方志为历史，认为方志即一方之史，主张以撰史之法写志，主张重文献而轻沿革，编纂方志的目的是保存文献，故亦称重例派。历史派以章学诚、全祖望、鲁一同等为代表。张澍虽然没有专门著述来探讨修志理论，但他具有十分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尊重学术，视

域宽阔广博，兼容并蓄，采纳众长，构建了独特系统的方志理论体系。他不固守成法的革新意识形成了一家之言，把修志工作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对方志的性质作用、体例编排、编纂原则和方法要求，乃至志书资料的搜集考证，都进行了深入讨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开拓了方志学的研究理论。一方面，他重视历史事实、典章制度和人物、职官等政治人文资料，使方志叙述的内容趋向完整实用。另一方面，他又注重地理沿革、民族物产、风土人情的考证收录。张澍将史实、地理、人物、艺文四部分结合，把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艺文志综合进行考察研究，所编志《续黔书》《蜀典》《凉州府志备考》等体例完备，文献征实丰富，历史地理并重，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张澍辑佚的《二酉堂丛书》《十三州志》《三秦记》《沙州记》等地理志和方志占很大比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价值。

张澍十分注重文献资料的搜集，对史料的真实性进行了严格考证，具有传统史家写实的风格。《续黔书》是张澍编修的第一部方志。在贵州任上，他亲自实地考察，进行文献资料搜集考证。《续黔书》卷二收录的《庄豪》《马王辩》《李白至夜郎辩》等文章，都是对有关贵州历史文化著名人物相关事迹的考辨。在《庄豪》一文中，通过考证，他认为古籍当中的“庄豪”即“庄躄”，“豪”与“躄”古音相通，字亦相借，而《云南志》认为庄豪为庄躄之后，是没有根据的说法。《马王辩》通过考证认为玉屏县西北的马王遗迹，所谓马王并非西汉伏波将军马援，而应当是五代时期曾称楚王的马殷、马希范父子。《李白至夜郎辩》一文考证认为，李白确曾因贬到达过贵州。在《蜀典》中，张澍专门对古代巴蜀作家的著述进行了考证辑佚研究，考证文献流传、收藏、存佚状况，反应学术发展渊源流变。《蜀典》

卷十一分上、下两篇，辑录了一批不为一般人所知晓和了解的四川地区古代作家的作品。他考证辨析了《幽梦曲》《东平歌》《龙归曲》《舆邪歌》《伊鸣曲》的传说，考据了《李冰碑》《杨终赋雷电》《杨终晨风诗》等，辑佚了《怨家益法言》《扬雄益州颂》《凡将篇》佚文以及《郭璞岷山赞》《犍为舍人尔雅注》《蜀才易注》《谯周五经然否论》等，还考述了四川历代所刻《石经》的情况。《犍为舍人尔雅注》《蜀才易注》《谯周五经然否论》是其中学术分量最重的三部典籍，在《二酉堂丛书》中被列为副刻图书。张澍的这些考证辑佚，阐幽发微，辨章学术，考证源流，揭示了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四川古代文化，提高了《蜀典》的学术文化价值，扩大了方志的社会影响力，为后人研究四川古代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文献资料。张澍编纂史志时，十分重视文献的出处，对每一条资料的来源都进行了精心考证，使得许多散佚的古籍在这些志书中得以保存。《凉州府志备考》征引文献十分广博，有纪传体的《史记》《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金史》《元史》《明史》等；有编年体的《献帝起居注》《明实录》等；有地理方志类的《元和都县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清一统志》《水经注》《读史方輿纪要》《十六国春秋》《西域记》等；有典制体的《唐六典》《唐会要》等；有史学评论专注《史通》；有类书《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有姓氏书《姓苑》《元和姓纂》等；有文集类《李德裕集》《杜工部集》《汤潜庵集》等；有图书目录类的《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有金石类的《金石萃编》《关中金石记》《金实录》《雍州金石记》《咸阳金石遗文》等；有科技类的《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有笔记类的《芥隐笔记》《仁恕堂笔记》《十驾斋养心录》等；有《高僧传》《神僧传》等传

记；《楞严经》等佛经；《太真外传》《霍小玉传》等小说，以及《全唐文》《世说新语》《傅子》《刀剑录》《竹林诗话》等其他典籍，征引文献高达189部之多，涵盖了经、史、子、集多个领域。这些文献充分利用，不但使志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这些文献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和编订的同时，张澍亦重视地理沿革、山川河流、民俗风情、物产风土等方面内容的考证收录，扩大了志书的内容，使志书具有社会实用价值。《续黔书》卷三收录的《黔中》《夜郎》《龙标》《废牂牁郡》《牂牁江》《罗甸》等文章，是对黔中郡、古夜郎国、龙标县、牂牁郡、牂牁江、罗甸国等郡县、古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建制沿革的考辨，依时间先后顺序，对这些郡县的最初设置、历代区划的变动讲得清清楚楚，并指正其他学者的错误。《黔中》一文，张澍先详考黔中郡最初的设置及历代区划的沿革，然后指出：“是则秦之黔中，即汉之武陵，兼今湖南、常德、辰州、沅州、宝靖诸府也，唐之黔中，亦兼今黎平、镇远、遵义、思南、同仁之地也，若宋之黔中，并及四川重庆、彭水诸县地也。而胡渭生以黔中、宁夷、涪州、播州、夜郎、义泉、溱溪七部皆梁南徼外蛮夷，非古黔中地，而以杜佑说为误，不考之过也。”^①《蜀典·堪舆类》若水条：“《世本》：‘若水，允姓，国昌意降，居为侯’。《水经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注：若水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间，厥木斯植，故水要其称焉’。《九州岛要》记越：‘嵩之登台，有双诺训，鸚鵡山，黑水之间，若水出其下。即黄帝昌意降居于此。杜予以昌意所封在都，都乃襄州乐乡，非是’。按：若水即泸水也。泸为若水之下流。《欧阳志》曰：‘马湖之上流即若水也。’”汶江即岷江条：“王伯厚《困学纪闻》云：‘《考工记》貉

踰汶则死，先儒皆以汶为鲁之汶水，非也’。《列子释文》云：‘按《史记》汶与？同一作岷，谓汶江也。今江边人云：‘不渡江，貉狐也，踰越大水则失本性。’按《说文》《史记冉駹为汶山郡篇》云：“汶音岷”，又《史记》引《禹贡》岷嶓既艺及岷山之阳、岷山导江，皆作汶。盖古字通用，史照释文，以汶为运切音问。今人遂相沿读为问，谬矣。杨正衡《晋书》注：‘汶山亦作？山’。《广韵十真韵》有汶字，武巾切音旻。”张澍综合运用了考据学、音韵学，从多个角度考证了汶江即岷江一说。蜀井条：“《扬州职方志》云：‘广陵蜀冈上有蜀井，曰蜀井，言水与西蜀相通，茶品天下水有二十种，而蜀冈水为第七。”玉女房条：“李膺《益州记》：‘青衣神号雷蜺庙，班固以为离堆下有石室名玉女房，盖此神也。’按：玉女房即今大佛崖洞也。而常璩《华阳国志》云：‘李冰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是以玉女房在灌县也。《太平寰宇记》：‘玉女房在导江县，其房凿山为穴，深数丈，中有廊庑堂室屈曲，似若神功，非人力矣。今毁。’是以玉女房在彭县也。任豫《益州记》：‘阆州盘龙山有石长三十丈（李膺作四十丈）高五尺，当中有户及扉（李膺作有户及扇），若人掩闭，古老以为玉女房在阆中也。’常璩、李膺、乐史、任豫皆不知离堆之所在，故说玉女房不审，当以孟坚之说为准确。《梁州记》：‘肥城东南有女玉山，山上有一石穴若房，有玉女八人，不出穴，前修竹下有石坛。’《述异记》：‘利州义城郡葭萌县有玉女房，盖是一大石穴也，昔有玉女入此石穴，前有竹数茎，下有青石坛，每因风自扫此坛，玉女每每遇明月夜即出于坛上，闲步徘徊，复入此房。’是以玉女房在昭化也。又按《水经注》：‘芒水出南山芒谷，经玉女房’则在陕西整屋，此又有一玉女房也。《郡国志》：‘张陵于此得盐井，祠玉女于井

内。’”^②这对我们了解和认识位于川西北高原和成都平原之间汉代崖墓，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凉州府志备考》中，张澍充分发挥考据专长，对地理沿革、风土人情进行了详细考证。《凉州府志备考》地理类卷一为总序，先考证凉州府的地理位置及其名称的由来：“《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凉、甘、肃、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国。”“《地理风俗记》：汉武帝元朔三年，改雍州曰凉州，以其金行，土地寒凉故也。”接着依据《汉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十道志》《明史·地理志》等对凉州府的政区沿革以时间先后为序，详加考证，最后又抄录《大清一统志》的凉州府及所属各县的政区沿革表，对凉州府的政区沿革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引用《禹贡锥指》考证凉州府的瀦野泽，又引用了《读史方輿纪要》对凉州府的政区沿革的考证，最后指出了凉州府重要的地理位置，《方輿纪要》：“山川险阻，土地沃饶。自汉开河西，姑臧尝为都会。魏晋建制州镇……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大为宋患，然则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③《山水》卷天梯山条：“《方輿纪要》天梯山，在武威县南八十里，山路崎岖，层折而上，因名。晋大兴二年，京兆人刘宏客居凉州天梯山，以妖术惑众处也。宋元嘉十六年，魏主焘议伐凉州，李顺等言，姑臧城南有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至丈余，春夏消融，下流成川，居民引以灌溉，后以虚妄获罪，是也。”焉支山条：“《史记正义》曰：‘焉音煙’。《扩地志》曰：‘焉支山亦名删丹山，在甘州山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旧事》曰：‘匈奴《失二山歌》云：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又曰：自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过之，皆下马拜焉。’《凉州记》云：“焉支山在武威郡西界，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有松

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备牧，与祁连山同。’”按：“匈奴谓天为祁连，祁连山者天山也。天山亦曰白山，焉支非白山也，今合为一，误矣。”^④张澍不仅考证了焉支山的历史渊源，指出焉支山非白山，后人误将其合二为一。还用生动细腻的文笔，为我们描写了水草茂美、冬夏有雪的西北奇特的自然山水，令人心神向往。

二、内容征实，科学编排体例

方志体例是否规范决定了其价值。张澍深明方志编纂原理，又广见博识，所编方志借古鉴今，博采众家，据实而定，体例规范。他一改当时因陈相袭之风，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志书内容，或陈或因，或继承或发展，科学编排志书体例。张澍根据内容创进了新的方法体例，所编志书既包括传统史志所编纂的内容，又收录金石文献、方言、姓氏、民间文艺、古迹古物、轶事传说等，篇目特色突出，体例与时俱进，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续黔书》打破传统志书体例的束缚，因事命篇，不拘常例。志书汇集了张澍在贵州期间的政绩、游记、诗歌、碑记，对历史、人物、古迹、政区沿革的考证，对独特手工产品和物产的记载，对珍奇动植物资源的考述，对贵州风土人情、奇闻逸事的记叙，这是他编修的一部私家著述，具有很高的文学及史学价值。《续黔书》对于现在贵州有关县市考证沿革、编修方志、研究民情风俗、社会文化和旅游资源开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卷四收录了《万卷书岩》《游紫气山记》《游东山记》《游黔灵山记》等十五篇游记，张澍用生动的文学笔法，向世人展示了瑰丽多姿的贵州美景。卷五所收之文主要记载异闻奇事、石刻古碑、俗字方音。如“人疴”“风鬼”“马化石”“雷击六人”“咒尸为鱼”等极具西南民俗文化特色，所收碑刻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蜀

典》体例编排科学、史料翔实可靠，考证精确，风俗、方言、器物、姓氏等条目为《四川通志》所不备，这是研究巴蜀文明和西南文化重要史料。“器物类”收录介绍八十余种有史记载和传说中产于蜀地的器物，在对这些器物的记载中，张澍充分发挥了古文献在方志中的作用，自始至终把突出重点、体现特色作为志书编纂的思想，收录了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风物。如“蜀筏”“蜀锦”“蜀汉文”“四望蜀车”等，这些反映了巴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万人冷艳锯条：“《刀剑录》：‘关云长为先主所重，不惜性命，自采武都山铁为二刀，曰万人，及败，惜刀投于水。’《庶物异名疏》：‘关壮缪青龙偃月刀，一名冷艳锯。’”^①“风俗类”则体现了古老而多元的巴蜀文化融合了四川各地各民族的民间通俗文化内容，凝聚着巴蜀文化的精神风格。《蜀典》特别注重展示地方科学技术发展。四川盐井和煮盐业自汉以来驰名全国，但古文献中对于盐井的形制、开采方法、盐场环境、煮盐的情况等均缺乏翔实的著录。卷五“故事类”对四川井盐生产这一特色产业记载，弥补其缺失，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故事类”收录“李冰杀江神”的故事，张澍指出由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益处，千百年来，都江堰地区的人民还有春秋两季作“斗牛戏”的风俗，以纪念李冰对江神的胜利。卷十一、卷十二“姓氏类”是张澍对四川地区姓氏的考证。绪氏条：“《统谱》：‘明永乐举人绪珊，成都人。’今《通志》无。”邵氏条：“按《邵思姓解》：宋嘉定间进士垆夫，汉州人。今《通志》选举内嘉定元年戊辰科郑自诚榜进士，有王垆夫，汉州人。即邵氏所言垆夫也。不知今《通志》何据以为王姓。邵思，宋人，不应误去姓以垆为姓也。”屈突氏条：“《十国春秋·后蜀本传》：‘屈突无，为成都人。有神仙之术，自号神和子，越百年尚着灵

异云’。《一统志》：‘张咏尝游京师，于封丘门逆旅遇一道人，与饮至醉。咏曰：不知姓名，异日何以相识。道人曰：我神和子也，异日见子于成都。后咏守益州，始思其言，尝物色之弗得，后于天庆观壁上画一道人，肖逆旅所见，视其题曰神和子。’”^②卷七“方言类”收录词汇丰富，形象生动，风趣幽默，极富表现力，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如瞿塘条，张澍根据“《夔州府志》：瞿，大也，塘水所聚也。又秋冬水落为瞿，春夏水涨为塘”，指出“《乐府解题》云：瞿，盛也，塘陂池水也。言盛水其中可以行舟，又云夏则为塘，冬则为塘。府志说又不同”。四川方言称水口为洪。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射洪县”：“本汉郪县地，后周分置射洪县。县有梓潼水，与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涪江口。蜀人谓水口曰洪，因名射洪。”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五：“蜀人谓水口为洪，梓潼水与涪江，合流如箭，故有射洪县。”“按《益州记》：‘娄娄滩东六里有身江，西魏因置县，土人讹江为洪，后周从信改县为射洪云。’《寰宇记》引李膺《蜀记》云：‘郪江滩东六里有射江，土人语讹，以江为洪。’又李宏宪说异。盖古人为石梁绝水，水激而洪大，如吕梁洪、鸡翘洪、落马洪、百丈洪皆是也。”^③在《凉州府志备考·物产》中，张澍收录了大量的具有西北地域特色的物产：木周儿、一角兽、赤鹿、日及牛、红白稻、白麦、女臂瓜、青木香、葡萄酒等。如红白稻条：“《甘镇旧志》：‘稻有红白两种，惟高台镇番有之。’明太仆郭绅诗曰：‘边方浑似江南景，每至秋深一望黄。岁老练畴多秀色。稻繁隔垆有余香。始勤东作同千耦，终获西成汉满箱。怪见田家频鼓腹，年丰又遇世平康。’”按：“今镇番不种稻，想自国初兵祸后废之。留心民生者，尚其复诸。”张澍不仅对红白稻进行了考证，还站在民本主义的高度，

希望关心民生的官员能够恢复此类水稻的种植，以造福百姓。他关心民生疾苦之心也油然而见，令人钦佩。葡萄酒条：“《剧谈录》：‘凉州富人好酿葡萄酒，多至千余斛，积至十年不败。’^④张澍在《养素堂文集》中对武威一些人物、姓氏、山脉进行深入的考究，撰写《金日碑为武威人考》《贾思伯为武威人考》《祁连山考》等数十篇考证文章，他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于编纂《凉州府志备考》，从而进一步凸现了其考证精准、内容丰富、体例科学的特点。

三、艺文金石，极具学术价值

艺文是一定时期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再现，是志书中的精彩部分，可读性强，是读者喜爱的内容，通常被称为志书的“志眼”。方志艺文志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保存了大量的文学史料和数量较多的墓志碑铭，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张澍认为，艺文志可补正史艺文志之不足，其学术和文化功能，同样具有揭示文献、考辨学术源流的作用。在当时所编的志书中，部分志书艺文志对收录的作品内容不加辨别，致使内容十分芜杂，滥收一些附庸风雅、闲情恩怨、咏景探花、无病呻吟之作，对于富有地方特色的文献、民间文献收录甚少，且对于科技方面的文献未予以重视。结果，遗漏了许多重要文献，却捡些破碎之诗文，以迎合封建士大夫的情趣，影响了艺文志的价值和志书的价值。部分艺文志罗列杂碎诗文，篇幅较大，与方志中其他各志极不相称。艺文志还存在着不加考证、虚而未核，误收虚假文献的毛病。因此，张澍反对志书广分门类，妄摭杂事，指陈当时编修方志，分类细碎，妄采无聊，忽略掌故，人物不记行谊以教化，而专取显贵以邀宠，艺文滥收风花雪月之作。“世之为治者，率详今而略古，广分门类，妄遮杂事，于本邑掌故，反多遗漏。如天文分

野，本主省郡，乃至小邑，指一星为属，此陈卓、张璠未有之说也。且地理不记四至八到，山川不言险要攻守之略，纪人物不详行宜，专取他邑尊显者入之，以为荣。滥收风云月露之诗文，以侈卷帙，此通弊也。”^⑤张澍是一位经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考据学家和文学家，熟悉历史的同时，又精于考据，其评论艺文志，渗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字里行间包蕴着版本学、校勘学、学人生平考订、作品辨伪、史料检索、目录整理等丰富的知识，且多是边评边校，以言证史，以志存史，提供给后人广阔的研究视角和重要的文献资料。在《蜀典》中，张澍专门对古代巴蜀地区的作家著述进行了考证辑佚，对巴蜀地区的学术流变进行了考辨。

张澍在《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序》说：“艺文有志，始于班固《汉书》，凡经史诸子百家皆在，不专文集也。《隋书》改为《经籍志》，唐宋仍曰《艺文》，此史例也。后世郡县志亦辑艺文，往往摭拾不尽，遗其鸿篇，仅采风云月露之辞，无关体要，嗔矣。”^⑥《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志》共有十一卷，是书中卷数最多的一目，“吾凉《旧志》颇简陋，予政事之瑕，搜罗群书暨金石文字，自汉魏至元、明、本朝，得一百三十余篇，比注出原书，以朝代为序，不以文体次比。昔杨用修编全蜀艺文，不过五百余篇，今一郡所得如此，不为少矣。”^⑦张澍搜集了东汉至清代乾隆年间，有关凉州府的“议”“论”“诏”“表”“谣”“歌”“令”“书”“疏”“诗”“墓志铭”“碑”“序”“制”“克捷状”等文献，搜罗广泛，内容十分丰富，共有130多篇。既有叙述先贤的著述，又记载金石碑刻，载录精华，泾渭分明。向人们展示了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凉州，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体现了文化史价值。透过这些文字的远古记载，帮助我们认识当时凉州的自然景色、社会风

貌、民情民俗和人们的思想感情，并从中获得历史知识、思想启发和艺术享受。这为今天文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弥补了历史文化断层。各地人物见于正史列传的毕竟有限，大量学术界人士则见于艺文志。张澍收录了杨雄《凉州箴》、范晔《西羌传论》、温子昇《凉州歌》、高适《送窦侍御知河西耀还京序》、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李贺《凉州歌》三首、元稹《凉州伎》一首、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送长孙九待御赴武威判官》《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敕黑河神文》、汤斌《伏羌侯毛忠传》等诗文。张澍还收录了《永嘉长安谣》《大兴中民谣》《姑臧谣》《永嘉时歌》《凉州谣》等民歌民谣，这些民歌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艺文志中，张澍十分重视有关凉州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等记载的文章，这些奏、议、表、疏、论、制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虞诩《不弃凉州议》、傅燮《不弃凉州议》《太宗赐凉州都督李大亮诏》、张说《为朝臣贺凉州瑞石表》《文宗太尉段秀实祔庙诏》、张九龄《敕西州都督张待宾书》《再奉观察孙公帖》等，反映了自汉至明代，凉州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这些文章蕴藏着丰富的政治史料宝库，它所包含的说、论、策、辨一类的政治文章，以及宸翰、上谕、告示等官方文牍，反映了当政者的政治主张和施政方针，记录了一些政治情况。此外，艺文志收录的当地经济、文化、商业等方面史料。关于祠堂、庙宇、桥梁、学舍的记录，记录了建筑物坐落的地点、始建年月、重建情况，是一部典型的建筑史。尤其关于庙宇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中西文化交流之盛况及佛教发展的鼎盛。艺文志记载的有关府学、庙学、县学的资料，多采用疏、记等文体，这些数量较多的

记载，关于儒学、文庙及书院的文篇，集中记载了古代教育的概况，反映了当时的教育风气和尊儒重教理念。这些史料价值十分重大，为目前学界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文化、政治、经济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张澍认为金石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以阐幽表微、补缺正误。因此，他修志书无论是金石题记还是摩崖造像，更或是奇风异俗、名物杂谈均予收录，以此对正史进行补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编纂《大足县志》时，张澍根据内容，不专列艺文类，有关诗文分附各门类之中，增录金石之文，广泛收录自己撰写的30多篇碑记和考证文字，提高了志书的学术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他以大足县新发现的碑刻资料与史书相印证，纠正了前代学者的错误，提高了志书的质量。“夫金石之文，往往于史传相证据，且足以补史传之缺。如昌州刺史韦君靖，宋王象之《舆地碑目考》以为韦靖，本朝康熙时《四川通志》、乾隆时洪编修亮吉《府厅州县志》均沿其误。盖君靖其名，非以君为称，犹唐王君蓼、李君羨之取名尔。然新、旧唐书皆无君靖名。今介乎搜得其碑，乃知平黄巢、韩秀生、高仁厚之乱，勋伐卓烁，不独筑永昌寨为功于昌州也。而范淳夫先生古文孝经刻亦出于人间，笔纵雄伟，胜于黄山谷，殊可宝贵。其他多有关志乘，择优雅者，著录于篇。”^④在编纂《凉州府志备考》时，张澍利用当地金石碑刻，从中辑录了不少曾仕宦凉州和出自凉州府的历史人物收录“职官”和“人物”卷中，具有补《旧志》之缺的重要价值。张澍说：“唐李吉甫云：‘凡作志，宜详地势险要，战守攻取，毋庸叙人物而征鬼神。’本朝阎若球守其说，以为征文考献，点缀郡县志，则可抑固矣。夫正史所载，人物尚遗，若碑官野史、古碣断碑，往往有伟人硕士，足补正史之阙者，此蒐采

不可不广也。《凉州旧志》漏略实多，予辑二百三十余人以补其缺。”张澍从《东观汉记》《英雄记》考录出东汉武威人周慎、周秘父子二人的事迹，对补录了《后汉书》之不足。南朝宋凉州人宝云，是当地著名的高僧，曾翻译佛经《新无量寿》，张澍从《高僧传》中辑录出了宝云的事迹。宋高僧释智严与宝云一起翻译了《普曜》《广博严净》《四大天王》等佛经，张澍将他的生平事迹进行考证，并从《高僧传》中辑录出来。张澍从《唐景云二年凉州大云寺古刹碑》辑佚出僧人雪献法师，考证其为无为人，俗名姓安，骠骑大将军安公子孙。他还从《元和姓纂》中考证出汉代武威太守段贞，子孙遂居武威，九世至颍澄清段氏的渊源和历史名人。从《华阳国志》中考证出东汉凉州刺史赵宏，其祖籍是四川阆中人。方志艺文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揭示一地的具体学术文化现象，挖掘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既收录了纸质文献，又收录了金石文献，一旦实物不存，其内容则无从观览，只有从方志收录的这些艺文志来进行稽考。张澍《凉州府志备考》收录了《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修凉州城记》《勅赐清应禅寺碑记》《成化御赐修海藏寺碑记》《钱璉张太监重修海藏寺碑记》《增修大云寺碑记》《罗什寺碑》等石刻碑文，目前这些碑刻有的已被毁坏，但是通过张澍考证收集编入艺文志中的这些碑文，我们可以了解当日河西走廊一代佛教发展的盛况，也为考察凉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西夏天祐民安碑》记载了发现西夏碑的过程。《贾思伯碑》《周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云阳县开国男巩君墓志铭》、元稹《唐左千牛韦佩母段氏墓志铭》、李至远《唐维州刺史安候神道碑》、危素《西宁王忻都碑》、虞集《高昌王世勋碑》、胡天游《赵开府碑》、全祖望《署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武威孙公诰》、达通《重纂达氏家谱序》等大量石

刻碑文和墓志铭，为保存碑刻内容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正史记载不细、野史考订不实，好多古籍中找不到的东西，有赖于在碑文中完整地保存下来，可以补遗正史、辨析谬误，具有很高的学术文献价值。张澍自觉地将金石资料与历史研究以及方志编纂结合起来，形成一股新的学术潮流，推动了有清一代方志学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四、经世致用，资政教化存史

张澍编纂方志考古征今，并非单纯地为考据而考据，为保存文献而保存文献，其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资政教化存史，他将地方志提到了与史书同等重要的位置，将修志工作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他认为，志书是资政、教化、存史的重要手段，具有为地方官员提供治理本地经验的功能，在劝勉百姓倾心向善、移风易俗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夫为政有脉朶焉。其精神贯注乎弼教明刑而外，无弛张变更之迹，则其志为治鱼筌乎？然为政有模范焉，其措施在于摩玩利钝，而动合阿产卓鲁之风，则志其为之龟鉴乎”。^①

张澍重视方志的史书作用，认为方志乃一方全史，认为方志属于史书类，史书与方志名称、体裁虽异，但作用是相同的。收入《凉州府志备考》中的《西夏纪年》共二卷，是张澍依据《宏简录》《金史》等典籍编纂的关于西夏历史的编年史。以志存史、补史之略，编纂这部史书，体现了张澍的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超前的史学观念。《凉州府志备考》中颇有与西夏事相涉者。《人物志》卷八中对西夏仕元的余阙的生平介绍甚详，涉及其父沙刺臧卜、子德生、女福童、妻耶律氏。《艺文志》卷八收录《西夏天祐民安碑》汉文碑文全文和《勅黑河神文》全文。在《西夏纪年序》中，张澍陈述了他之所以要编写《西夏纪年》的理由。张澍认为，西夏立国时间悠久，统治地域辽阔，财力雄厚，人马精强，虽崇释教而亦尚儒

学。在西夏历史中，凉州曾是西夏国重镇。历史上在凉州实行统治的人史书皆有传，如前凉张轨、后凉吕光至吕隆、北凉沮渠蒙逊至冒虔、南凉秃发乌孤至傉檀、西凉李暠至李恂等。五凉统治者史皆有载，如果对西夏各国主之事摈弃而不录，“若《凉志》不书其事与年历，是辽、金、宋世天壤之间无凉州也”^②。在张澍看来，辽、金、宋时期，凉州是西夏的领地，如果不把夏主统治凉州的历史写入凉州方志之中，这等于把这几百年的凉州历史给抹去了，而这段历史，恰恰又是凉州史中最应该编写的，是凉州史中最重要时期，因此，张澍在编写凉州史时，用两卷的篇幅，介绍西夏历史，以此体现自己对历史的尊重。清代有部分学者曾撰写过西夏国史书，但西北地区唯有张澍一人。张澍的编史方法是非常科学的。他选择宋人王偁《东都事略·西夏传》作为编写西夏史的底本是很正确的，宋与夏并存，宋人编西夏史，所用材料一定比后人的更可靠、更丰富，因而也能更真实地反映西夏历史。另外，宋、元人文集中保存的一些文献多是宋人、元人亲历之事，而笔记之类的说部也多为宋人亲历或亲闻，这些文献的可信度也很高。张澍取材能注意从宋元人文献中采录，这种编纂西夏史的取材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他在编辑《凉州府志备考》时，“姑据《宏简录》《金史》内附载有西夏事迹，次为《西夏纪年》两卷，以补前志之阙”。明代邵经邦编修的《宏简录》卷二百五十四附载有“西夏”专题，另外《金史》卷一百三十四有《西夏传》，据张澍所言，《西夏纪年》的编修主要参考的就是这两种文献。《西夏纪年》记西夏国史从拓跋赤归唐述起，卷一记拓跋思恭至李继捧、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李谅诈事，卷二记李秉常、李乾顺、李仁孝、纯佑、安全、李遵頊、德旺、睨等国主事。通过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反映

西夏国的兴亡历史，这就为辑录、编纂西夏史籍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缩写模式。卷二最后集中介绍西夏国疆域、物产、州郡设置、军事制度以及民风民俗等内容。从所记内容来看，主要围绕宋夏关系来写。记事未有新史料填充，但记叙方法主干突出，不枝不蔓，文笔非常流畅。叙述重点介绍了历史上有重要的人物事迹，特别是元昊立国以后，西夏各代国主的生平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括介绍。张澍是西北学者中唯一撰写西夏专史的人，西夏姓氏学研究，是他在史学领域内对西夏研究做出的最突出贡献。

张澍在方志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所编志书涉及学科极广，地理、天文、历算、水利、民俗、史学、目录、金石、姓氏等无不包含，张澍精通多门学科，在史学、姓氏学、辑佚学、考据学、经学、目录学、金石学等领域均足以称名家，其他各门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为他编好方志奠定了基础。张澍是文献学家，博通古籍，这使他所编方志均以文献丰富见称。他精通考据之学，故其所编方志皆注重考辨，讲究征实。金石、艺文、姓氏三门更是亮点。《方志学》著录了张澍编著的《续黔书》《蜀典》《凉州府志备考》《南昌县志》《鄱阳县志》《三辅决录》《三秦记》《十三州志》《沙州记》等20余种志书^③。顾颉刚在“近百年中方志之佳者”中举凡34种，其中就有张澍的《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兴文县志》《屏山县志》4种^④。张澍在修志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是我国方志学史上的重要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修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好好总结。

参考文献：

一、采纳众长，考古征今并重

①[清]张澍：《续黔书》卷三，《丛书集成初稿》，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②[清]张澍：《蜀典》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③[清]张澍纂，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卷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④[清]张澍纂，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卷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二、内容征实，科学编排体例

①[清]张澍：《蜀典》卷四，《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清]张澍：《蜀典》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③[清]张澍：《蜀典》卷七，《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④[清]张澍纂，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物产》卷四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三、艺文金石，极具学术价值

①[清]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五，《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67册，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本。1990年。

②[清]张澍纂，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

府志备考·艺文》卷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③[清]张澍纂，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④[清]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五，《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67册，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本，1990年。

四、经世致用，资政教化存史

①[清]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五，《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67册，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本。1990年。

②③[清]张澍纂，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④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5页。

⑤顾颉刚：《当代中国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转型升级中的年鉴事业发展思考

□ 刘传仁

摘要：“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工作要求，开启了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征程，为年鉴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应适应转型升级需要，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勇于担当、求精求新；配合转型升级发展，坚持创新理念，与时俱进，紧随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生成周密、联贯的轨迹，形成信息密集、堪存堪鉴的实录；紧跟转型升级步伐，加强信息化建设，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年鉴利用率和影响力。

关键词：年鉴事业 转型升级 发展 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会暨2017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指出：“地方志要在‘五大建设’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与其自身价值、功能相匹配的作用，就要因时而谋、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充分挖掘、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①提出了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开启了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征程。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怎样更好地实现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适应转型升级需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年鉴作为舶来品，自1909年我国出版发行第

一部年鉴以来，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20世纪末，年鉴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迅猛发展，我国已成为年鉴第一大国。综合年鉴编纂出版更加规范，质量持续提高，开发利用水平全面提升，服务功能不断加强。但也还存在发展不均衡、编纂质量良莠不齐、规章落实不到位、跟踪信息不及时、开发利用成效不显著等现实问题。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新要求，为年鉴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应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勇于担当、求精求新，在综合年鉴转型升级发展中大显身手。

（一）深刻理解转型升级内涵，提高认识，明确工作目标

“地方志转型升级，要实现‘六个转变’，即

实现地方志事业大局化、全面化、法治化、社会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六化”。”^②为地方志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对年鉴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围绕自身工作向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转变、从单纯修志编鉴向同时多业并举全面发展转变”^③明确了地方志事业大局化、全面化的工作目标。这就要求年鉴主编站位更高、眼界更宽，要围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设计框架，为适应横向发展，规划内容、组织编纂；要求年鉴编辑，不能局限于编辑室，为了编鉴而编鉴，年复一年，机械劳作，而要多措并举，把发展的理念融入编鉴工作，出成果、出成效、有成就。

“从依规修志向依法治志转变、从地方志机构修志向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转变”^④理清了地方志事业法治化、社会化的工作格局。我们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手段、法治方式来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年鉴编纂工作，使资料报送全面、快捷，信息渠道顺畅、高效。切实落实好“一纳入、八到位”，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人大监督、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依法参与的工作体制。

“从单一纸媒体志向广泛运用数字媒体志转变、从修志囿于当地向把地方志推向全国、走向世界转变”^⑤理清了地方志事业发展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年鉴向数字媒体转变，不只是由纸媒简单地变成电子版，而是要融入信息化发展行列，利用好年鉴大数据，走好开发利用之路。年鉴源于世界，在我国发展于现代，繁荣于当代，我们要在更好发展的基础上还鉴于世界，互借鉴，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率先实现理念升级，全面谋划转型发展

我们要改变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对自己的

经验、思想、观念进行扬弃，剔除不适应年鉴发展实际的作法，在保留有生机、有活力先进理念的同时，抓住转型升级伊始的关键时期，率先实现理念升级，尽早谋划年鉴事业转型升级发展。到2020年，随着“两全”^⑥目标任务的完成，综合年鉴编纂将实现全覆盖，发展格局全面铺开，事业发展将达到巅峰。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数量上的全覆盖，只是实现了初级目标。在此基础上必须坚持转型发展，把“六个转变”落实到年鉴事业发展中，把“六化”目标渗透到具体工作中，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投入工作，用智慧和拼搏守护这份责任。我们要从转型升级理念上谋出路，从年鉴事业发展中找办法，只有练好转型升级的内功，才能在年鉴事业发展中赢得优势和主动。我们要对照“六个转变”“六化”的要求，结合当地年鉴事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解析任务，明确目标，彻底摒弃“一本书”观念，树立大局意识、全面意识；坚持依法治志，坚持“一纳入，八到位”，形成有利于年鉴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拓宽视野，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立足当地，放眼世界。不能只做“来料加工”，编纂成书就算完成任务、一年一鉴就万事大吉，而是要全身心投入到年鉴事业转型升级的发展中，全力提升年鉴质量，为世人留下丰硕的文化精品，“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二、配合转型升级发展，全力推进年鉴编纂工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鉴事业快速发展，业内人士开始思考年鉴创新问题。经过20多年的创新研究，促进了年鉴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今，转型升级理论的提出，为年鉴事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年鉴又迎来了事业发展的春天。要想更好地实现年鉴事业转型升级，“必须以创新思维来

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创新工作模式、管理方式、工作手段。”^⑦

第一，争取主动，抢占资料先机

“资料性是年鉴的第一属性”。^⑧掌握好资料是编纂好年鉴的根本，也是发挥好年鉴作用、体现其价值的关键。地方综合年鉴被人们称为“政府公报”“官书”，多年来，入鉴资料主要来源依赖于政府部门，这是个收集资料的好办法，也是不可替代的主渠道。但这种方式已不能满足年鉴事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需要。一方面，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进一步简政放权，资料报送渠道越来越窄。另一方面，即便是政府职能部门提供资料，由于报送体制机制不健全，撰稿人又均为兼职，再加上有些单位不重视，难以保证资料时效和质量。要想抓住资料先机，必须从思想上树立转型意识，开拓新局面。

一是坚持依法治鉴，畅通资料报送渠道。充分利用国务院及当地的条例法规、政府规章等，争取得到地方政府支持，纳入政府督查或绩效管理范畴，实现依法依规编鉴。比如，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与省人大法工委、省政府法制办每年组织联合执法检查组，对全省各地修志编鉴工作开展行政执法检查；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会同省政府法制办进行执法检查；吉林省部分市县把资料报送纳入当地政府部门的绩效管理项目……这些举措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如，《珲春年鉴》原来资料上报时间拖沓持续6个多月，通过依法治鉴、政府督察通报等措施，到2017年报送资料时间缩短为10天。所以，我们要加大依法治鉴力度，争取主动，扭转资料报送不畅的局面，改善资料报送效率和质量，提升社会参与度、认知度，为增强年鉴服务功能奠定基础。

二是发挥主动性，深挖有价值的资料。在采用年度培训、电话约稿等常规方式的同时，对一

些重点部门和行业的“重、大、特、新”资料进行深度挖掘。比如，“一带一路”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产业转型升级等，拉出清单，甚至列出条目，进行时时跟踪，缕清事实，核对数据，挖出深度，不达目标不罢休，充分体现年鉴提供信息的深度和价值。还可以通过建立年鉴网站与读者实时互动，也可以在地方志网站设立专栏或互动栏目，比如，设“我来编年鉴”栏目，让群众广泛参与，提供信息，甚至自编条目，提供参考。

三是开辟资料来源新途径，主动出击，采集特色资料。“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年鉴的资料性，对于提高年鉴的编纂质量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⑨突破信息资料收集固有模式，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拓展信息资料来源，深入社会采取调研、采访等方式补充资料内容，丰富信息量。比如，《延边年鉴》采取到民营企业收集资料、到社区采访调研等形式，补充了“经济”“社会民生”类目的内容，弥补了靠政府部门供稿造成的内容不全、记载肤浅、缺乏广度，体现不了“经济”“社会民生”大主题的缺陷，使年鉴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充分发挥综合年鉴记住昨天，鉴事今天，服务现实的作用，实现综合年鉴应有的价值。

第二，优化框架，充实内容，随时而变

“从围绕自身工作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转变”，不再仅限于编纂体例和规范研究，通过创新框架，让栏目、内容紧跟时代，紧随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生成周密、联贯的轨迹，形成信息密集、堪存堪鉴的实录。

一是紧跟时代步伐，调整框架，及时充实新栏目，淘汰过时栏目。年鉴作为一种传统媒介，要在数字时代保持竞争力，坚守规范的同时，需要实现内容的差异化、独创性。“内容”外延扩大，并不是一定要覆盖所有，而是应找准定位，从当地社会事业发展的特点入手，用高质量的内

容连接读者。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地方综合年鉴应在概况类目下，除设自然概况分目外，还应对当地“五位一体”发展情况作以概述，但多数年鉴仍停留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分目状态。又如，早在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10多年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年鉴里体现并不多见，有的甚至没有设置相关栏目。再如，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但受供稿局限，往往记述的残缺不全。仅从以上3例就可以看出，综合年鉴还存在着更新不及时、创新不够的问题，迫切需要升级。所以，在年鉴的编纂中要及时调整栏目，有废有进，常编常新。

二是要充实内容，紧跟社会发展。综合年鉴要及时、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不只是歌功颂德，而是要实事求是地从“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纬度充分反映体现社情民情，反映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融入“一带一路”发展的新成就、自贸区建设等。还有，流淌了千百年的河流有了河长、无户口人员可以落户、老年公寓有了“家庭医生工作室”……只要善于发现，及时跟进，就会有足够数量的新鲜资料需要补充，增加条目、分目，甚至类目。比如，《山东年鉴》增加信息量、增强实用性，在部分栏目末辑录了相关的知识性、咨询性、互动性信息资料，突出反映了山东的优势、特点。再如，《吉林年鉴》及时补充栏目内容，对吉林省积极开展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活动，进行了跟踪记述，反映了农民生产观念和经营观念的更新和进步，充分体现了吉林省农

业生产转型升级的新进程。日常生活中承载着记忆，需要年鉴人通过近距离的触摸来感受过往的岁月，也是一种有历史感的体验。尤其城市年鉴，在记述城市发展的同时，应最大限度在满足社会对城市信息的广泛要求，适当增加人文、社会等相应栏目，及时锁定城市街路、桥梁、居民生活等些微变化。比如，哪年有了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等，哪年婚庆习俗有了变化、养老模式在创新、无人机进入百姓生活等，应及时捕捉，抢入鉴中。否则，一纵即逝。过些年，有些事物的发端，难以寻觅。

三是要确保连续性。连续性是确保年鉴信息权威、有效的前提。缺乏应有的连续性，读者就难以通过年鉴把握相关领域、相关事物的发展轨迹。每项事物发展都是有过程的，除当年已经完成的项目外，必须确保事物发展、项目数据等连贯性，要逐年连续记述。今年有材料就记，明年无资料就不记，中间出现断档，就无法分析事物发展。连续记载，就能让人们很好地跟踪、了解事物的发展全过程，尽管有些事情也有新闻报道，但基本都是碎片化的内容，不系统、不全面，年鉴作为年刊，应充分体现其年度性、资料性、权威性的特点，对年度内的新事物进行综合整理甄别，有始有终，有数据有图片，形成完整的信息链。

第三，充分体现综合年鉴提供信息的有效性

“就汇集资料的数量和密度来讲，年鉴是其他一般出版物所无法比拟的。”^⑩年鉴的信息量大是公认的。有的年鉴为了资料全面，部头越来越大。但字数多不代表信息量就大，部头大也不代表有效信息就一定多。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多卷本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全书仅294卷，只有300

多万字。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资治通鉴》堪称是记述有效信息的典范。由此，应引起我们深入思考，提升年鉴信息的有效性也是转型升级发展中的必要之举。首先，要甄别资料的有效性，发扬沙里淘金精神，为入鉴信息把好第一关。其次，在具体编纂工作中，甘为每一个条目负责，敢为每一个数据较真。确保年鉴的资料真实、全面、权威、有效，彻底剔除年鉴中无人问津的死条。第三，对年度资料进行统一整合、梳理、编辑，增强年鉴信息的有效性，实现信息量最大化。

三、紧跟转型升级步伐，助力年鉴事业蓬勃发展

“经过近40年的蓬勃发展，年鉴事业的内涵和外延在逐步拓展和延伸，不仅包括覆盖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年鉴编纂，还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地情书籍编写、信息资料咨询、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等工作。可以说，年鉴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元素，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各地各部门年度文化活动的闪光点。”^①时代在发展，人们捕捉历史记忆的方式也在改变。随着年鉴事业的转型升级，年鉴事业道路越来越宽。要让年鉴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把年鉴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摆到重要位置，推动年鉴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增强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提高年鉴的知晓度、利用率和影响力。”^②让年鉴由“一个年度文化活动的闪亮点”点亮一大片。

1. 加强信息化建设

当前，新媒体兴盛，形成了推进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契机，各种思维、理念、技术、模式创新

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年鉴事业发展也面临着信息时代带来的挑战，我们应清醒地把握这个大趋势，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争取主动，融入信息化发展的大潮中，依托互联网形成年鉴事业发展的新动力。数据可以复用、信息可以共享，这是网络空间超越以往实体空间的本质特征。我们要抓住时机，加强转型发展中年鉴信息的开发利用，建立各类数据库，通过配合当地“政务云”平台建设，把服务项目逐步向自助服务终端移植，开放数据、共享信息，积极用数据、信息研判问题，跟踪社会发展；通过资源共享，方便群众，优化服务内容，为大数据提供支撑和依据，让广大群众跨越“数字鸿沟”，分享“数据红利”；利用年鉴信息密度高的优势，了解民情民意、广泛分析，正确理解和解读民众的愿望和诉求，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策略，为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激活沉睡的记载和数据，让年鉴由一本书走向一种媒介，让省情、市情看得见摸得着，走进政务，来到百姓身边。

2. 增强公共服务能力

我们要充分利用好综合年鉴这份“资源”，融入社会发展大潮中，拓展综合年鉴服务社会功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引领社会风尚，和着社会前进的节拍同步脉动。

一是综合年鉴要在时间的轴线上，把握现实、服务社会。据《中国年鉴发展报告》收录的部分省（区、市）2015年材料看，有些省、市不断研究新办法，探索新方式，推动年鉴工作与现实服务接轨。比如，北京、广东、重庆、深圳等地提炼地方综合年鉴资料，出版年鉴简本；山东、湖北、大连等地选取地方综合年鉴资料，编写地情手册、地情概览或实用指南等地情资料书

籍——《山东省情概览》《简明湖北省情手册》《数字看大连》；河南省及全省17个省辖（管）市、60个县（市、区）开展大事月报编辑工作。我们可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更深入、更广泛地增强公共服务服务能力。

二是综合年鉴要在精神的纬度，把握时代精神与核心价值。比如，《吉林年鉴》与《新文化报》合作，充分挖掘草根大众当中的善行义举，进行宣传报道，通过群众投票和专家评审，每年选出10个“感动吉林”年度人物，在《吉林年鉴》卷首对感动人物的事迹进行刊载。利用每年“感动吉林”人物评选活动积累下来的宝贵资源，进行二次开发利用，先后编纂《“感动吉林”人物榜》《“感动吉林”评选记实》《“感动吉林”人物评选年鉴》，进一步扩大宣传效果，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提高年鉴利用率和影响力

“年鉴适应了人们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即开放的、全方位的、系统的、比较的，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等各种方法的需要。读者既可通过年鉴了解事物的概况全貌，又可从中找出专深的内容和便于深入研究的资料数据及其线索，完成有分量、有价值的科研课题和学术论文。”^⑧随着年鉴事业转型升级发展，我们应不断挖掘潜力，持续提升年鉴的利用率和影响力，实现年鉴价值最大化。一是要适当扩大信息资料的时空范围，“注重从民生方面深入挖掘题材，准确、深入和真实地反映民情、民态和民意，提高年鉴的文化含量和人文气息。”^⑨通过充实年鉴内容，增加实用性、利用率、可读性，比如，城市年鉴增加“办事指南”“生活指南”“社会调查”“基础设施”“养老就业”等栏目，不仅内容更丰满，还增加了有效信息量。二是要开发辅助品，让年鉴也“悦读”。比如，根据几十年的年鉴数据积累，形

成多种《大数据报告》《农业发展大数据报告》反映当地农业产值变化，粮食产量情况，农民收入情况等，《生态大数据报告》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恢复情况，环境污染情况变化趋势等。三是要利用综合年鉴的影响力，推动专业年鉴发展。积极指导推进各部门、行业编纂专业年鉴，通过专业年鉴遍地开花，提供针对性更强、更专业、更详实、更密集的信息。综合年鉴则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让年度信息形成网络，让有效数据全覆盖，让年鉴发挥更大的作用。

年鉴事业转型升级发展任重而道远。转型，不是抛弃规范；创新，也不是全盘否定。在年鉴事业发展中，把转型升级理念化作行为自觉、工作指南，改进老办法，探索新方法，在时代洪流中书写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①李培林：《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会暨2017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期。

②③④⑤李培林：《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会暨2017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期。

⑥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64号）

⑦李培林：《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深入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努力实现年鉴事业发展新跨越》——在第一次全国年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9期

⑧许家康：《许家康集》，线装书局，2011年9月第1版，第3页。

⑨许家康：《许家康集》，线装书局，2011年9月第1版，第4页。

⑩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6页。

⑪⑫李培林：《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深入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努力实现年鉴事业发展新跨越》——在第一次全国年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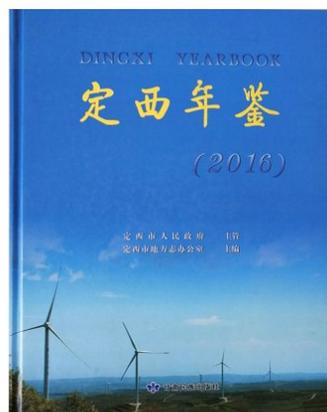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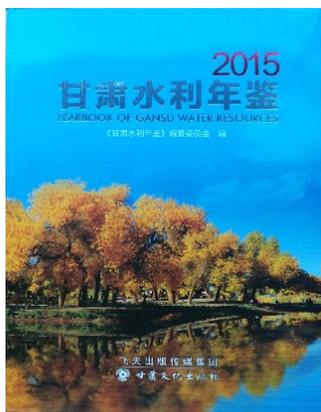
⑬肖东发等：《年鉴学》，方志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141页。

⑭吕鲜林：管窥《上海年鉴》编纂之要略，《上海地方志》2016年第1期。

（作者：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年鉴指导处处长）

甘肃省3部年鉴 在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比中获奖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国办发〔2015〕64号），推动年鉴事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年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地方志学会对全国地方志系统2015-2016年编纂并公开出版的3512部各级各类年鉴组织开展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工作。通过对各地各部门推荐384部参评年鉴的评审、复审和终审，确定特等年鉴31部，一等年鉴58部，二等年鉴87部，三等年鉴114部，提名年鉴80部。甘肃省3部年鉴在评比中获奖：定西市地方志办公室承编的《定西年鉴（2016）》荣获二等年鉴；兰州市城关区地方志办公室承编的《兰州市城关区年鉴（2015）》和甘肃省水利厅承编的《甘肃水利年鉴（2015）》荣获三等年鉴。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石战涛 蒋文涛供稿）

明代徽郡郭从道 与《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相关问题考略

□ 袁兴荣 崔珍康

摘要：明代顺德府知府王朝贤撰写的《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记载了明代嘉靖年间顺德府修建长城和关口的起因缘由、负责建设的官员、建造的过程及马岭关的重要地位，《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的发现，为研究长城建设史提供了重要史证。时任顺德同知的徽郡人士郭从道从设计图纸、经费使用、工匠管理等方面为马岭关长城的修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马岭关长城 郭从道 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

长城又称“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始修于燕王，历史长达2000多年。现今所指的万里长城多指明代修建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国家文物局2012年公布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区，包括长城墙体、壕堑、单体建筑、关堡和相关设施等长城遗产43721处。

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境内的马岭关长城，就是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在明代嘉靖年间由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组织修建而成。

一、明代的边防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

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即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尽得唐府兵遗意。文皇北迁，一尊太祖之制，然内臣观兵，履霜伊始。洪、宣以后，狃于治平，故未久而遂有土木之难。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宪、孝、武、世四朝，营制屡更，而威益不振。卫所之兵疲于番上，京师之旅困于战役。驯至未造，尺籍久虚，行伍衰耗，流盗蜂起，海内土崩。宦竖降于关门，禁军溃于城下，而国遂以亡矣。”^①

这就是洪武元年（1368年）自太祖朱元璋开国，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明亡，共277年，经历16个皇帝兵制状况。尤其从宪宗朱见深到世宗朱厚熜的102年之间，“营制屡更，

而威益不振。卫所之兵疲于番上，京师之旅困于战役”，兵制溃烂军威不振江山社稷岌岌可危。而在世宗一朝，边境情势愈发紧急。

“（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四月，吉囊犯甘、凉，总兵官姜爽孳败之……是秋（秋九月）吉囊犯延绥，官军四战皆败之。嘉靖十六年（1537年）六月癸酉，吉囊寇宣府，指挥赵膺战死。秋八月复寇宣府，杀参将张国辅。嘉靖十七年（1538年）六月，寇犯宣府，都指挥周冕战死。八月甲辰，吉囊犯河西，总督都御史刘天和御却之。嘉靖十九年（1540年）春正月，吉囊寇大同，杀指挥周岐。秋七月癸卯，吉囊入万全右卫，总兵官白爵逆战于宣平，败之，壬子，又败之于桑乾河。九月，吉囊犯固原，周尚文败之于黑水苑。延绥总兵官任杰追孳于铁柱泉，又败之。嘉靖二十年（1541年）是春，吉囊寇兰州，参将郑东战死。是月（八月）俺答、阿不孩、吉囊分道入寇，总兵官赵卿帅京营兵，都御史瞿鹏理军务，御之。九月辛亥，俺答犯山西，入石州……”^②

从嘉靖十五（1536年）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的六年时间，除嘉靖十八年（1539年）吉囊、俺答未入侵外，其余五年，一年数入，民何以堪，兵何以战？况且败之又败之。

吉囊、俺答何方妖魔？

吉囊（1506—1542年），明代蒙古右翼三万户（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济农（亲王）。小名库蔑里，尊称衮必里克墨尔根，明朝人以其尊号、封号（济农）译作麦力良吉囊、己宁等。孛儿只斤氏。达延汗孙，巴尔斯博罗特长子。

正德十四年（1519年），嗣济农位，领右翼三万户，驻帐于鄂尔多斯万户，游牧于黄河河套及以西地区。嘉靖（1522—1566年）初，势力日强，率弟俺答、昆都力哈（老把都）等东征西讨，雄冠诸部，不受左翼大汗节制。嘉靖三年至十七年（1524—1538

年），四次率兵攻打兀良哈万户，最后将其征服。嘉靖十一年和十三年（1532年、1534年），两征青海，大败旧敌亦不刺和卜儿孩，吞并其众。嘉靖十二年（1533年），率兵入援大同明哗变军卒，变兵多随之亡入蒙古。屡入掠明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等地，给明朝西北边境造成严重威胁。曾要求同明朝通贡互市，被拒。晚年放纵酒色，不理军政；大权落在俺答手中。卒后，右翼三万户被俺答控制，济农势力日衰。

世宗嘉靖皇帝，面对北虏一年数入蹂躏中原大地的嚣张气焰，是如何应对的？

“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意，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讐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③

嘉靖帝世宗朱厚熜于嘉靖元年（1522年）即位，在位45年。即位伊始，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力除一切弊政，以图中兴。面对北方游牧族一年数侵的紧急情势，重视防务，“洞隆替之原而施补救之术”，修建长城，加固修补关隘，保境安民，成为为政之要。邢州西山关隘马岭关、鹤度岭、黄榆岭、大岭口、黄背岩口和清风岭口六处长城关隘，屹然矗立，顺势而生。

马岭关位于邢台市西部太行山脉邢台县宋家庄乡明水掌村的马岭上，是秦汉以来中国北部边陲的一个重要关隘，兵家必争之地，为太行山五大雄关之一。

邢州长城六处工程中，以马岭关最为险要，工费最大，因而在马岭关长城修建之时，同步建立这通石碑。“中国长城学会理事张保田介绍说，此次发现的马岭关长城鼎建碑名为《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建造于1542年，珍贵之处在于，这

通石碑与马岭关修建之时同步建立。‘中国历代长城体量浩大，然而以长篇记事碑全面阐述长城修筑起因、过程、规制等却十分罕见’”。^①

二、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

古邢州，今为顺德府。城西百里崇山，即太行之支。峦嶂起伏蟠拥，削壁插空，岩从翠嶂，北拱燕云，南接关陕，违沙漠之窟千里强半，隐然为畿甸巨障。嘉靖辛丑，狄人入寇，陵轹山右，至围太原，逼井陘，恒襄震动，谓其与接壤也。无何，虏还，虽边关险塞，兵帅忠勇可恃，然而丑虏无厌，是故履霜之戒，桑土之徹，譬诸门墙。堂寝扃户，键钥内外，远近当无弗备。维时都宪御东阿刘公，经略三关六郡，相度山麓承平岁久，关隘渐为通衢。其谷径又为樵牧商旅所开，皆纳夷之间道也。迺锐意建修，协诸巡察侍御殷公仰遵明旨，分檄府属各理属地，谓朝贤曰：中丘以南洺河以北，维邢藩篱，汝计材徵役，遴官，汝惟勤。谓同知曰：汝专厥务。谓通判、推官曰：汝皆其优。于是通府张君秉义节，推周君怡、姚君汝籽先后赞襄，同府郭君从道尤殚心力，亲历险阻，得属吏勤慎者若干人，分通九邑夫匠。庐居野外，随山刊木，灰石瓦砾取足于山，记公帑之费，仅十之一、二。其规模控制崇卑疏密之宜，悉郭君图授指示。厌役者罚，劳力者犒。每隘筑城，每城建楼，中设重门，以严启闭。傍列营房，以便直宿。树墩堡以备瞭望，缭垣墉以防越度。为关通行者六，为垣塞隘者二十有二，扁以关额曰：邢州外翰。马岭重关曰鹤度仙踪，曰：黄榆古道，曰大岭连云，曰：黄背苍岩，曰：神开地险，圣作风清。事竣，属朝贤为文以记。余惟经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又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人和地利，实难偏废。是故简骁捷，时练习，除戎器，峙糗糒，积芻茭，在郡国弗可少。驰五者备，先之以教养之德，

隐瘼之恤，以作其忠勇之气而后克济。昔者，越图吴，令于国中，婚嫁丧葬，耕维孳牧，绥爱诲利周至，然后一鼓而举全吴。否则，其谁与共功。诸君幸相与助之，以不负九重守土之责，监使督委之劝受若，直无怠若事之理。金曰：罔弗允迪。兹役也，险要之甚，工费之殷，无踰马岭，因勒石于斯，使续官者有取焉。览而相与永图之，损者葺，缺者补，庶几靖共之意可期于无穷也。

《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高1.5米，宽0.9米全文近900字，内容丰富缜密，事实确凿准确，详尽还原了邢台区域古长城的建造历史。该碑建造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珍贵之处在于，这通石碑是马岭关修建之时同步建立。记载了明代嘉靖年间顺德府（今邢台市）长城和关口修筑起因缘由、负责建设的官员、建修的过程、规制及其马岭关的重要地位等，弥足珍贵。该记明令有八：一是顺德府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古邢州，今为顺德府。城西百里崇山，即太行之支……违沙漠之窟千里强半，隐然为畿甸巨障。”二是修筑起因缘由。“嘉靖辛丑，狄人入寇，陵轹山右，至围太原，逼井陘，恒襄震动，谓其与接壤也。无何，虏还，虽边关险塞，兵帅忠勇可恃，然而丑虏无厌，是故履霜之戒，桑土之徹，譬诸门墙。堂寝扃户，键钥内外，远近当无弗备。”三是统领三关六郡的都御史东阿刘公决定修建关口。四是浓墨重彩叙述顺德同知郭从道受知府王朝贤委托，竭尽心力从设计图纸、经费使用、工匠管理为修建马岭关长城做出的巨大贡献。“同府郭君从道尤殚心力，亲历险阻，得属吏勤慎者若干人，分通九邑夫匠。庐居野外，随山刊木，灰石瓦砾取足于山，记公帑之费，仅十之一、二。其规模崇卑疏密之宜，悉郭君图授指示。厌役者罚，劳力者犒。”五是修筑关口的规制。“每隘筑城，每城建楼，中设重门，以严启闭。傍列营房，

以便直宿。树墩堡以备瞭望，缭垣墉以防越度。”六是综述建成顺德地方的关隘数量、立墙阻塞小口的工程数量及六处关隘匾额的位置名称。“为关通行者六，为垣塞隘者二十有二，扁以关额曰：邢州外翰，马玲重关曰鹤度仙踪，曰：黄榆古道，曰大岭连云，曰：黄背苍岩，曰：神开地险，圣作风清。”七是顺德知府王朝贤在工程竣工后，撰文记事的感悟启迪。八是作者交代在马岭关立石刻碑的初衷。“罔弗允迪。兹役也，险要之甚，工费之殷，无踰马岭，因勒石于斯，使续官者有取焉。览而相与永图之，损者葺，缺者补，庶几靖共之意可期于无穷也。”

三、关于修建邢台马岭关长城的官员

1、关于碑文撰述者顺德府知府王朝贤

王朝贤，山西永济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曾在嘉靖年间（1541—1544年）任顺德府知府。^⑤

“（嘉靖）乙丑，升户部福建司郎中王继芳，直隶顺德府知府王朝贤俱陕西按察使司副使。”^⑥

邢州马岭关长城与《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修筑时，王朝贤在顺德府任知府。明代御史王士翘编纂的记述长城重要关塞的方志书《西关志》中有收录，当为可信。

2、马岭关长城修建的主要组织实施者顺德府同知郭从道

郭从道，字省亭，一字汝能，徽州（今徽县伏镇古称栗亭）人，正德丙子（1516年）举人，授任直隶大名府判，后升任山西应州知州，转任潞安府同知。时遇母丧丁忧，服满后被补授为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同知。他到顺德府上任时，顺德府古北口一带常有战事发生。顺德府是中央直隶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保一方百姓安宁，主动捐出自己的俸禄，并发动地方士绅出资修建了古北口马岭关的长城，使古北口防务得

到加强，百姓生活恢复安宁。当地百姓十分感念他的功德，将他修复的这段长城以他的名字命名，并刻石立碑将他修复长城的经过如实记录，其中有“宇宙不雕经国绩，姓名永勒郭公关”之句。后升任户部员外郎，又转任贵州按察同兵备僉事。老年辞官归家乡赋闲。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河南洛阳人孟鹏年由滦州知州调任徽州知州，因创修《徽郡志》，遂敦请郭从道主笔。郭从道踏遍徽州山山水水，搜寻、参考残存的古老典籍，倾全力编纂完成了至今最早、最完备的徽县地方志书，为弘扬地方文化做出了贡献。^⑦

最早记述郭从道史料，见于由其郭从道主编付梓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徽郡志·选举志》。

“（正德）丙子（1516年）科，郭从道，任直隶大名府通判，升山西应州知州，潞安府同知，起复顺天府，升户部员外郎，贵州按察同兵备僉事”^⑧

继明代《徽郡志》之后，到民国之间，徽县先后刊行过四部志书：清代康熙年间徽州知州邓天栋主编的《徽州志》、乾隆年间的手抄孤本《徽县志》、嘉庆年间知县张伯魁主编的《徽县志》以及民国《徽县新志》对郭从道都有记载。

由于郭从道在修筑长城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朝廷又擢升郭从道为户部员外郎，转任贵州按察同兵备僉事，由正五品升至正四品，终老致仕。不论是应州知州还是顺德同知，都是赤胆忠心，政绩卓著，廉洁奉公，口碑甚佳，堪称后世楷模。

忠臣与孝子，儒士与农夫，在明代大受推崇。大明王朝最为卓越的政治家张居正写过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用以概括郭从道一生，甚为精准。

3、《西关志》与明代嘉靖王士翘

《西关志》是明代嘉靖年间王士翘编纂的一部记述长城重要关塞的方志书，在流传至今的同类志

书中,它是最早编纂的一部。该书的内容广泛,记载详细,可信度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明代嘉靖年间,方志书的纂修蔚然成风,但作为一种方志新类型的边关志,它的出现与当时的边情紧急和政府边塞防务的重视有很大的关系。编者王士翘,字民瞻,江西安福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曾任直隶监察御史、右副都御史、太仆大理少卿、总理河道右金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等。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出任巡按西关御史,巡察居庸、紫荆、倒马、固关四关。因巡按御史“巡历一年,满日复命,造册画图,贴说进呈”,因此王士翘广集数据,悉心巡察,编纂这部记述长城重要关隘的方志书——《西关志》。其中有关固关部分凡七卷,近6万字,详细记载了固关的沿革、疆域、形胜、星野、山川、关隘及域地等。“洞隆替之原而施补救之术”,使之成为“为政者不可废”的工具书了。

据专家考证,《西关志》刊刻问世,大约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明刻本原书现存台北。鉴于大陆没有《西关志》版本的情况,北京古籍出版社在1990年根据缩微胶卷排印出版了该书,但刊印数量有限。

四、《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的学术价值

斯人已逝,关隘耸立,残碑犹存,与我国最早记述长城重要关隘的方志书之一《西关志》相互印证,为今人了解当时的边情紧急和政府边塞防务的重视,修建邢州西山关隘长城的历史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的发现,为研究中国长城建设史提供了重要史证。

其二,(徽州)元属陕西行省巩昌总帅府。“明兴,置郡。洪武二年四月直隶行省。领州三,县十四。东距布政司千六十里。洪武十年六月降

为县,属府,后复升为州。东南有铁山,南有嘉陵江,又有河池水流入焉。又南有虞关巡检司。西南有小河关。西北距府四百八十里。”

其三、时任顺德同知的徽郡人士郭从道从设计图纸、经费使用、工匠管理等方面为马岭关长城的修建做出了巨大贡献,故王朝贤,着重记述了同知郭从道修建长城的功绩。使古北口防务得到加强,百姓生活恢复安宁,其为民请命,恪尽职守的精神值得后人景仰,他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当下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教化功效。

参考文献:

- ①〔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九志第六十五·兵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 ②〔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世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 ③〔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世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 ④《光明日报》:邢台发现明长城建修碑全文近900字建于1542年2015年9月16日。
- ⑤《顺德府志》。
- ⑥《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之二百九十九。
- ⑦刘伯杰主编《徽县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 ⑧郭从道主编梁晓明点校《徽郡志》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 ⑨梁晓明张泓曹鹏雁点校《清代徽县志集校·嘉庆版徽县志人物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页。
- ⑩明史卷四十二志第十八地理三第1008页。

(作者:①袁兴荣 陇南市直机关工委副调研员,②崔珍康 陇南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西和县马集村古代墓葬研究

——兼与张一驰张士伟二先生商榷

□ 魏泽民

摘要：1990年，甘肃省西和县大桥乡马集村发现了一座规模较大，墓室周边和穹顶画满了精美壁画且有四处题记的古代墓葬，这种有壁画尤其有题记的古代墓葬在陇东南地区极为罕见，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古墓的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壁画题记以及随葬品，对研究西汉水上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汉末三国乃至魏晋时期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马集村古墓 东汉末年 李夏舍墓 壁画题记

1990年前后，在甘肃省西和县大桥公社马集村发现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古代土坑墓。墓葬位于马集村西北500米的高坡上，为斜坡墓道洞式土坑墓，由墓道和单墓室组成，墓道为长斜坡型，先窄后宽，墓室为单室土洞墓形制，墓道用一石质材料封门。已被人为破坏。墓道呈南北走向，南面为麦地山，北面是剪子湾。墓道内两侧为砖砌墙，南北长10米，东西上口最宽处2.8米，下口宽1.8米，自上而下逐级内收，大约为30度斜坡。墓室长2米，高1.5米。从出土文物来看，除了墓门旁边放着一把银柄宝剑外，墓室中随葬的28件碗、缸、壶、洗、豆等灰陶器皿，大多带有波浪纹和凸弦纹其纹饰，陶罐上有还有“面百斛”“黑豆百斛”等文字，按马衡《金石杂记》，斛为古代酌酒之器，亦谓之勺。里面还盛有谷

物、豆类及中药材等物。未发现青铜器，说明这一墓葬具有汉魏时期的风格和特点，因为汉魏倡导“简丧薄葬”，反对厚葬，即使墓主身份地位不同凡俗，也只能用陶器来体现其规格之高，但绝不用高档次的陪葬品，现保存西和县文化馆。

在墓室四壁、穹顶及墓道两侧绘有大面积的墓室装饰壁画，西和县文化馆蒲立对其中的部分壁画拍了照，后因为技术原因无法保护，墓室壁画氧化而脱落。保存至今的就只有蒲立当时拍摄的几副照片。墓室壁画中共有三个男性人物画像：一个在墓门左侧墙壁最右边，头戴屋山帻，身着直裾深衣，双手捧着一物的站立式成年男子；第二个人物是身穿红色窄袖军服，开弓搭箭，纵马驰骋，正在追逐奔突的硕大野猪的骑士。第三个是墓室右侧身穿红色窄袖长袍，头戴

赤幘，左手端着一只碗，右手前伸，面对墓门侧立的侍者。碗内似乎还有汤勺之类东西。墓门的对面墙壁上画有一单扇门，门正中有双角兽头铺首，兽头鼻子上有鼻环。在古代汉族建筑与墓葬的墓门和棺槨上，铺首衔环是常见的装饰图案，而铺首是汉朝就有的门扉饰物，是由饕餮演化而来的，由多种兽类形象综合而成，有驱妖辟邪的寓意，扮演了家门守护神的角色，承担着保护家人的责任。相传铺首是龙之九子之一，警惕性高，故饰于门扇之上。如果将此图案与随葬品中有一些中药材联系起来考虑，壁画表现的正是侍者为墓主人伺候饮食，服药疗伤的内容。

大桥镇马集村发现的这座墓室，最初就被认定为东汉时期的墓葬。2015年，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一驰和陇南师专文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张士伟，通过对墓室壁画和墓葬形制的研究，认为该墓葬具有汉末魏晋时期“简丧薄葬”的葬俗特点，属三国魏晋时期的墓葬，墓主人是被曹魏政府派到鲜卑族首领轲比能的女婿郁筑鞬部去的使臣兼翻译官李夏舍。但笔者认为还有几处值得商榷：发现墓葬的时间说法不准确，应为1990年前后，而不是1970年前后，这有当时参与拍照的西和县文化馆蒲立的照片为证；壁画中树

上的动物，不是鸟，而是猴子，也有民俗学方面的论据。除此之外，论文中所称时代也欠准确性，把北魏与曹魏没分清：曹魏（220-265年）始于魏文帝曹丕，亡于魏元帝曹奂，连同曹丕追封其父曹操为魏武帝在内，魏朝共计5帝。汉献帝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在魏郡治所邺建宗庙，平定汉中后进爵魏王，曹丕代汉后便称魏，历史上又称曹魏，是三国时期由汉族建立的一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北魏则是南北朝时期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朝第一个王朝，又称后魏、拓跋魏、元魏，最初建都云中，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到始皇三年（398年）迁都于平城（今大同），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统一北方。太和十七年（493年）起拓跋宏迁都洛阳，向汉族学习，大兴改革，到永熙三年（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北魏从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称王建国，至永熙三年（534年）魏孝武帝兵败逃往长安投奔宇文泰，历14帝，凡149年，与曹魏没有任何瓜葛。

一、关于墓葬的时代

大桥马集村墓室中的随葬品数量并不多，档次也不高，唯一能显示该墓葬等级和档次的就是墓室中面积较大，内容丰富，色彩艳丽，构图精美的壁画。张士伟等在对该墓葬做了研究后认



西和县大桥马集村墓室壁画(局部)

为，马集村古代墓葬是魏晋时代的墓葬，可是，西和当地学者则认为，该墓葬应为东汉时期的墓葬。那么，西和县大桥乡马集村墓葬的时代该如何确定呢？

（一）从墓室壁画的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来看，具有汉代墓室壁画的基本特点。两汉时期的壁画，除了表现由众多神人灵异构成的诡秘怪诞世界、日月星辰、宇宙天象景观等内容外，更多表现世俗生活场景如继嗣礼仪、车骑田猎、插秧播种等，而马集村墓葬壁画描绘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高官显贵或地方豪强在生前享尽了奢华生活，死后也要享受荣华富贵，所以墓室的四壁布满了内容丰富、题材多样的壁画，诸如牛羊成群、斗鸡走狗、弯弓搭箭、纵马射猎等。壁画中还有侍者伺候汤药饮食，祈求长生不老等内容，墓室中除了存放一些礼器外，更多的是生活用品。

（二）从墓室壁画中人物的服饰来看，壁画中两个人物所穿衣裳，为两种服饰：一个为黑色直裾深衣，头戴黑色平巾幘加纱冠，为秦汉时期文职官员服饰；一个为朱红色袍式窄袖军服，头戴赤幘，与西汉时期的广袖袍式军服不同，^①为东汉末年到曹魏时期的军吏服饰。

先说深衣。无论是在奴隶制时期，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服饰都具有“明贵贱，别等级”的功能。秦汉以降，官服与民服的等级越来越分明，不得逾越。

从一般概念上讲，深衣是秦汉时期的一种特定款式的服饰名称，其上衣、下裳分开裁剪再缝合到一起，并有一定的制作规范。《礼记·深衣·第三十九》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圆以应规，曲袷如矩

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纁；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郑玄注曰：“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以彩也。”唐代孔颖达《礼记·深衣》孔氏正义曰：“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又曰：“凡深衣皆用诸侯、大夫、士夕时所着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

直裾即襜褕，语出《说文解字》，是华夏衣冠体系中的一种，其短者谓之短褕，衣襟裾为方直，区别于“曲裾”。“曲裾”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裾就是指衣服的大襟。直裾下摆部份剪裁为垂直，衣裾在身侧或侧后方，没有缝在衣上的系带，由布质或皮革制的腰带固定。汉代以后，由于内衣的改进，盛行于先秦及西汉前期的绕襟“曲裾”已属多余，本着经济胜过美观的历史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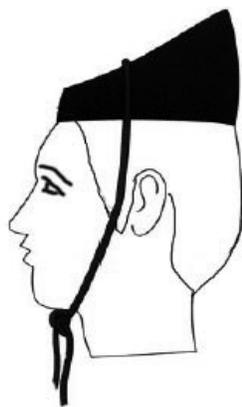


以刘帅为首的“中国装束复原团队”复原的东汉男士服饰

原则，至东汉以后，直裾深衣逐渐普及，成为深衣的主要模式。深衣是直筒式的长衫，把衣、裳连在一起包住身子，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而得名，也就是说上衣和下裳相连在一起，用不同色彩的布料作为边缘（称为“衣缘”或者“纯”），其特点是使身体深藏不露，雍容典雅。

军服方面，汉代士兵和低级军官以简单的直裾为主，窄袖短身（长度到膝盖以上），搭配大裤腿的褶裤，但高级军官、谋士、贵族等还有时穿曲裾深衣（长度基本到脚腕）。至于军服的颜色方面，历代有所不同：秦朝崇尚水德，色尚黑；汉朝崇尚土德，色尚黄。但西汉初年的军服颜色与东汉的军服颜色并不一致，汉高祖刘邦觉得黑色乃是帝王之色，比较威风，崇尚黑色，因此西汉早期的汉军军服基本都是黑色的。到了武帝刘彻时期才采纳了邹衍的“五德始终”说，认为土德尚黄，军服的颜色才改为土黄色，从此完成了颜色革命。到了东汉，刘歆父子提出汉朝应该继承周朝的正统，崇尚火德，这一建议也被朝廷采纳了，所以东汉时期的军服颜色改为绛红色。《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武吏常赤帻，成其威也。”^②

再说帽饰。古人戴帽子颇有讲究，如穿衣一样，等级分明，所以帽子也是地位和身份的一种标志。汉魏晋时期的普通老百姓一般是不能戴帽子的，没有地位的男人只能戴一种头巾——巾帻。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但军人是戴帽子的。改进后的秦军军帽是一种平顶小帽，由布、皮、纱等制成，也有做成斜坡形的叫屋山帻，精锐骑兵还要在帻上戴上用皮革或者毡制的帽子。到了汉代，大部分官兵普遍戴此军帽。屋山帻冠一般都有系带，可以连同帻一起在下颌系住，由于帻和冠基本都是配套的，因此后来帻与冠就逐步变成一体的了。此外，一些汉军



江苏省博物馆所藏南京出土的东晋持盾武士俑所戴帻冠复原图——屋山帻(左)、马集村古墓壁画中军吏所戴屋山帻(右)

士兵还会带一种头巾，原先是用来包发髻的，后来逐步演化成1片式和3片式帽帘，再后来又逐步演化成为头盔的护项、顿项。如果把江苏省博物馆所藏江苏省南京出土的东晋持盾武士俑所戴帻冠复原图与马集村古墓壁画中门吏头部所戴帻图做对比研究，就会发现两者同属于屋山帻，所不同的是东晋持盾武士俑所戴发帻前低后高，而马集村墓葬壁画中的军士所戴发帻前高后低。那么，前高后低与前低后高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据研究，屋山帻在魏晋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汉代相比，魏晋时期帻冠的尾部稍稍跷起，这个形象与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平巾帻很相似，所以魏晋时期的屋山帻很可能是后世平巾帻的原始形制。^③由此可见，东汉军人所戴屋山帻形制是前高后低，魏晋时期军士所戴屋山帻的形制是前低后高，而马集村墓葬军士所戴屋山帻的前部稍稍跷起，显然系汉代军士所戴屋山帻，与江苏省博物馆所藏东晋持盾武士俑复原图所戴前低后高的帻冠有所不同。从墓门侍者所著服饰和军帽的颜色和形制来看，马集村墓葬当为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的墓葬，而非魏晋时期。这就无疑廓清了马集村墓葬的建造时代。

（三）从墓室壁画中的题记来看，目前能看到

的壁画题记共有四处：墓门面前有竖排的四个字的题记：“此人奴也”，表明此人是伺候墓主人的家奴或者军吏。另外，在牛群和羊群附近还有两处题记，分别是“此牛群也”“此羊群也”。最能提供历史文化信息的题记是在墓门左侧墙壁最右边，那位头戴缙布冠（进贤冠），身着直裾深衣，双手捧着疑似琴匣的站立式成年男子旁边的一处题记：“此李君夏舍也二年二月九日”（抑或是“九月乙酉？”）。

壁画题记中的“此李君夏舍也”，所指并非穿直裾深衣，头戴缙布冠（进贤冠）的站立式男子。因为古代墓葬中大凡出现墓主人画像，往往是坐像，且为夫妻合像，几乎没有站像，而此男子呈站像，且双手捧物，显然仍是一名级别较高的侍者。检索《三国志》，只有一处提及“夏舍”这一人名，就是《三国志·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的一处记载：“太和二年，豫遣译夏舍诣比能女婿郁筑鞬部，舍为鞬所杀。”墓室壁画中的



的题记时间与史料中李夏舍被鲜卑首领轲比能的女婿郁筑鞬杀害的时间相吻合。这就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三国志·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写的是“夏舍”，并无“李”姓，而且紧接着一处就连“夏”也省掉了，直接用“舍”，那么，墓室壁画题记中的“李君夏舍也”的李夏舍，与《三国

志·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夏舍”和“舍”所指是不是一个人呢？到底《三国志·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的“夏舍”是姓夏名舍呢，还是姓李名夏舍呢？从上下文来看，“田豫”省称“豫”，“郁筑鞬”省称“鞬”，“李夏舍”当然可以省称“夏舍”，再省就直接叫“舍”了，这也能说得通，更不用说古人称人名时还有更奇特的叫法，比如苏轼在《石钟山记》中就把“酈道元”称“酈元”，名字中的第一个字“道”就给省掉了，所以，基本可以肯定，不管是“夏舍”还是“舍”，都指“李夏舍”。

再看马集村墓室壁画题记中的“二年二月九日”，如果与当时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看，当然是指太和二年（228年）。此年春，也是蜀汉丞相诸葛亮首次北伐曹魏之年，只是因为诸葛亮重用马谡而失了街亭，才导致首次北伐失败。在此次北伐中，诸葛亮打算联络鲜卑首领轲比能，南北夹击曹魏，而曹魏为了对付蜀汉诸葛亮，也派人联合鲜卑首领轲比能，这样，轲比能就成了曹魏与蜀汉都想争取的重要力量。

题记所说的“此李君夏舍也”，表明此墓室的主人就是李夏舍。李夏舍是在执行外交使命，出使鲜卑贵族、轲比能的女婿郁筑鞬部时被郁筑鞬杀害的，可谓为国事而死的勇士。作为功臣，曹魏政府把李夏舍秘密安葬在西和县大桥乡马集村的西汉水之滨。由此可见，西和县大桥乡马集村古代墓葬基本可以确定为东汉末期三国时期的墓葬。墓室陵寝应当是在东汉末年修建的，但入葬时间应当为三国时期，说得具体一点，也许就是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

（四）从出土文物之少与壁画规模之大的矛盾来看，马集村墓葬符合东汉末年的时代特征，而非魏晋时期墓葬特征。魏晋时期，由于各政权各民族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息，社会生产力遭到很

大破坏，国家财用匮乏，社会经济凋敝，人们的生死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两汉时期曾盛极一时的“隆丧厚葬”失去兴趣了，反映在埋葬方面，一般表现为简埋薄葬。

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三年（222年）为自己营造寿陵时发布的《终制》云：“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还说：“葬者藏也”，只要见不到遗体就行了，死者“无痛痒之知”，用不着那么铺张，“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元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遇俗所为也。”他甚至担心儿子及臣下不听他的忠告私自厚葬他，所以他还特别叮嘱：“若违令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④。《宋书·礼志二》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者奢靡，多做石室、石兽、碑铭等物。东汉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承魏大统，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下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这大体上反映了魏晋时期帝王及贵戚之家的殡葬观。汉末以来长期天灾和战乱，造成魏晋时期社会财富极度匮乏，魏晋贵族既没有多少财富隆丧厚葬，也顾忌朝廷的制令不敢隆丧厚葬，所以魏晋时期多实行简埋薄葬，而且多行秘葬。到北朝时期，北方逐渐稳定下来，墓葬也较从前受到稍多的重视，但仍无法同两汉时期相比，比如北周武帝严禁立墓碑及石像生。曹魏西晋的统治者迫于经济困难，无力营建宏大陵寝，又为防止死后陵

墓被盗掘，往往“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不设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考古探觅较难。除帝陵以外，魏晋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墓葬并不受此限制，但作为中下级官吏，也不敢冒然顶风违纪。建好的坟墓可以利用，但墓室装修和随葬品就不敢太过奢侈。为预防其坟墓被盗掘，他们大多沿用本族流行的“潜埋”方式，不起坟的葬法，所以他们的坟墓也不易被发现。所有这些都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与秦汉时期的墓葬相比，其丧葬的规格已大为逊色。

在此大背景下，曹魏政府不可能允许其官吏建造华丽的墓室，但是，马集村大型古代墓葬中如此大规模的精美彩绘壁画，其耗时之多，花费之巨，似乎又与魏文帝曹丕倡导的“简丧薄葬”又相抵牾，由此可以推断，此墓葬只应是东汉末年就修建了，而不是魏文帝曹丕时期所建，只是李夏舍死于非命，死得实在太突兀，又正好遇上当时曹魏政府倡导“简丧薄葬”，所以其墓葬中的随葬品较少，只有28件陶器，档次不高。当然，李夏舍的地位不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李夏舍之墓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大概跟当时“简丧薄葬”“多行秘葬”的丧葬习俗有很大关系。

二、关于墓主人身份

根据相关的史料，再合相壁画中的题记和壁画内容，可以作出一个基本的推断：大桥马集村墓葬中墓主人，姓名就叫李夏舍^⑤，生前的身份应当是一名中下级官员。

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李夏舍以翻译官的身份奉命出使鲜卑首领轲比能部的，没想到轲比能的女婿郁筑鞬斩杀了曹魏使者李夏舍。那么，郁筑鞬为什么要不顾信义，不遵“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古训，杀害李夏舍，这很有可能与

李夏舍的族属有关。也许懂得鲜卑语的李夏舍原是鲜卑人，在后来的战争中被曹魏军队俘获，或者坐事逃入中原，还因生活所迫学会了汉语，被曹魏用为译者，前往鲜卑部说服鲜卑大人，才被郁筑鞬当作叛徒给杀掉了。但杀害李夏舍，也让鲜卑部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秋，（田）豫将西部鲜卑蒲头（附头）、泄归泥出塞讨郁筑鞬，大破之。”《资治通鉴》记载：太和二年（228年）九月乙酉，田豫联合西部鲜卑蒲头（附头）部、泄归泥部出塞，讨伐鲜卑轲比能部及其女婿郁筑鞬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曹魏对李夏舍之死的态度。

从马集村墓葬壁画内容来看，李夏舍有游牧生活理想，可以初步作出结论，李夏舍就是墓主人。也许，李夏舍被杀之后没有及时下葬，而是在田豫率军讨伐轲比能及其女婿郁筑鞬部取得重大胜利，为李夏舍报仇雪恨以后，曹魏才安葬了李夏舍。但此时已是三国曹魏时期了，为什么壁画中所画人物服饰仍为东汉时期的呢？又为什么会不遵守曹魏当时倡导的“简丧薄葬”的丧葬仪轨呢？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建墓在前而安葬在后。建墓时间当在东汉末期，而安葬时间则在三国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秋后。壁画中没有墓主人的画像，也说明建墓之时，墓主人健在。

参考文献：

①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子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9.08.01

②张一驰、张士伟.曹魏使者李夏舍之墓及其壁画[J].西安：西北美术2016年01期

③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子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9.08.01

④汉朝服饰文化：汉朝军服服饰有什么特点？[OL]_历史网lishi.com.www.lishi.com>历史网>传统文化

⑤⑥⑦晋·陈寿著.魏书·三国志.卷30.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芬楼影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⑧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子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9.08.01

⑨晋·陈寿.魏书·三国志.卷26.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芬楼影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⑩晋·陈寿著.魏书·三国志.卷30.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芬楼影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⑪⑫陈寿.魏书·三国志.卷26.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芬楼影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⑬⑭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子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9.08.01

⑮张一驰、张士伟.曹魏使者李夏舍之墓及其壁画[J].西安：西北美术2016年01期

（作者单位：甘肃陇南西和一中）

明代秦州理学家周蕙生平丛考

□ 郭延坡

摘要：周蕙是明代秦州一位有名的理学家，在明代关中理学的传承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史籍中对周蕙的生平事迹记载非常少，本文综合各种文献记载，对周蕙的生卒、出身、籍贯以及师承门生等情况试作粗浅考证。

关键词：周蕙 小泉 明代关学 秦州

周蕙，字廷芳，号小泉，是明代秦州一位颇有声名的理学家。

在明代理学发展的过程中，薛瑄开创的河东学派是明初承接程朱理学思想的一大流派，在明代关中及陇右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河东学派由薛瑄传段坚、李昶等人，经秦州周蕙传渭南薛敬之，再传承至明代中期，由吕柟发扬光大，达到明代关中理学发展的高峰。在河东学派的传承过程中，秦州（今天水市）学者周蕙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明儒学案·师说·周小泉蕙》说：“是时，关中之学皆自河东派来，而一变至道。”明言周蕙是河东之学传至关中地区的关键人物。清代学者李颀（李二曲）也评价周蕙“有功於关学甚伟”（《二曲集·观感录》）。

然而由于周蕙军卒出身，从未参加科举，一

生布衣身份，其本人也并没有著作文章传世，史籍中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非常少，又有不少错误。文献关于周蕙的记载大多文字简略，主要集中在明代冯从吾《关学编》、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沈佳《明儒言行录》《明史》以及《陕西通志》等地方史志中，其中以《关学编》记载最为详尽，其它文献多本于《关学编》。本文综合以上文献记载，对周蕙的生平、出身、籍贯以及师承门生弟子等情况试作一粗浅考证，以便更清晰认识这位明代秦州理学家。

一、关于周蕙的生卒年

关于周蕙的出生年份，《关学编》等资料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从与周蕙交往的段坚、薛敬之等人的生活年代推断，周蕙的主要活动年代在明朝前期正统至成化年间。《关学编》说：“（周蕙）

年二十，听人讲《大学》首章，奋然感动，始知读书问字。为临洮卫军，戍兰州守墩，闻容思段先生集诸儒讲理学，时往听之。”“容思段先生”即当时兰州著名学者段坚。根据《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段坚在兰州聚徒讲学主要集中在正统九年（1444年）其中举之后，至景泰四年（1453年）冬赴京参加会试前这九年之间。如果周蕙在20岁左右结识段坚的话，那么周蕙大约出生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之间。

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的一处记载和《关学编》等其它文献略有不同。《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以编年的方式记载段坚一生的大略事迹，其中记载成化五年（1469年）段坚到秦州访周蕙不遇：“成化五年己丑（段坚）五十一岁，访隐士周廷芳于秦州之小泉。廷芳年几四十。闻人讲大学首章，奋然感动……”这里说“廷芳年几四十”，与《关学编》说的“（周蕙）年二十……”相差较大，从行文语气来判断，此处显然并非指周蕙初听人讲《大学》时的年龄，而应当指成化五年段坚到访时周蕙的年龄。

《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是由段坚的学生彭泽编订，其年代上距周蕙未远，比冯从吾《关学编》早很多，应当真实可信。所以，根据《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成化五年（1469年）周蕙“年几四十”，那么可以断定周蕙大约生于宣德五年（1430年），这也和上文根据《关学编》记载周蕙听段坚讲学的时间所做的推断是一致的。

周蕙卒年不详。《关学编》记载他是因为赴江南寻访老父亲，不慎落水而亡：“迨老，以父游江南，历涉险踪，访没于扬子江。”《明儒学案》和《明史》的记载大同小异，唯有《明儒言行录》不同，说：“迨老，以父云游四方，访求不遇，卒逆旅舍。”很可能是错的。因为《关学编》说到周蕙的姓名时，特别提到：“或作桂，误。”而《明儒

言行录》却说：“周桂（一作蕙）小泉先生，字廷芳。”可见《明儒言行录》的资料来源异于《关学编》《明儒学案》等，但是有很多错误。

二、关于周蕙的出身和籍贯

《关学编》说：“先生名蕙，字廷芳，号小泉，山丹卫人，后徙居秦州，因家焉。……为临洮卫军，戍兰州守墩。”从这一记载中，我们知道他是山丹卫（今甘肃山丹县）人，是一名军卒。

有些清代的资料如《大统一统志》《明儒言行录》等直接说他是秦州人，是错误的。周蕙仅仅是后来移居秦州，而并非籍贯秦州。当然，他后来生活在秦州，其授徒讲学等主要学术活动也是在秦州发生的，所以称他为明代秦州理学家是合适的。《明史》说周蕙是秦州人，是错误的，乃是“秦”“泰”二字传抄之误，《江南通志》和道光版《泰州志》等以此为据收录传中，更是错误的。顺便说一句，《明史》中将秦州误作泰州的错误不止此一处，例如后文提到的周蕙弟子王爵本是秦州人，《明史》同样误作“秦州人”；明代曾官至礼部尚书的秦州名人门克新曾任“秦州教谕”，但《明史》卷一百三十九本传也误作“秦州教谕”。

对于周蕙的军卒身份，如果对明代军制不了解，则很容易产生错误理解，例如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丹县志》说周蕙“少时家贫，无力求学。青年时代，投身行伍……”（《山丹县志·人物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这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不准确的。明代的军制是一种特殊的制度。明代实行卫所军制，军籍与民籍、匠籍平行，民籍属于户部，匠籍属于工部，而军籍则隶属于都督府。军人是世袭的、家族的、固定的，军人在身份、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一个人一旦为军，他的一家便世代代隶属军籍，成为军户，迁往指定的卫所居住，其家庭及子孙后代以军籍行世。正军老病死亡，则由其家

族其他男丁（称为余丁）替补。所以，周蕙之所以不读书参加科举而是从军，并非因为他“少时家贫”，而是为他的军籍身份所注定。可以推断，周蕙祖上由于从军，成为军户，落户籍到山丹卫。到周蕙时承袭军籍，达到一定年龄（一般是十五岁）遂依例成为一名军卒。

山丹卫是明代军事卫所之一。《明史·兵志》：“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成祖以后卫所数量有所增益，《明史·职官志》：“计天下内外卫，凡五百四十有七，所凡二千五百九十有三。”周蕙军籍所在地山丹卫，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九月置，属于军政合一的卫所，初属陕西都指挥使司，后改隶陕西行都指挥使司。

明代的军户一般都是从外地迁移而来，将军籍落在卫所内，远者距原籍数千公里。这种军籍与原籍的背离，也导致明代史籍中对很多人的籍贯记载混乱不清。例如，上文提到的《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编订者彭泽，在正德年间官至兵部尚书，是明代一位能吏。《明史》卷一百九十八本传记：“彭泽，字济物，兰州人。”似乎他的籍贯就是甘肃兰州。但是在《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中，彭泽又自称“长沙门生”。清邓显鹤编辑《沅湘耆旧集》，专门辑录历代湖南籍人士诗作，其中收录彭泽《皋兰送别从子永端归湘》一诗，诗前作者小传说：“泽字济物，湘阴人，以兰州籍中宏治庚戌进士。”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三十九收录的兰州人刘耕作《大司马彭公别传》的记载则是：“彭泽，字济物，号幸庵，兰州卫人。”通过仔细查考可知，彭泽原籍是湖南湘阴县，因为祖上在明初从军才世居于兰州卫，到了彭泽这一代，虽其本人已并非军人身份，但因为出身军户家庭，其户籍仍属兰州卫管辖。又如目前天水市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南宅子的原主人胡来缙，《甘肃通志》卷三十六：“胡来缙，字东泉，秦州人。”康熙版《巩昌府志》：“胡来缙号东泉，秦州卫籍。”而根据胡氏宗谱，胡来缙祖籍实际上是安徽凤阳府五河县，其先祖在明初追随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洪武二年（1369年）徐达率部攻克秦州，随部队驻防而落户于秦州卫。

可以推断，《关学编》等资料说周蕙是“山丹卫人”，同样也是仅指他的军籍所在地，作为军户，其原籍很大可能并非山丹卫。《明儒学案》说周蕙“以父游江南，久之不返，追寻江湖间，至扬子而溺”，《明史》也说他的老父“久游江南不反”，那么周蕙的父亲为什么赴江南多年不归呢？明代的卫所大多设于边瘴之地，军户生活艰苦，军人多有逃亡，而正军之外的余丁等军属则更多地选择回原籍生活。仅举一例，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梦阳，原籍为开封府扶沟县，因祖上从军而落籍于庆阳卫，至李梦阳父亲一辈则又返回开封生活，李梦阳本人也出生于开封。周蕙之父退伍后久居江南，很可能也是回原籍生活而已，所以可以推测，周蕙的原籍可能是江南某地。

三、隐居地“秦州小泉”

《关学编》《明儒学案》等记载周蕙“隐居秦州之小泉”。小泉即今天水市清水县红堡镇小泉村，有论者说其位于今天水市麦积区，是错误的。明代清水县属秦州管辖，所以史籍中称其为



“秦州小泉”。

《甘肃通志》卷六·山川·清水县：“小泉峡在县西南三十里，地暖禾早熟。”康熙版《清水县志》：“小泉峡在邑西南三十里，地暖禾早熟。”“小泉，在小泉峡。”小泉峡今又名牛头河峡谷，自清水县红堡镇西城村至麦积区社棠镇柏林村，全长27公里，峡谷内风光秀丽，人文荟萃。小泉村位于小泉峡峡谷之中，距清水县城15公里，距秦州城45公里左右。周蕙曾受学于清水教谕李昶，时常往来于秦州和清水县之间，最后选择处于两地之间的小泉村作为隐居之所，既便于往来秦州清水两地，又环境清幽，适宜隐居读书。段坚曾有诗描述周蕙的隐居地：“白云封锁万山林，卜筑幽居深更深。”

四、师承与门生弟子

周蕙作为薛瑄河东学派传承的关键环节，其师承和门生的传承关系与河东之学的传布密切相关。周蕙先后师从两位理学家，其一是兰州著名学者段坚。《关学编》载：“（周蕙）闻容思段先生集诸儒讲理学，时往听之，有闻即服行。久之诸儒令坐听，既而与坐讲，既而以为畏友，有疑与订论焉。段先生勸以圣贤可学而至，教示进为途方。段先生曰：非圣弗学。先生曰：惟圣斯学。遂殫力就学，究通五经，笃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当时见者亦翕然以为程朱复出也。”这段文字记叙了周蕙从学于段坚并学有进境，以及与段坚论学的过程。“非圣弗学”“惟圣斯学”则鲜明体现了河东学派传承程朱理学“以圣贤为师”的进学理念。

段坚（1419—1484年），字可久，号柏轩，又号容思，明代兰州段家滩人。曾先后任山东福山知县、莱州知府和河南南阳知府，是明代陇右地区重要的理学大家。段坚虽并非薛瑄及门弟子，但与薛瑄的两位著名弟子阎禹锡、白良辅过从甚密，时常相与切磋学问，深受薛瑄思想影响，得其

思想真传，以薛瑄私淑弟子自况，自称“百载程朱真绝学，高深私淑后人思”（《皋兰明儒遗文集·南村吟》），当时人称赞段坚：“文清之统，惟公是廓”（《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

周蕙曾在兰州从学于段坚，但二人属于亦师亦友的关系。明代文学家、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大复，1483—1521年）说：“先生（周蕙）于容思先生，其始若张横渠之于范仲淹，其后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阳也。”（《关学编》）当初蔡元定欲拜朱熹为师，朱熹叩问其学，认为“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宋史·儒林传》）。这也就是说，周蕙之学入门虽由段坚，但却不在段坚门人之列。

周蕙移居秦州以后，两人还经常书信往还，继续着学问上的探讨交流。《段容思先生年谱纪略》：“后每得廷芳书，质论精明，见道真切，先生称重之，谓其人如金玉德音。……”

《关学编》载成化四年（1468年）段坚赴秦州小泉探访周蕙不遇，留诗二首：

其一

小泉泉水隔烟萝，一濯冠缨一浩歌。
细细静涵洙泗脉，源源动鼓洛川波。
风埃些子无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
老我未除尘俗病，欲烦洗雪起沈疴。

其二

白云封锁万山林，卜筑幽居深更深。
养道不干轩冕贵，读书探取圣贤心。
何为有大如天地，须信无穷自古今。
欲鼓遗音弦绝后，关闽濂洛待君寻。

除段坚之外，周蕙就学的另一位老师是薛瑄门人李昶。关于李昶，目前可知的文献记载非常少。《明史》于《周蕙传》下附记寥寥数语：

“（周蕙）又从学安邑李昶。昶亦瑄门人也，由举人官清水教谕。学使者叹其贤，荐昶代己，命未下而卒。”《明儒言行录》卷二：“李昶，山西安邑人，景泰丙子举人，授清水县学教谕。恭勤博览，尝从学薛文清公而德行粹白，时人多以理学师之。”可知，李昶是山西安邑县人，明景泰七年（1456年）中举，授清水县学教谕，其学问人品颇受时人敬重。

《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七“河津县”条目下记载了薛瑄祠的修建情况：“薛文清公祠在县治南……隆庆初，县令张汝乾拓地增建，县令刘希孟以弟子配飨者四人：阎禹锡、白良辅、张鼎、李昶；从祀者十二人：谢琚……”，在薛瑄祠中将李昶与薛瑄的三位著名弟子阎禹锡、白良辅、张鼎相提并论，说明李昶在薛门弟子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是比较高的。

关于周蕙的门人弟子。《关学编》：“先生门人甚众，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明史》：“门人著者薛敬之、李锦、王爵、夏尚朴。”

关于“夏尚朴”，除《明史》外，《关学编》等其它资料均未提及。夏尚朴（1466—1538年）是明代文学家，著有《东岩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东岩集》，明夏尚朴撰。尚朴字敦夫，东岩其号也，永丰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尚朴初师吴与弼，后师娄谅，故《明史·儒林传》附见谅传中。惟史于薛瑄传末又称，瑄之门人有周蕙，蕙之门人有薛敬之、李锦、王爵、夏尚朴，与谅传不合。考传末惟叙敬之、锦、爵三人事迹，一字不及尚朴，则瑄传列尚朴之名，殆衍文欤？”《四库全书总目》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明史》中周蕙的门人列夏尚朴之名，应当是衍文。所以周蕙最有名的弟子，史籍有传的有三人，即薛敬之、王爵、李锦。

王爵，生卒年不详，秦州人。《关学编》：“爵

字錫之，自少潜心力学，及长从游先生门而知操存。郡守秦公与语，悦之，时与讲操存之学。”王爵从学于周蕙，深得当时秦州知州秦紘的赏识，其后曾任保安州通判，为官清廉，谦谦自守，后来秦紘总督陕西固原等地军务，聘王爵入幕府，“三年相处如一日”。冯从吾在《关学编》中说“（王爵事迹）详载可泉胡公纂《巩郡志》中”，在《答李翼轩老师》一文中也说：“近又于胡可泉《秦州记》中查出周小泉一弟子王君名爵者，亦补入周传内。可见深山穷谷之中，故不乏真修实践之士。”（《少墟集》）说明王爵的传记最早出自胡瓚宗编撰的《巩郡志》或《秦州志》中，可惜这两种方志今早已失传，关于王爵这位明代秦州学者的更详细资料已不可得。

李锦（1436—1486年），字在中，号介庵，陕西咸宁县（今西安市）人。天顺六年（1462年）中举，后来曾任松江府同知。因听周蕙讲程朱之学而大悟，“学于周小泉，得闻先儒要旨，遂弃记诵辞章之习，以穷理主敬为学，知行并进”（《明儒言行录》），终成为当时关中地区一位名儒。李锦为官清廉，《关学编》说他：“生性刚介，不妄交接，不苟为然诺。义之所在，确然自信。不以一毫挫于人，尤重取予。所居仅蔽床席，茹淡服䟽，虽至屡空，终不轻有所取。”《明儒言行录》记载李锦与周蕙一次理学思想的辩难切磋：“再访小泉于秦州，印证所学，设疑辨难，叩应不讹，小泉叹服而去。小泉尝难之曰：有人亲病，剧思食一梨，求诸市不得，邻人有种者，非窃不获，将窃之乎？答曰：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小泉是之。”

薛敬之（1435—1508年），字显思，号思庵，渭南人，曾任应州知州、金华府同知，曾从学于周蕙，是明代关中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一位理学家。周蕙的学问人品对薛敬之影响非常大。薛敬之从

学时，作为弟子对周蕙非常恭敬：“从周先生学，常鸡鸣而起，候门开，洒扫设坐，及至，则跪以请教。”（《明儒学案》）后来自己开馆授业时，也常常以周蕙的道德学问为榜样教导他人：“故谓其弟子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其学近于伊洛，吾以为师。陕州陈云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吾以为友。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明儒学案》）

薛敬之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思庵野录》《道学纂统》《洙泗言学录》《尔雅变音》《田畴百咏集》《归来稿》《定心性说》等。薛敬之的学说，上承薛瑄以至周蕙，下启关中理学大家吕柟，注重“理气”，认为理在气中，“独理不成，独气不就”“一身皆是气，惟心无气”“未有无气之性”。主张宇宙遵循“无极——太极——天地——五行——四时——人”的演化过程。薛敬之“以道自任”，常对弟子说：“学必希圣，犹食者求

饱，行者赴家。食而不饱则馁以死，行无赴家则老无归宿所矣。”（《思庵野录》）他的“以道自任”“学必希圣”的为学志向即来自于周蕙的“惟圣斯学”之说。

参考文献：

- [1]米文科. 薛瑄与明代关学的中兴[J]. 兰州学刊. 2010 (12)
- [2]朱岚, 王维平. 段坚理学思想论析[J]. 兰州学刊. 1991 (4)
- [3]顾诚. 谈明代的卫籍[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9 (5)
- [4]吴晗. 明代的军兵[J]//吴晗. 读史劄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6.
- [5]萧无波. 吕柟与关学[J]. 船山学刊. 2007 (4)

(作者单位:中共天水市委党校)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举办全省地方综合年鉴业务培训班

2018年4月11日至12日，全省地方综合年鉴业务培训班在兰州举行。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郝宗维主持，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巡视员石为怀在开班仪式上通报了全省年鉴编辑情况，就全省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及下一阶段工作讲了三点意见：一是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增强工作紧迫感；二是依法履职，敢于担当，切实做好各项工作；三是坚持质量标准，规范编辑行为，提高办鉴水平。

培训班上，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负责同志，5名市（州）、县（区）志办主任从地方综合年鉴框架结构设计、创新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地方综合年鉴的类目设置、地方综合年鉴条目编写及常见问题、浅析县级地方综合年鉴的实用性问题、地方综合年鉴的组稿、改稿和统稿、《西峰年鉴》编辑得失与思考、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思考7个方面授课。此次培训班授课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突出存在问题，结合工作实际接地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全省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地方史志系统分管年鉴工作的负责同志和业务骨干135人参加了培训。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供稿)

吴之珽所著《襄武人物志》对陇西文化的贡献

□ 王长华

吴之珽，字乾玉，号赤谷，陇西吴家巷人。康熙年间，由拔贡历任江西婺源县、江苏宝应县、浙江秀水县知县。吴之珽具有很高的史才，著述较多。所著《襄武人物志》二卷，各十六篇，共三十二传，有黄廷钰、王懋竑的序文。

吴之珽《襄武人物志》取材较严，描写精细，颇得时人及后世好评。

黄廷钰（生卒年不详），字二如，一字澹园，奉天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乡试副榜，五十年（1711年）知静宁州事，五十五年（1716）年，黄廷钰与吴之珽共同纂修《静宁州志》十四卷首一卷。

由此可见，黄廷钰对于吴之珽是十分了解的。黄廷钰为《襄武人物志》作序说：“阐发幽微，具史识；书法谨严，具史律；描写生活，具史笔，可与龙门庐陵相颉颃。”

意思是说，吴之珽阐释和发掘幽深细微的历史故事，具有很高的历史见识；其著作体例严

谨，法度严密，遵守了历史文章书写的规律；其文辞典雅生动，描写清新活泼，具有良史之妙笔，可与西汉司马迁和北宋欧阳修的历史功绩相媲美。

王懋竑清代江苏宝应县人，生活年代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雍正元年（1723年），授予翰林院编修，为清代著名学者。

王懋竑评价吴之珽的《襄武人物志》说：“其事核，其词质，昔人所谓有良史材者也。余读其自序，盖慨然欲追唐宋以上之作者，而几与班范并。”

大意是说：吴之珽的《襄武人物志》，事迹真实准确，文辞质朴优美，正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具有良史才华的人。我读他的自序，慨叹他的志向，显然是要比拟和超越唐宋以上的文章大家，并且可以和汉代班固和南朝的范曄比肩。

这两位的评价应该是相当准确和公允的。

毅然任外史之事 直笔传遗事逸闻

一部优秀的史志作品，除了客观准确地描写历史事实之外，还需要作者具有很高的史识水平，这样的历史“见识”，最能够体现这部作品的史学价值。

在历代史书中，最能反映作者的“史识”水平的，就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名著《史通》中曾列举过许多此类名目，并统名之曰“论赞”。

“论赞”是著者发表的关于史事的思想、主张、见解，也就是史评、史论。这种史评、史论有很多不同标识、名目，《左传》称为“君子曰”，《史记》称为“太史公曰”，《汉书》《后汉书》《明史》称为“赞曰”，《三国志》称为“评曰”，《旧唐书》称为“史臣曰”，《宋史》《清史稿》称为“论曰”，《资治通鉴》称为“臣光曰”等等。

《襄武人物志》中，反映吴之珽的“史识”的，就是书中的“外史氏曰”。

吴之珽以“外史氏”自居的缘由，在《襄武人物志·外史氏自序》中，说得非常清楚明白：

粤稽《周礼·春官》，设太史，又有小史，以掌邦国之志；设内史，又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后世小史、外史无专官。虽郡邑，莫不有志，然掌故寝废（停止；废弃；废除。）矣。

意思是说：考查《周礼·春官》这部儒家经典可知，在当时就设有太史和小史这两个官职，他们的职责是负责记录和整理各个邦国的史志；还设有内史和外史，负责各地方的史志，后世不再设小史和外史这两个专门官职。即使是郡一级的地方，也无不有自己的志书。但是，到了后来，这种凡是郡县都有史志的典章制度逐渐荒废了。

所以，吴之珽以“外史氏”自命，就是想延

续古代这种传统，为地方修一部优良的史志。

他在《襄武人物志·外史氏自序》中，列举了几个例子：东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襄阳人习凿齿就撰写了《襄阳耆旧记》，这是研究襄阳古代中国人文的重要历史文献；还有《益州先贤传》等史书，如同繁星闪烁，光彩照耀，名列于优秀的图书之列。明朝开国元勋宋濂，著有《浦阳人物志》，这是记载浦江乡贤的地方人物传记；明代程敏政，著有《新安文献志》专收徽州本郡自汉迄明乡贤所撰之诗文及外郡人徽州先贤行实之文。全书共收1087篇，诗1034首。百卷之前，先列有《新安先贤事略》上下卷，上卷收列徽州籍各朝名人326人；下卷收列外地曾在徽州为官或寄居的名士114人。

然后，吴之珽叙述了当地史志修撰的情况和自己毅然担当“外史氏”的原因：

巩昌府原来就有史志，明代嘉靖年间胡缙宗就撰有《巩郡记》（20卷），天启年间，户部主事杨恩，在胡著基础上撰成《巩昌府新志》（28卷）。巩昌府遭逢兵燹之后，《巩郡记》和《巩昌府新志》都残缺不全，甚至错讹相延。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上的贤达人士诚恳地对他说：

“您从事历史文章的修撰已经有很多年了，先生努力做事，不诉说自己的劳苦，大家也有目共睹！但是，秉持春秋直笔，为后世留传嘉言惠行，难道您就没有这个想法吗？何况我们陇上渭首之地荒凉寒冷，到如今士风不振，在此任职的许多官员，大都认为我们这个地方出不了人才；而土生土长于这个地方的人，则耳目闭塞，所见有限，没有感受过先贤流传下来的风尚，当然也就无法激励士气。我们不想就这样自轻自贱，也不是想扬名于天下，但还是恳切希望先生您能够

不辞劳苦，担任外史修志之事。”

吴之珽听了这番话后无法谦让，喟然兴叹说：“好吧！我才能有限，确实不足以担当这个大事。但是，回顾自己涉猎各种史志已经十有余年，在此之前就已经写成了一些草稿，再补充和整理一下，就拿出来请大家指教吧！”

于是，经过一番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的艰难过程，吴之珽终于修撰完成了《襄武人物志》，内容包括从两汉以来至于当时的几十余位人物。

幽谷寒岩畜栋梁 深山大泽潜龙蛇

具备什么条件的人，才能被写入《襄武人物志》？这涉及到吴之珽的“人才观”。换句话说，这也反映了作者的“史识”问题。

吴之珽认为，那些名望才能为世人所重的杰出人才，说不定会在哪一天降生。普天之下的超拔脱俗之士，不会局限于一个地方，但有的人却不以为然。探求珍珠，必须要在深渊中寻找，没听说过在深山中去采珠的事；探寻美玉，也必须要在含有玉的璞石中去寻觅，没听说过要在木头中去找玉石。所以说：“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还有一种说法：“邹鲁文学，吴越俊秀。”如果换了一个地方，出产的东西就不见得好，人才也如此，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吴之珽还说，我曾经和天下的名士们屡有交游，纵论古今人物时发现，人才的出现，大致有一个普遍的规律，那些特立独行之人，无论在东西南北，都会产生，这是上天一心一意眷顾钟爱的结果。所以，幽谷寒岩而栋梁是畜，深山大泽而龙蛇潜伏，这个道理很明白，基本上没有什么疑义。

正是抱着这样的“人才观”，吴之珽才对陇西当地也能够产生人才颇有自信：

襄武，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边疆地区，秦汉以来，汉族、戎族和羌族等民族错杂居住，番汉交

融。自从中原王朝对此地进行治理以来，也是代有人出，不乏俊才。这些才俊之士的流风余韵，必有其源头。我的努力，就是寻求他们的本源。就算是年代久远，难以尽知，但我还是要尽量搜寻他们的事迹，不让他们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湮没无闻。

王懋竑对吴之珽的作为极为赞赏，称赞吴之珽为“有良史材者”，他在《〈襄武人物志〉序》中评价说：陇西，汉郡，故治襄武，今更以陇西为其县名。其迫近羌戎，图籍散佚，而晋魏以后多战争，人物亦罕可纪。残碑断碣，仅有一二存者，而亦莫之考也。公为之搜采史传，网罗放逸，贯穿驰骋，其勤至矣。至于近世，闻见所及，尤注意焉。其事核，其词质，昔人所谓有良史材者也。

王懋竑还将吴之珽和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班超和范曄相提并论：余读其自序，盖慨然欲追唐宋以上之作者，而几与班范并。所云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则又深有惧焉。而仰以望千载之前，俯以待未来之后世，而不胜其幽遐绵渺之思也（《〈襄武人物志〉序》）。

王懋竑还认为，吴之珽的功绩，完全可以和明代宋濂、程敏政相媲美：昔所传《襄阳耆旧记》《汝南先贤传》《莆阳人物志》诸书，今不尽可见，而《浦阳人物志》《新安文献志》具在。以公所为较之，无弗及也（《〈襄武人物志〉序》）。

著作成垂世之书 列传名一时俊彦

吴之珽对其笔下的“襄武人物”，都做了非常精辟的概括和评价：

我曾亲往陇西首阳山考查古迹，发现有伯夷叔齐墓存在，这两位古代君子，怀抱清风，耻食周粟，我把他们二人写成《古逸过化》的文章，这是第一篇；闻听过伯夷的高风而后继者大有人在，继承他们的美德，追寻他们孤独的踪迹，具有高尚品节者，还有朱冲先生，所以，我撰成

《朱先生传》第二篇；汉代以来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人，大半已消失湮灭了。缅怀他们的芳踪，披览他们的遗文，如廉褒将军和担任过郡上掾一职的秦嘉，于是我写成了《廉将军秦上掾传》，这是第三篇；庞德战死后谥为“壮侯”，这实在是一位忠贞之士，因为力非所敌，被关羽所杀，但他的刚义之声却名传千古，于是写成《庞德传》，作为第四篇；彭祈历任四郡太守，忠以事上，清以守己，威以克敌，恩以惠下。刺史任杲，因伐蜀有功，进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了宣扬他们的大名，使这二人的君子之风不至于湮没，我写成《彭祈任杲传》第五篇；天水为赵姓的郡望，在历代都立有功勋，而被赐以很高的爵位，尤其在北朝，赵姓家族的名声更加显赫，于是，写成《赵贵赵善赵昶传》第六篇；虽然时世动荡不安，但英俊之才辈出，五胡十六国之际，苻氏、吕氏、姚氏、乞伏氏，都兴起于陇西，于是我作了《列国人材传》第七篇；由布衣而到卿相，高居三公之位而犹存儒风，不贤之人能如此吗？这是《赵贞宪传》第八篇；江左之地，王谢两大家族的名气很大，而在陇西，诸李的名声也家喻户晓，自从李太白之后，后世发扬光大其家族之风者也大有人在，如李揆、李益、李贺，我把他们合写成《三李先生传》，这是第九篇；彭琦奉职三朝，殚精竭虑，维持大局，我为之写成《彭献忠传》，这是第十篇；大凡贤德之人，人人爱而敬之，则其人风范可知。刘锜以兄长之礼对待王德，岂是随随便便能做出来的！我为之作《王统制传》第十一篇；李忠威是塞上英雄，大节炳燁，这位先人的英烈行为，可以光耀他的家乡，我因此作《寓公李忠威传》第十二篇；修筑城池兴建学校，防御天灾兴利捍患，其懿行得到后世的追怀，并被供奉在学宫而享受后人的祭祀，这是我作《汪义武传》第十三篇的意图；金

元鼎革之际，义士各择其主，我为此而作《李忽兰吉传》第十四篇；乱世之际，群雄虎踞，比如赤亭姚氏，他们的事迹更有可圈可点之处，故为之作《赤亭姚氏传》第十五篇；贵拜住在元代至正壬午年（1342年）状元及第，后为一时贤相，其功业文章，有目共睹，而且贵氏一门忠义，因此作《贵氏传》，这是第十六篇；韩缙，明永乐丙戌（1406年）年间进士，历仕三朝，敏于辞翰，书类欧阳，诗法杜陵。杨仕敏，曾官拜监察御史、山西布政司右参政等职，退休之日，行李极其简单，巩昌当地人无论贤良还是不肖者，都以父亲之礼对待他，我为此而作《韩省郎杨参政传》第十七篇；明朝近三百年来，文职官阶中有八种高级官员，但列为名臣者仅两人而已，这就是忠正刚直的宋琮和才兼文武的范镛，我为此作《宋罔卿范中丞传》第十八篇；明代正德和嘉靖之间，人文风气浓郁，蔚然大观，如正德丁丑进士（1517年）畅华，任山西按察司佥事，明断刑狱。嘉靖辛丑（1541年）进士刘应熊，官至广东道监察御史，但仍然保持着儒雅的气质和朴素的家风，朝野上下，都认为他是贤明之士。还有嘉靖辛丑进士王朝用，断狱除奸，卓有建树，我为此而作《畅刘王传》第十九篇；文人中有宋琮和范镛，军人中则有种勋和雷龙，他们都是名卿贤将，共同跻身于高官之列，我于是作《种雷二都督传》第二十篇；世代食禄之家很少，特别是历代都是军人的家庭，要让后代成为彬彬有礼之士，这就很难了。但阎震一门，却代有儒风，我为此作《阎指挥震传》第二十一篇；何士玮，历任贵州按察司副使、毕乌永赤兵巡道。祁继祖，曾任贵州游击，两人都曾在贵州立下了赫赫功绩，声威著于当地，我为此作《何观察祁副戎传》第二十二篇；明代堪称忠臣，而为国尽节者，以关永杰（字睢陈）最为壮烈，因此我作了

《关雎陈传》第二十三篇；王广文，明正德间以国子监生授河南沈丘县学训导，汴东盗贼攻破城池，王广文与其子王礼及学生们奋力巷战，最终被盗贼杀害。杨广文，明崇祯间以岁贡为渭南县儒学训导，后被李闯王的军队杀害。近代贤良往往受恩于往昔贤哲，这二人合起来堪称双美，我于是作《二广文传》第二十四篇；郭充，字损庵，是今朝（指清朝）隐逸之民，也是先朝（指明代）遗老，我为之作《郭损庵传》第二十五篇；不买名山作为隐身之所，不攀青云作为晋身之阶，只有几卷残稿零落人间，馨香之气惠泽后人，我因此而作《王菏泽传》第二十六篇；宋朝楠，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入庶常散馆学习，历任江南主考，曾参与编修明史，最高职务为通政使司左通政，他不刻意凌空蹈虚，但立足于当朝，也有良好的政声，这也算不失士大夫的清流怀抱，我于是作《宋通政传》第二十七篇；甘于寂寞，生活清贫，但著述终身，于是我作《杨潜斋庆传》第二十八篇；有一点善举也必须发扬，有一处美行也必须表彰。例如，东良惠，在元朝官至商州总管，后死于红巾军之乱；陈芳，拜四川道监察御史，风纪肃然；汪寿，屡立战功，名重当时；杜俨，任太仆寺少卿，以清廉孝友而为当世典范；刘钺，简朴笃实，有古君子风，以廉吏著称；王尚质，历官直隶涿州知州、永平府同知，颇有政声；何溥，曾任保定府通判，端庄严肃有君子风范；陈三奇，明万历年间在军中效命，出奇策而建军功。为了这些人的事迹能够得到传扬，我作《拾遗传》第二十九篇；虽然是布衣匹夫，但大节不亏，也有值得君子仿效之处，如：曹敬德、成勋、张世昌、关世安，父母去世，搭起草庵在墓旁守孝；阎绅，妻子汪氏去世后，他才三十九

岁，誓不再娶；车廷臣，有一位同父异母且贫困鳏居的兄长，终身侍奉而不断；孙绪，拾金不昧，我于是作《孝义传》第三十篇；闺阁中也有行为可堪表率之人，足以令须眉男子惭愧，如明肃恭王妃杨氏；田氏，夫早逝，家贫，产一遗腹子，誓不改嫁；还有王氏、齐氏、张氏、李氏等等，不一而足，我于是作《列女传》第三十一篇。

修身饬行，有意于后日之名

丰功骏烈，以见于国家之史

静宁知州黄廷钰对吴之珽给予很高的评价：“夫吴子乾玉，非一乡之士也；《襄武人物志》，非一邑之书也。”

和吴之珽同时代的学者王懋竑，对他的评价最为全面准确。

古代列国都有史志。自封郡建县以来，列国修史的传统就费弃了。此后就有了图志，而图志也属于史志之类。作为一种书籍，大部分都是供有关机构参考，重在记录故事而已，对于山川疆域州郡沿革记载较详，而对人物则略而不记。于是，有识者认为，这是一个缺陷。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后世就有了《先贤传》《人物志》，这个传统自汉代以来就有了，而把它传承下来的则寥寥无几。

自汉代班固和南朝宋范曄之后，史传大都在流传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还有的本身就肤浅丛杂，不值一看。自宋代以下，尤其琐碎烦杂，纷乱不堪，没有法度。这还是聚集了当时的文人才士编撰成的，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地方的史志与人物传，本来就是一个人的见解。前者，由于时代久远，作者没有亲闻亲见，如果没有记录和注解做说明，就变得空疏而不可考证；后者，由于容易掺杂个人的好恶之心，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褒贬，往往不完全合于公议，或者

因为是同乡旧友的缘故，有所回避和隐讳。而且，作者又未必通晓史传文章的写法，拙于取舍，繁简不当，使优秀人物的事迹得不到彰显，所以，这样的文章终究留传不了多久。

士人君子修身养心，规范言行，即使穷苦困顿，仍然能够以之自立于世。荣华富贵和显赫地位，已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东西，但对于身后之名，却不能不有意。就算没有尊爵高位、丰功伟绩，被载于国家历史，但却未必没有雄奇瑰丽的篇章，留传千百年，这就是修撰史志的目的！如果后世的人们，没有把他们的事迹传承下去，那么，这些人以穷苦困顿，而自立于世的事迹，终将湮没不闻，不能光耀于后世，这是非常可惜可叹的事！

王懋竑还列举了有功于其家乡江苏宝应县的几位人物，来和吴之珽作对比。

我们宝应县，自从孙克己（1604—1684，字礼选，号勿斋。康熙九年（1670年）敕封文林郎，宝应县知县。1681年，诰封奉政大夫、户科掌印给事中）以来，以儒雅之风整饬吏治，俨然有两汉循吏之风，至今没有继承之人，但见到吴之珽先生，孙公良吏之风终于再现了。孙公曾经修撰过宝应地方志，但没有完成，后来，乔莱公（乔莱，字子静，号石林，扬州宝应人。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明史》，二十四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旋迁侍讲，再升侍读。后因河臣之议触犯权贵，被罢官归隐田园，著作有《归田集》《石林赋草》）终于将其完成。乔公在任翰林院编修期间，有过撰写史传文章的经历。汪琬（1624—1691）字茗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初官吏学者、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康熙十八年（1679年）

举鸿博，历官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编修，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所作的列传，卓然独立，超然绝世，足以传之后世，但后来其版本毁于火灾，后人想接续汪琬的工作，但却没有能够担当其事之人。

现在读到吴公之书，我才有了深切的期望。吴公必定能够继承孙公、乔公的作为，为宝应留下一部优秀的志书。后人如果披览我们宝应的地方志，应当不会有什么遗憾。

值得指出的是，根据黄廷钰的序言和吴之珽的自序，可知《襄武人物志》应该成书于康熙乙未（1715年）。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遭逢战乱，此书的命运也坎坷多舛。尤其是同治五年（1866年），巩昌府被回军攻陷，史册典籍毁于一旦。

光绪十一年（1885年），巩昌知府颜聘卿，礼聘陇西士人原浹续修府志。在四处采访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原浹在陇西东乡黄某家中偶尔得到此书，欣喜过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原浹之子原鹏翎邀同人措资刊刻此书，中间经历了180年。

又过了113年，2008年，陇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按原版重印此书，这才使得这部珍贵的典籍，重新得以与世人见面！这令人唏嘘不已！

300年后，当人们重新披览这本记载陇西先贤的《襄武人物志》时，不禁会生出良多感慨！尤其是“幽谷寒岩而栋梁是畜，深山大泽而龙蛇潜伏”，可谓道尽了人才出产的规律！当政者不可不借鉴之！

（作者单位：甘肃省定西日报社）

古道新知：考古新发现所见 甘肃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 张 东

丝绸之路历史悠久，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甘肃出土的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蓝莲花玻璃托盏，陕西出土的神兽形金饰、兽首玛瑙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玻璃器，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弈棋仕女绢画等都是世人瞩目的丝绸之路文物珍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表明，公元前138年张骞通西域之前，东西方之间就存在着若干条文明交流的通道。这些通道被命名为玉石之路、青铜之路、草原之路……张骞通西域之后则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文明交流的新时代，即由零星的、断续的、小规模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的、持续的、官民结合的交流。

来自地中海的器物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遗址抢救发掘的战国墓地出土文物证实：此地公元前300年左右就已与西亚地区有联系和交往。

马家塬墓地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西戎皇室家族墓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甘肃省从2006年开



始对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进行全面勘探，共查明墓葬59座。之后几年，发掘17座墓葬和1座祭祀坑，出土随葬马车30余辆；大量精美青铜器物和金银随葬佩饰，主要有青铜壶、青铜茧形壶、金臂钏、金腰带以及金质耳环、银杯、釉陶杯；还有大量玻璃态管形珠、肉红石髓珠金帽饰等。

马家塬墓地出土的玻璃态材料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种类和功能丰富，包括玻璃、费昂斯、汉蓝、汉紫等，主要为各种形状的珠子和用于镶嵌的材料。出土的“连珠纹釉陶杯”通体饰淡蓝色釉，腹下部装饰七层连珠纹，敞口小平底。该器物为地中海文明的器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出土的金珠及金器中的掐丝、镶嵌等工艺更可能源自于地中海东岸的西亚；出土的动物纹金箔，是从现今俄罗斯阿尔泰和图瓦传播过来的；玻璃杯和大量使用金银器则是来自西方。

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的重要发现，是研究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一般我们认为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要道，自张骞出使西域后逐渐行成。东起古都长安（今陕西西安附近），沿渭水西行，经张家川马家塬、河西走廊等地，到达敦煌，出玉门关和阳关，进入“西域”（今新疆及以西地区），即今天人们所称的“丝绸之路”，而马家塬战国墓地文物的出土，则

使丝绸之路的形成年代至少提前了100多年。

“丝绸之路”早在汉代之前就已存在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张掖市甘州区西北的黑水国遗址考古现场发现距今4000多年的冶炼遗迹，首次在半地穴式房屋内发现马厂晚期的冶炼遗物。从考古发掘看，黑水国遗址所在地的冶铜活动从马厂文化晚期就已出现，至四坝文化早期一直进行，历时几百年，从出土的器物看，当时的冶炼以红铜为主，出现了少量青铜，并已经开始合金化的尝试。众所周知，在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境内，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而黑水国的冶炼地点正处在这一核心地带。我们可以推想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前，新疆到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定存在着沟通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的一条青铜之路，它所传播的不仅仅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还包括众多的物资、语言和思想。

此外，在黑水国遗址发现的土坯房，其建筑方法与中亚相似，是用模子脱出来后，一块块码成线，再一层层垒起来形成的。而该项技术可能来自于中亚，最终源头应为西亚。土坯房年代为公元前2100-1500年，这表明在4000年前，张掖地区就已与西方存在文化交流，远早于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开通的年代。

“古丝绸之路”上的“精灵”

张骞通西域后，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杂技幻人开辟了新的世界，史书记载了幻人表演的西域各种幻术，《魏略·西戎





传》记录：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河南新野和山东嘉祥的汉代画像砖上都有高鼻深目戴尖顶帽的胡人口吐火焰的形象。2001年，庆城县唐穆泰墓出土的胡人杂戏俑，清晰地展现了当时外来艺人的表演情形。

泾川大云寺遗址新发现佛教遗存

2012年底，泾川县城关镇共池村村民抢修道路时，在大云寺遗址发现石刻造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佛教造像窖藏、地宫遗存、穹窿顶遗存各一处，共出土各类单体造像、造像碑（塔）240余件（组），主

要为石造像及少量陶造像、泥塑造像、经幢等。地宫内有明确的“大宋大中祥符六年”砖铭，说明该地宫遗存应为宋代龙兴寺的组成部分。此次出土的佛教造像涵盖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等各个时期，种类繁多，内涵丰富，题材多样，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出土的佛教造像形成时间上与山东、北京、陕西等地出土的佛教造像相互衔接。全国的大云寺、中兴寺和龙兴寺是一脉相承的，泾州龙兴寺可能在唐代就有。泾川佛教历史至少有1600多年，结合古代泾州是长安门户、丝路中枢以及民族融合等因素，可以确定古代泾州在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繁荣和传播中，处于佛教东渐桥头堡的重要地位，是多元文化的创新地和交汇地，从而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找到了一个重要坐标。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串联人类各文明交往的大通道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而考古学正是通过对丝绸之路上若干“点”的发现，连接了已经淹没于地下的“路”。随着考古发掘和调查量的增加，分析检测方法的丰富，考古工作深度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在遗迹、遗物分布甚多的“丝绸之路”沿线，一定能不断涌现出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境内古丝绸之路贸易掠影

□ 张益明

摘要：丝绸之路在周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当时主要是玉器为主的贸易，后来扩大到丝绸等为主。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更加繁荣通畅，直至清朝末期。丝绸之路是中西贸易和文化的陆路通道，甘肃境内丝绸之路关卡及贸易管理是我国古代国家贸易管理的主要管理方式，也是近代海关通关管理的雏形。研究甘肃境内丝绸之路贸易及管理，对建设“一带一路”、现代海关和发展地方经济贸易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甘肃 丝绸之路 关卡及贸易管理

甘肃境内的丝绸古道是长安至新疆间我国国内交通的主要干线，也是中西各民族文化经济交流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已经出现，在张骞出使西域后，河西走廊地区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路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在其著作《丝绸之路》中指出，匈奴被逐出甘肃，通往西方各国的丝绸之路从此开通。

一、甘肃境内古丝绸之路及早期贸易活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和使用蚕丝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早在战国时期就传到西方，成为世界著名的特产而享有盛誉。公元前3至6世纪，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或“支那”，意思是“丝国”或“丝绸之国”。学术上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33—1905年）在其著作《中国》第一卷中把以丝绸之路贸易为

介质的这条道路叫做“Silk StraSSen”（德文，直译为绢的街道），丝绸之路（Silk Road）是它的英译名。

甘肃境内的丝绸古道主要包括丝绸之路东段和西段，每段又各有三道。在甘肃境内的丝绸古道主要是东段，西段较短。东段分北线、中线和南线。

北线：从长安沿泾河至泾川、固原、景泰、沿腾格里沙漠边缘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中线：由长安至临洮、北经阿干河谷到兰州，经永登，达威武、张掖、酒泉至敦煌；南线：由长安出发到宝鸡东，过陇县，到秦安、通渭、陇西、临洮、经青海民和、乐都西宁，过大通河，翻过祁连山至扁都口到张掖，于上述两道会合。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和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凿空”西域，对丝绸之路的开

发有重大意义。《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张骞的封爵），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汉武帝对匈奴战争后，汉朝所开辟的这条大商道便畅通无阻，贸易更加兴旺。《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使者相望于道……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甘肃境内的玉门关和阳关成为丝绸之路上两个主要关隘。汉使从这里出发，可直抵安西奄蔡（今里海东北），犁靬（今罗马及埃及），条支（今阿拉伯半岛），身毒（今印度）。丝绸成为中西贸易的主要贸易物品，罗马人“常欲通使于中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以汉缯彩与之交市”（《后汉书·西域传》）。

甘肃境内古丝绸之路贸易，最初是以官方使贡的方式进行的“贡赐贸易”，后由官方扩大至民间，出现了“互市贸易”及“绢马贸易”。从汉开始这种传统的贸易方式延续了上千年。据《册府之龟》记载：贞观廿一年至宝印元年的一百多年间，波斯遣使朝贡23次；从唐永徽六年至贞元十四年的一百五十年间，阿拉伯大食国遣使中国约

31次；宋代自开宝元年至乾道四年的二百余年中，大食进贡者达49次，差不多每四年一次。

“贡赐贸易”，是国家间官方贸易的一种形式，双方的贸易关系伴有种种政治色彩，即把外国或西域民族使者携带到中原的物品称为“朝贡”，或“贡”或“献”。而中国朝廷与之交易的物品称之为“赐”。这种贸易关系总是由皇帝和可汗达成协议后进行的。一般由可汗本人或特使入朝“贡”或“献”，由中国皇帝直接从国库中解给赐物。如东汉“元和元年……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即武威太守温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出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卷·西域传》）“贞观元年，（统叶护）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后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沙钵罗至利失可汗以贞观九年上表请婚，献马五百匹。”“贞观六年，诏遣鸿胪少卿刘善因就蕃立为奚利必陆可汗赐以鼓，彩帛万段。”“天宝九年四月，波斯王献大毛绣舞、延长毛绣舞、延舞珍珠；永隆二月五日，大食、吐火罗各遣使献马及方物”（《旧唐书·突厥传》）。

“互市贸易”是丝绸之路传统的贸易方式。“互市”是在地方一级官吏的管理下进行的。从汉以来，通过这种贸易方式获得马匹、药材、土产、畜产品，而西域各地则可获得丝绸、茶叶、盐、瓷器、铁器、农事、种子等生产和生活用品。由可汗遣使官吏到边境地区具体交易，这种交易虽仍属官方贸易，但因级别低，又着重经济效益，更灵活自由，深受双方欢迎。民间的互市贸易一般在边境地区设立的互市点进行，即以茶绢、盐粟和马匹畜产的交易为主。唐代又逐渐形成了茶马互市和绢马互市。史书记载甘肃河西地区就有“安西互市”“敦煌互市”等。“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旧”（《封氏闻见记·饮



茶》)。无论是“贡赐贸易”还是“互市贸易”，其易市的商品都“明码标价”，如绢马的比价一直维持在四十匹绢易一匹马的水平上；练帛计算一匹五岁口、六岁口的敦马价值约十五至十八匹大练；中唐以后，马价大涨，五十匹练易一匹马。

从西汉时起，中国丝绸就已成为亚欧大陆贸易的主要商品。公元3世纪，地处西亚的拜占庭帝国在其各项政策中就记载中国丝绸，海关条例和平条约，商行章程，限制奢侈法等内容。丝绸成为决定拜占庭帝国各项政策的主要因素。波斯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除丝绸外，中国的金属工具和铸铁、凿井技术也传到中亚传输至欧洲；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蚕豆）、胡麻（芝麻）、胡瓜（黄瓜）、胡蒜（大蒜）、胡桃（核桃）、胡萝卜等植物和汗血马、橐驼，各种珍禽异兽以及毛布、毛毯等各种毛织品，也随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陆续东来。丝绸之路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到公元16世纪，繁荣了1700多年，其中汉、隋、唐最为兴盛。

隋大业初年（605年），隋炀帝派裴矩为张掖“监知关市”“掌其市”“引致西蕃”，进行广泛的招商活动。《隋书·裴矩传》中多次提到：“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可知张掖当时是中西国际贸易市场，裴矩常住张掖，往来于武威、敦煌、伊吾之间，通过各种方法吸引西域使者商旅到内地活动，对丝路国际交往起到重要作用。

隋大业二年（606年），突厥染干可汗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并设百戏眩人，“千变万化，旷古莫铸，染干大骇之”。此后，“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延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



唐代 三彩凤首壶

罢。伎人皆衣绵绣缛綵，其歌舞者，为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眊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衣服，而西京缛綵为之中虚”。

大业五年（609年）三月，隋炀帝大败吐谷浑后，于青海扁都口入河西走廊，在燕支山（今甘肃山丹焉支山）会见了西域各国国王及使节。高昌王伊吾设及西蕃胡27国“谒于道右”，这就是历时著名的“二十七国交易会”。隋炀帝“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午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装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西域各国使节和朝贡者不远万里，涉流沙度葱岭，来到东都洛阳，“大献方物”即进行朝贡贸易。隋炀帝盛陈文物，大开市禁，将这次朝贡变成了时值一个月的国际交易盛会：“帝令都下大戏。惩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座棚阁而纵观焉。皆被鲜丽，终月而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

列酒食，遣常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这次盛会“其营费矩亿万”，“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捩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

二、甘肃境内丝绸之路关卡及贸易管理。

甘肃“河西走廊”东起甘肃永登、天祝、西至敦煌，全长约1000公里，南倚祁连山，北自东向西为龙首山、马鬃山。南北宽约5公里—100公里，是夹在南北两山间的狭长谷地。因在黄河以西，故称“河西走廊”。自汉以来，河西走廊就是通西域的战略要地和贸易通道。为打通与控制丝绸之路，历朝政府与匈奴、突厥、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西夏）的战争不计其数。

（一）关卡进出境管理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实行分封诸侯制。西周王室先后开辟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陪都成周（今河南洛阳）连贯各诸侯国的通道，在距镐京500里的京畿边境置关设卡。如在京畿以西设萧关（今宁夏境内）、陇关（今甘肃境内）。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称霸，相互征战。

各诸侯国在领域边界、交通要道上设置的关卡多达百余个，其中主要的关卡为：秦国秦献公年间于咸阳东（今河南灵宝）设函谷关，于临洮（今陕西陇县）设陇关。

自汉代始，为保障丝路畅通及管理，在丝绸之路河西段设立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及两关（玉门关、阳关），对进出境商旅进行稽查，征收市租和过境税（关税），其管理职能类似现今海关的口岸管理。同时负责对进行贡赐贸易的使臣及商旅联络、安全保障及提供生活保障等事宜，具体由商旅所经之地的都护府及下属官吏负责，这种管理模式一直延续至隋唐以后。

（二）汉唐以来历朝对甘肃境内丝绸之路管理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汉朝即派卫青、霍去病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元狩二年（前121年）、元狩四年（前119年）三次率领大军出击匈奴，取得巨大胜利，迫使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降汉。“事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元鼎二年（前115年）和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割断

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保证了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畅通。自此以后，匈奴势力向西发展，汉朝政府又开展了争夺西域的战争。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朝派兵打败了匈奴的耳目楼兰（罗布淖尔）姑师（车师）。太初四年（前101年），汉将李广利伐大宛取得胜利。征和四年（前89年），汉朝军队在楼兰、须危、尉犁等六国军队的配合下打败匈奴所支持的车师，车师王降服，大大动摇了匈奴在西域的统一。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匈奴攻打乌孙，乌孙向汉求援，汉遣五将



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

军率十五万大军与乌孙五万军队东西夹击匈奴，获得大胜。从此，匈奴远遁，丝路畅通。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国内混乱，无力西顾，匈奴一度猖獗，丝路不通。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出击匈奴，依靠西域各族人民的支持和东汉强大的军事力量，终于驱逐匈奴，恢复了丝绸之路交通的畅通，并统一稳定了西域。

曹魏时期随着河西经济恢复，河西（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和金城）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的管理范围。史载：“魏文帝即位，分河西为凉州”“其刺史领戍己校尉，护西域”。由于曹魏政权的重视，河西地区农业得到了发展，同时促进了商业的繁荣，除了给养军队以外，还用来与西域各国发展贸易，致使“西域人入贡，财货流通”。随着商业复苏，中西关系日益加强，丝绸之路为之空前畅通。《魏略·西戎传》云：“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这里的三道，是指塔里木盆地以南的南道和以北的北道；其中北道在西汉和东汉有分两种不同走法，一条是出玉门关经罗布泊北边西行，至高昌合为一处。曹魏时同时通畅，故称三道）。河西经济恢复的主要原因，一是在用人上任人唯贤，治理有方，如魏文帝时期凉州刺史张既和魏明帝时期徐邈、金城太守苏则、敦煌太守仓慈都是很有作为的地方官吏。二是对羌胡少数民族事项安抚政策，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一系列民族问题，形成境内安定局面，使百姓安心生产，对河西经济发展恢复极为有利。三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发展经济的措施，如招怀流亡，教民耕种；措意豪族，扶持贫困；修盐池水利，募百姓屯田；改进技术，提高产量等。魏太和五年（231年）敦煌太守仓慈向外国商旅发放通往西域“过所”（通行证），并派员护送过关出境，深受西域胡商和百姓的拥护，推动了贸易发展。“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贵”，致使“西域流通，荒戎入贡”（《三国志·徐邈传》）。这种

发展一直延续到西晋十六国，至南北朝不衰。

隋朝建立后，对丝绸之路的管理进入了高潮时期，即进入了由隋朝开始的隋唐兴盛时期。隋朝通过外交手段逐步解除了东西突厥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和边患，使丝绸之路的北道、中道得以畅通。在大业四年（608年）和大业五年（609年）对丝绸之路上的主要障碍国吐谷浑又予以彻底打击，重新开通丝绸之路。之后，在丝绸之路上设置了一些重要机构。一是建立郡县，加强管理。大业五年（609年），设置了四郡八县（《隋书·地理志》），在丝绸之路地区建立了伊吾郡（《通典》卷191《边防典》《旧唐书·地理志》），这是中央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丝绸之路设立郡县，管辖丝绸之路安全。二是驻守军队，移民屯田。大业五年（609年）隋朝平定吐谷浑后，即于其地“置州、县、镇、戍”，屯边移民。三是设西域校尉，监管贸易。据《隋书·西域传序》记载：“因置西戎校尉，以接应之”。西戎校尉也叫“西域校尉”，这是隋朝管理西域的标志性官职，专门负责通西域各国的联系和通商事宜。

隋朝时期，到内地过关贸易的国家比以前更多，范围更广。西域各国的物产，如各种化妆品、颜料、珠宝、珍器、玉、琉璃、玛瑙、皮张、毛织品及马、牛、驼、羊等贩运到内地，隋朝的丝织品、瓷器等也通过丝绸之路运到西域各国，远销地中海沿岸。

唐朝丝绸之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突厥、吐蕃势力时时干扰河西四郡，丝绸之路边患时有发生。唐王朝为了全面保障丝路发展，重点对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战备。一是增兵设防。武则天称帝以后，陈子昂于天拱二年（686年）巡视河西，加强防守。唐玄宗时期，又重新布置兵力，分河西、陇右节度使加强了对吐蕃、突厥的防守。唐天宝八年（749年）、十二年（753

年)节度使哥舒翰攻下吐蕃盘踞地,基本遏制了吐蕃的扩张。二是屯兵储粮。唐朝在河西用兵的同时,继续进行屯田储粮,以武则天、唐玄宗最有效。除甘州外,唐朝在凉州、肃州、瓜州、沙州驻军屯田,“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唐六典》卷七)。三是屯牧养马。唐朝,曾在陇右开辟广大牧场,大量养马,最盛时达七十多万匹。在河西置八马坊,养马三十万匹,有力地支持了唐朝向西域开拓。

唐朝时期,丝路呈现繁荣之貌,国威播西域,史称“兴胡之旅,岁月相继”(《唐旧书·崔融传》)。当时沙州、凉州是国际贸易市场,瓜州则是内地运来丝绸的中专站。据敦煌遗书反映,敦煌设有胡汉商人的市,市设市令,市里有行、行客、行头等,说明其组织、分工相当复杂,从成交的货物看,有丝绸、褐布、漆盒、钢刀、箭筒、马、驼、羊、驴、珍珠、染料、麝香、干果等。朝廷通过对商人征税增加了收入,并用之进一步经营丝绸之路。史载:“开元盛时,税西域胡商,以供四镇”(《新唐书·西域传》)。

唐代陇右所设关津表

陇右	兰州	金城关等
	沙州	置阳关等
	瓜州	玉门关等
	河州	可蓝关、凤林关等
	安西府	铁门关等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地方志集成》等地方志资料整理而成。

宋代甘肃境内丝绸古道继续呈繁荣之势,贸易更加多样化。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置榷所,掌管与西夏互市的榷场,西夏王李元昊与北宋达成了史称“庆历协议”,开放两国边界榷场。主要贸易类型为有:榷场贸易,榷场是国家之间在双方边境的重要通道设立的封闭的互市贸易场



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

所,具有很强的官办性质和专卖许可特点,其交易活动都是在官方的主持管理下进行的,一直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和市贸易,“和市”也称民市,是经双方政府同意后进行的一种边民互市,即作为双方边民日常生活品往来的贸易渠道,其规模和地位仅次于榷场。贡使贸易,贡使贸易是宋和西夏统治阶层增加收入的一种贸易方式。转口贸易,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仿效宋朝的榷场管理制度,对出入境、过境货物实行转口贸易。

宋代榷场贸易监管中设立在榷场的管理机构——官署称“榷署”及“监临场务使臣”。这种设置带有明显的进出口贸易管理权力和服务的特点,使用“关子(通关许可证)”“关行(放行证件)”和“官置仓库(监管库)”等手段进行通关管理。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草原丝绸之路繁荣。驿站虽然主要是用于军事、经济用途,但在客观上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起到重要作用,商业活动空前繁荣。元朝时期,甘肃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地域色彩。一是畜牧业发达。除了朝廷的官牧以外,一些贵族地主和少数民族从事畜牧业,朝廷向民户征收的税收中就包括征取羊马等。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正月,“遣使赍钞三千锭往甘肃市牦牛”,以备“孽畜而供赏赍之用”(乾隆《甘州府志》卷《世纪下》)。二是手

工业缓慢发展。纺织、酿造、冶炼逐步发展，成为政府税收来源之一。三是商业贸易交往频繁。主要包括官方贸易、官民贸易和民间贸易，这些贸易不仅保证了官府收入，同时地域性经济使甘肃与内地及西方国家自然地结成互通有无的经济链条，商品交换的互补性明显。元朝宣政院管辖的甘肃吐蕃地区的农牧业和手工业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甘肃岷（县）洮（临潭）及河湟地区缓慢发展，民族特色贸易活跃。

随着海运发展，陆上丝绸之路日渐式微，中路、西路丝绸之路虽然以海上运输为主，但陆上丝绸之路在明代是畅通的。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下河西，在关外设“关西七卫”，其中四个设在今敦煌西南青海柴达木盆地一带，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进行着严格的茶马交易。另一卫设在哈密，明朝以此为出发点，对西域诸国广事招徕，历时六十年之久。与此同时，在甘肃一些地方出现了地方性中心城市，如兰州、河州、肃州和甘州，基本上在丝绸之路沿线。兰州是当时最大的货物集散地。河州是丝绸之路要冲，来自于西域及阿拉伯的穆斯林聚集于此，商业贸易发达。河西甘州地区，是明代陕西行都司和甘肃镇所在地，大量西来商人在此贸易。明朝西北民族贸易主要是茶马贸易，有朝贡、马市（关市）、民市、月市小市等形式。朝廷为了增加税收，设置茶科司、茶马司和监察官，专门管理茶马贸易。同时，朝廷实行“金牌信符”制度，标志着茶马互市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政府也从中获得一定的税收。明中期以后，由于私茶漫延，管理松弛，正统十四年（1449年），“金牌信符”制度废止，明廷开放茶马贸易，茶马互市走向衰落。

明末清初，战乱频繁，丝绸古道受损严重，到雍正、乾隆年间河西出现了兴盛局面，人口达七十余万人（见唐景绅《明清时期河西人口辨析》，载

《西北人口》1983年1期。一般认为，汉代有户民和屯田卒40万人，唐代有19万人，明代有30万人）。康、雍、乾时期，鉴于西北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朝廷先后委派一批能干人才治理河西，不少官员在任期内很有建树，推动了河西经济的发展。随着清朝初期“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甘肃商品贸易开始活跃。以大黄为代表的药材贸易，最终端在日、美、俄、法、英、印度等国交易。据清代地方当局记载，每年全省仅羊毛一项出口就在数十万斤，值银数百万两（彭英甲著：《陇右记实录》卷8）。随着对俄贸易逐渐发展，一些洋行如英商新泰兴洋行、高林洋行、德国兴隆、美国慎昌、日本春天茂、俄国古宝财等相继在兰州、河州、银川、西宁等地设立，便于皮毛贸易。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廷准允哈密回族来往于甘州、肃州进行贸易的权力。不久，清朝与俄罗斯签订了以肃州为贸易点的通商条例，在嘉峪关设立“关税监督”，征收洋货税，河西的商业贸易以凉、甘、肃三府及所属县、镇治所为中心，对俄贸易较大。清朝中晚期，列强入侵，名族矛盾加剧，河西丝绸古道逐渐衰落。

参考文献：

- ①胡之德主编：《兰州大学丝绸之路研究论文集》1992年，兰州大学出版社。
- ②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甘肃省图书馆合编：《丝绸之路文献叙录》，1989年，兰州大学出版社。
- ③张国刚：《东汉与罗马：丝路东西的对望》，《文史知识》2018年第4期
- ④石云涛：《蚕种西传故事与中西初识》，《文史知识》，2018年第5期。

（作者单位：兰州海关）

《甘肃历史地理新证》出版发行

2018年1月，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编审薛方昱新作《甘肃历史地理新证》，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主编的《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卷。该书设历史地理篇、《水经注》考注篇、民族及其他篇收录作者在甘肃地方史地研究方面的论文39篇。

历史地理篇收入论文22篇，对史地学界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做了新的探索。如，汉代金城郡治允吾的地理位置，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明、清及当代学者认为在今青海民和县的下川口、上川口和甘肃永靖县北，具体位置虽异，但共同认为在上川口以东的湟水南岸。作者揆诸史料和《水经注》的体例，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允吾故城在湟水与黄河之间的今青海民和县古鄯乡北古城。除此，首先提出唐宋成纪故址在今天水市秦安县郭嘉镇；西周太原的方位，即今泾水上游以董志塬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三国时魏蜀之战的街亭在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乡上城子；诸葛亮六出的祁山，在今陇南市西和县北的石堡乡；春秋战国时的獯国、汉代獯道县故址在今武山县城东1公里处；中国最早设置的邽县故城在今天水市秦城，冀县在今甘谷县城西的五里铺。对这些地理位置的考证均有独到的见解，在论文中也有较详的论述，颇得其实。这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当前进行的修志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水经注》考注篇收入考注文章11篇。作者长期编修志书和指导市志、县志的编修，从工作需要出发，前后用30多年的时间，对《水经注》记载的甘肃境内河水、渭水、泾水、漾水及其大小支流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对甘肃境内的古今水系、大小支流的名称演变、

流经郡县治所、山川名胜的地理位置、水文情况一一作了考注，并附有古今水系对照示意图，使读者一目了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补泾水并注》一文，补了史书之所缺。《水经注》中的泾水，宋初尚在，后佚失。清人赵一清、谢钟英分别作了《补泾水》，但不完整。作者依据两汉魏晋史书和《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对清人所撰《补泾水》，作存真、删伪、纠错、补漏，著《新补泾水并注》。在注文中提出先秦泾水正源是今马莲河（上游称环江），秦汉时因在该水流域大量移民开荒，毁坏了森林草山，造成水土流失，使昔日清澈见底的泾水变成了泥水。水是生命的源泉，人类的生存，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水。通过对古今水系的调查研究，以史为鉴，对于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及其他篇收入论文6篇。在《关于先秦羌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作者认为上古之时居于我国黄土高原泾、渭、洛等流域的羌戎族，是我国最早从事农耕定居的民族。东汉人许慎说的：“羌，西戎牧羊人也。”是指当时居于我国青藏高原的羌族，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与商周时居于黄土高原的羌族有别。他还认为甲骨文、金文中表示羊角的符号，也可表示头饰，就羌字型而言，似指古代羌族青年男女头饰的两根羽毛。在《甘肃古代羌语地名探讨》一文中，认为甘肃古代的一些地名属羌语，如兰州一名源于皋兰，皋兰为古羌语，其意是“石羊出没在山路上”。另外他还认为甘肃陇东泾河上游，西周、春秋时，是月氏、乌支部族的重要居地。秦汉时先后在这里置乌支县和月氏道。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高天成供稿）

GAN
SU
SHI
ZHI

甘肃史志

2018年第2期（季刊）（总第34期）

编辑出版：《甘肃史志》编辑部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51号
省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8960929 8960920

电子邮箱：3498763120@qq.com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甘）LK000080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